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合编

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

中共党史出版社

GID 460/32

15-

出版说明

张闻天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一生执著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尤为可贵的是张闻天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遭到错误打击后，身处逆境仍不倦地探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在六十年代初，以至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撰写了一批理论文稿。他在这些文稿中始终鲜明地反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思潮，为我党在这个时期留下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1995年是张闻天同志诞辰95周年，我们在此之际，特将这批文稿中最有价值的篇章集中起来，连同他以前的有关社会主义论著汇集出版，目的是为了提供人们研究。

本书共分三辑，第一辑选收了从早年时期直至庐山会议（1922年——1959年）有关社会主义论述的代表性著作9篇；第二辑选收了庐山会议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写的笔记、文章、报告共23篇；第三辑选收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流放广东肇庆期间写下的文稿6篇。全书38篇文稿中有三分之一是新发表的。

收入本书的文稿凡留有手稿的均据手稿刊印，没有手稿只有打印稿的均据本人核定过的稿本刊印。所有文稿一概保持原貌，只在必要的地方作个别文字或史实的订正。文中属于观点上明显的历史局限，只在题解或注释中加以必要的说明。

目 录

第一辑(一九二二年——一九五九年)

改造中国不能照抄西洋人走过的老路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	3
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	7
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	54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61
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	64
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	70
关于东北经济的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	74
关于农村工作的三个问题(一九四九年五月)	100
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106

第二辑(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四年)

要正确认识 and 运用客观经济规律(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	131
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日)	133
关于按劳分配提纲(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十一日)	134

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和经济关系问题提纲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	140
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五日—十七日)	142
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二十九日)	145
关于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问题(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	154
读孙冶方同志的《论价值》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	156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	
(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十五日)	159
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	176
无产阶级专政仍然必要(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	178
“按比例”与“不按比例”(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日)	179
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	
(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月)	180
包产到户问题值得研究(一九六二年七月九日、十八日)	198
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201
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	209
应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评论之一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227
要用正确路线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229
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七日)	231
“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233
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234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235
应重视对社会主义剩余劳动价值的研究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评论之二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236

第三辑(一九七一年——一九七四年)

人民群众是主人(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241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	249
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261
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262
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271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	274
后 记	279

第一辑

(一九二二年——一九五九年)



改造中国不能照抄西洋人走过的老路*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

中国今日虽受天灾人祸的种种摧残,但元素还没有消尽,中国现在一般觉醒的解放的人虽一时不能站起来,但有站起来的可能性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如今日而一般觉醒的解放的人,能急起直追,合力互助向光明自由的路上走去,中国实富有进步的可能性。如其延迟不进,各走各的路,就是灭亡的路数。

中国这样一天一天混乱下去,觉醒的人也一天一天多起来了。(固然,也有许多分子,由悲观的思想入享乐的魔道的,但这总是少数,并且不过是一时变态的现象,不足为病。)但我们底问题是:这些人怎样能够群起而急起直追呢,并且我们到底向哪一条路追上去呢?我敢直截了当地和你们说:我这里所谓急起直追,不是说照抄西洋镜,是走向西洋人以为理想而我们也认为理想的目的。即我们所谓急起直追是直追那西洋的大多数平民的共同的理想,这理想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底问题就是怎样我们能够大家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呢?

但我们现在细看社会上一般有力的人的趋向,完全想照抄西洋人走过的老路。他们都以为非赶快在中国完成资本主义不可,非立刻把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和外国底资本家对抗不可。他们不晓得资本主义在中国越是发达,中国纷乱越是会延长期间。延长纷乱的

* 本文是张闻天早年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政治论文的节录。全文原载1922年1月5日和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现题是本书编者拟的。

期间我们就会受无穷的痛苦，受许多不必要的痛苦。造化些，或者能够再翻身，不造化些就永禁在枉死城中，不得翻身。

人类不欲生则已，如要生存，哪有不向可生存的方向走的呢？如看不到那所走的方向是灭亡，是痛苦，那也罢了，如已经看到了，而还是走上去的，那不是由于他底不愿生存，便是由于他底神经错乱。中国今日那般资本家，其欲生存恐十百倍于我们而还是向灭亡的路走去，当然是由于神经错乱了。他们看见美国资本主义底下，工商业的发达，就十分羡慕，以为如欲开发中国富源，非提倡资本主义不可。现在他们竟向资本主义走了。他们要握到政权是为了资本主义，他们提倡教育，创办大学，无一不是为了资本主义。唉！资本主义在中国，有这般资本家努力，其日日的发荣滋长是必然的了。

愚蠢的人类，竟是这样做了。社会上对于这般引他们到灭亡上去的人恭维之为“有造于社会”，“教育家”，易卜生所谓“社会的栋梁”；对于提倡社会主义的人，竟目之为“过激派”，“捣乱派”。这真是又好气，又好笑的呵！

但是我们就象那般想谋官做的小政客也去附和资本家吗？我们底情意决不能许我们这样，我们底理知，也决不能许我们这样。我们应该自己相信，社会假使没有我们这批人，社会就会灭亡；我们是黑暗社会的一线生机，决不能自暴自弃把所负的重大责任抛弃了。并且我们还应该相信，我们这样前进不息，我们底目的终会实现的。我们不应灰心，倒退下去。

闲话说了许多，我们的问题还是：怎样我们大家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呢？这问题真苦了不少的青年。我对于这问题的解答还很幼稚，不过不妨说出来，就正于大家并求讨论。

我不相信大多数的人民在现在会大家起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大多数的人只能等有觉悟的人实行了来享受的。有觉悟者事事要谋之于目不识丁，眼光不出十里的人，不但得不到益处，并且包管你失败。他们差不多完全处于被动地方，不到他们不能生存的地

步,他们不会合拢起来反抗的。如有一线生存的可能,他们永世也不想翻身。所以如以他们底自觉为实行的标准,那非等到资本主义十分发达,一切旧制度完全破灭之后不可。那时他们真有创造新制度的能力与否,还是疑问。更进一步说,就是在那时,他们还是非有领导的人不可的。但我不是说,有觉悟者不必去管大多数的人,有觉悟者是要时时管到他们的,是以他们底幸福和快乐为前提的。不过有觉悟者以他们底幸福、快乐为前提是一事,达到那前提的步骤却又是一事,固然,这步骤不能太违反于那前提的。

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我老实说了罢,就是由我上边所说的从旧制度之下解放出来,觉醒转来并且有同样改造的目的的(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个人团结成死党。这党内我以为有四个必要条件:(一)有一定的党纲;(二)有健全而且严密的组织;(三)每个党员对于党内所决定的条件有绝对奉行的义务;(四)党员间应有十分的谅解和同情,但发现某党员以本党为个人名利的手段时,应毫不容情地驱逐之。

等到有了健全而且严整的团体后,第二步就实行社会活动,如宣传本党底党纲,连络世界有同样志趣的团体实行互助,或投身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或批判现社会指出其矛盾之所在。……

我以为这些步骤是绝对不能乱的。中国各团体的失败就是步骤错乱的缘故。如有许多会,并无一定宗旨而就想实行社会活动;有许多会,虽有宗旨,而不过徒有其空条文,不发生效力。还有许多,自己会内没有一定的组织就去和别的会联络。这都是根本的错误,我们非矫正不可的。

我们底结论于是如下: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这新社会组织的产生全靠从旧制度中解放出来,觉醒转来的个人团结成死党去实行

社会活动，去解决这混乱。（我底结论大概和汉俊^①先生没有多大差别的。不过汉俊先生一定要马克思怎样才怎样，我觉得太受拘束了。譬如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虽与马克思所主张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不必一定说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是死人，他底学说虽可随人家解释，但到底太呆板了。社会主义却是活的东西，很有伸缩余地的。）

这篇东西，本想详细说一下，但时间太蹒跚，说了这句，忘了那句，况明天又要上工，再没有修改的时间。匆匆发表，这真是很对不起读者的，不过就这一点，也可以表示我个人思想的变迁了。

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了改造的决心。不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而一日不能去的。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底烦闷，但永久不决定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①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1920年和陈独秀等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一大代表。1922年元旦，李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国家底混乱终止？》两文。张闻天这里所说的结论，即指此二文的结论。

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评任曙^①君的《中国经济研究》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

我很佩服任曙君,他能够把他的时间,利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上,他能够很有计划的,很有次序地去研究这问题,企图找到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的了解。但是在钦佩之余,我总觉得任曙君的这本书,并没有能够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任曙君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同他所批评的许多著作家一样,同样的表示出了他缺乏政治经济的常识,与正确的阶级的立场。

任曙君这本书,只是他整部《中国经济研究》的大书的一部份,所以他定名为《中国经济研究绪论》。内容方面,主要的是在批评各派对于这一问题的错误的见解,提出他自己的立场。所以这本书是任君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的出发点与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他的全部大著的理论的基础。他以后的几本书,大概不外乎把更多的具体材料来证明他这一立场的正确吧。

因此,我对于任君此书的批评也不能不带有较多理论上的辩

* 本文 1931 年 6 月写于上海,作者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章最初发表于 1932 年 4 月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署名刘梦云。文末所注写作地点“日本东京”是在地下斗争环境中为了迷惑敌人。

此文是作者当时同托派进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一篇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它围绕中国社会究竟是否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本问题,根据大量数据资料批驳了托派任曙等人否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否认封建关系在中国农村仍占统治地位的谬论,从而捍卫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纲领。

文章的局限是没有能够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而这也是党的六大以来当时中央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① 任曙,原名任旭,又名任昭明,四川南充人,曾加入托派组织“无产者社”。

论性质,说明他的出发点,他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的谬误,说明他这样并不能找到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的了解。

这是我在开始批评任君这一书时,所必须首先说到的一点。现在请言归正传。

一,把握着问题的中心? 还是不了解问题的中心?

我想在任君大作出世以前,早已有人说过,要了解中国经济问题,必须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说帝国主义,不但统治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也统治全世界(当然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除外),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任君的发明,而已是公开到再不能公开的事实。但是我们对于帝国主义本身的了解,对于帝国主义如何统治着中国的经济,怎样剥削着中国民众的了解是同任君很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互相间所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不能一致的。

在任君看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最大作用,是帝国主义商品的输入,因此任君写道: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这是因为由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中国整个经济问题中,在过去的一切纠纷,在将来的一切疑案,特别是农村经济的性质问题。不但这样,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关于失地失业,和农村的逃亡,目前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以及农民运动不平衡的发展,农村中各种各式的斗争,我们都可以拿对外贸易为出发点来作说明。”(《中国经济研究》八九—九〇页,著者加圈——梦云)(按编辑要求加圈统一改为黑体——编者)

在任君看来,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经济的问题,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问题。即所谓帝国主义的投资问题,在任君看来,也不过是一个投货的问题,一个入超的问题,即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问题。任君写道:

“在投资问题中,亦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有输入商品的问题在。输入商品关系中亦不是简单的输入商品而有投资问题在。很显明的事实,关于前者,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向中国投资,必然附有购料的条件。例如航空借款之与飞机购买,军事借款之与械弹进口,都是不可分离的——**投资就是投货**。”(同书一〇八页,梦云加圈)

这样从任君看来，所谓帝国主义，实不过是商品的输入与输出，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这当然是简单与明了的事！

因为任君有这样简单明了的帝国主义“理论”，所以他很容易的解决了被“各派”所闹得乌烟瘴气的中国经济问题。只要把海关“华洋贸易册”翻翻，问题就完了。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统治与对于中国民众的侵略，都被确确实实的记载在这几本宝贵的海关册中间了。他们还要些什么呢！？

但是可惜这种帝国主义的“理论”，骗不了稍有政治经济常识的人！普通的读者，读了任君大著之后，一定会问，这样说来，不是帝国主义在几百年以前早已存在了吗？因为那时也有商品的输出与输入，也有对外贸易。这岂不是闹天下之大笑话，岂不是使任君十分“科学的”，庄重的面孔，变成了滑稽可笑？！

谨告任君与读者诸君：帝国主义是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简单的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同工业资本主义不相同。这种侵略，不单表现于商品的输出与原料的输入，而尤其表现于它的财政资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表现于为财政资本所控制的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以及商业机关的统治，表现于势力范围的夺取，表现于利用并经过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来剥削与奴役广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工农群众。所以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统治着中国的经济，必须要从这许多问题着手。而任曙君在“把握着问题的中心”时，竟完全把这些问题，抛到九霄云外！这未免太令人扫兴了！

照任曙君的全书看来，他不但表示了他对于帝国主义的伟大的不了解，而且他是有意的要躲避开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而不说。他是在企图用各种各样“左”的空谈抹杀统治中国经济与剥削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

任曙君在《中国经济研究》的第四章内一方面写道：“中国资本主义问题，是要从帝国主义问题去求解决的”，但他同时说，我们用

不到谈什么帝国主义。他说：

“我们为什么必欲这样提出问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这只有资产阶级学者，才去分别这些是他们的，那些是列强的。中国的工人是不应该这样那样替别的人划分界限的。他们只晓得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是不分开的好弟兄，打打伙伙的压榨他们，剥削他们，使得他们衣食为难，他们的农友失业失地。在紧急关头，就是在平时在合股公司内，他们显然没有分别，谁劳你多事的‘唯物派’去替别人强分宾主，去当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原书一二三页）

横竖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同样的压迫中国的工农群众，那我们还用得着谈什么帝国主义？！研究**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统治，研究**帝国主义**在中国如何剥削中国群众，这在任君看来，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应声虫”！

我想任君在这里显然是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他显然是想否认统治着中国全部经济的帝国主义。他这样做了之后，还说这是“把握问题的中心”，这真是天下之大滑稽！

任君根本没有了解，研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分别开来，可以变成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也可以变成工人阶级的战士。如若说，中国只有帝国主义，而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说，因为帝国主义压迫着中国经济，阻止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所以应该拥护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就因此劝告工人们参加造产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的奴才们所说的话。但是，当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如何剥削中国民众，是为得要组织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是为得要没有〈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是为得消灭与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是为得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战士所说的话。他们这样做，不但不拥护资产阶级，而且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投降妥协，要揭破资产阶级一切嘴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欺骗，要根本推翻投降帝国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只有这些工人阶级的战士，才把握着了问题的中心，才能真正

的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做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工作，把中国的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任曙君虽是嘴上说得很“左”，似乎只有他才挂记到工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他投降了帝国主义，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辩护士的工作！

当然世界上有不少嘴上讲得“蛮好”，而实际上所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任君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这实是不足为奇的吧！

二，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看见剥削关系，这是任曙君这类人的基本错误

任曙君所以要把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问题，只看做一个对外贸易的问题，无非要经过这一桥梁，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以发挥他所崇拜的“世界大革命家”托洛斯基所说的中国目前的革命不是民主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伟论。

实际上，对外贸易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的中心，而是任曙君这本《中国经济研究》的中心。任君这部书的全部理论是建筑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上。既然如此，任君的成功，当然是无疑的。或者说，不会发生任何问题。任君所以这样容易地宣布了他的对手的破产，与他自己的胜利。

只要看那一社会中生产物或是不经过商品，我们就可以断定那一社会是封建的或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就是封建的经济，这就是任曙君所发现的新大陆。至于那一社会中剥削的方法，阶级的关系，在任曙君看来，是对于那一社会经济性质的决定丝毫无涉的。

任曙君引了关于中国经济上是封建剥削占优势，政治上是封建势力占统治等类的两段话之后，写道：

“上面两个意见，都是从剥削方式来说明中国的经济性质的。这很不对。我们只能用经济性质去说明剥削方式，不能用剥削方式来说明经

济性质。并且从社会阶级来分析经济问题，我们上面曾经说过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至于说富农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维持封建残余，那更是荒谬绝伦。”（同书，四九页，著者加圈——梦云）

“至于以统治阶级的性质及其剥削方式等等为出发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性质，毋乃太过滑稽。”（同书，八五页）

这种把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看做完全同这一社会中的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离开，不去拿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性质，而是是什么经济性质，去决定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这实是完全离开了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的“理论”！

照任曙君的高论，读者就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在希腊罗马时代，商品经济有过很大的发展，难道那时希腊罗马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远自秦朝以迄清朝，曾经有过不少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难道那时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在，商品经济在苏联也还存在着，难道那里也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要发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们就可看到商品经济的本身还不能决定那一社会的经济性质。

要决定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我们如若单地问这一社会有没有商品经济，我们还不能决定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我们必须问这一社会中有什么阶级，他们中间剥削的关系怎样，只有知道了这些，我们才能断定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譬如我问你，罗马帝国的经济性质是什么？你一定要回答我，那里有奴隶主与奴隶，奴隶主不但垄断了一切生产工具，而且垄断了奴隶的身体自由。他除了奴隶的死亡的界限以外，可以无限制的剥削。那时不但农场上的大批生产品商品化，而且奴隶也变成了商品，同牛羊没有任何的区别。我根据你的回答，我才能说罗马帝国经济性质，是奴隶的经济。但是如若根据任君的理论，那罗马的经济是商品的经济，所以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我想普通中学校的学生，都会告诉任君，说这是在给人家开玩笑。

不过我觉得任君是一个很庄严的学者，他决不会同人家开玩

笑的。他只是在他的庄严中间，表示出他对于工人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丝毫的了解。读过初步政治经济学的工人，一定会告诉任君！在阶级的社会中，剥削的关系，也即是阶级的关系，是每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土地的诸侯与地主用地租与徭役来**剥削**农民与小手工业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生产工具的资本家用资本来剥削工资劳动者。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

只有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才会离开**这一中心问题**而不谈。他们可以给你讲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也许是会非常有趣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总是要保守沉默的，因为这是剥削阶级的秘密！世界上从没有过，除了极少数之外，剥削者，承认自己剥削过任何人。资本家只是把饭给工人吃，但决不剥削！地主只是把土地给农民种，但决不剥削！地主与资本家是工农的救命主！可不是吗？！

替帝国主义做辩护士的任曙君，哪里再肯揭发出地主资产阶级的秘密呢？！

当然，我并没有说，商品经济的社会，同资本主义的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却正相反，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是商品经济的社会。譬如《资本论》的第一章，就开始于商品的分析，正是如此。但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拿海关贸易册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决不能证明这就等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拿它们的商品破坏中国的农村经济，使中国农民的农产品商品化，甚至使中国农产品的种类依照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而变动，决不就等于帝国主义**促进了**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

有了社会的分工，有了私有财产，就有商品的交换关系。这交换关系，可以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去，也可以更其增加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三,帝国主义的侵略,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剥削的加紧

虽是任曙君在他的大作中间,不断的说人家是机械论者,而他是辩证法大家,然而要在世界上再找到一位比任君再机械的机械论者,恐怕很难了吧。固然在他的对手方面,有不少机械论者,然而在这方面,他的确比他们要更加高明。

照任君的逻辑,帝国主义把商品输入了中国,所以帝国主义帮助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假使谁以为帝国主义不但不帮助而且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那他就是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一来,任君就会到《中国年鉴》一类书上抄下很多的表,表示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至中国工厂数目的增加,洋洋得意地来证明他所犯的“资产阶级意识”的错误!于是他同阿Q一样,又得到胜利了!

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要投资,是为了要推销他们的商品,是为了要取得原料的供给。要达到这些目的,它必须利用政治的,军事的,与经济的力量,夺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与政治权力。在中国,它们利用政治的与经济的借款以及军事失败后的赔款,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取得了它们的势力范围,使各地的地主军阀,以至资本家,变成了它们手中的工具。为了垄断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它们在经济上必须设立它们的银行,工厂,交通工具,商业机关。它们就依靠这些东西(非经济的方法,我们这里不说)推销它们的商品,搜刮中国的原料,与奴役中国的工农群众。这些东西的设立,无疑的,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的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但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的市场,与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他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

这种议论对于任曙君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一方面说,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扩大了商品经济的领域,另一

方面，它又在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加紧着乡村中封建式的剥削。这对于任君，当然是天下之大矛盾，百思千思而不得其解的！

为什么？这是因为任君对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作用，没有丝毫的辩证法的了解。

帝国主义为得要加紧对于中国经济的统治与对于中国民众的剥削，不能不相当的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不能不建立他们的银行，工厂，交通工具与商业机关，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要更其能控制中国的经济，更其能使中国的经济变成他们的附庸。

我们只要一看帝国主义的银行，在中国的作用，我们就可明白这一点。这些银行的“营业”，不是在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而是在举行各种各样政治的，军事的以及名义上是实业的**借款**，借款利息之高，条件之苛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它们更利用中国金银比价的时时变动（其实变动的操纵者还是它们），做卖出买进的投机事业，一举手之劳，可以有数百万以至千万的收入。它们可以发行大批的纸币吸收现金，再拿现金去投机，去放款。它们更利用它们所有的特权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力量，吸收中国官僚军阀的低利，无利以至赔利的现金。一切对外贸易，也完全在它们的掌握之中。它们更经过中国的钱庄，当铺，以及各种各样的经纪人（地主，商人资本家，高利贷者），用很高的利息贷款给小商人以至贫苦的工农群众，用很低的代价去收买农民的农产品。它们就是这样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剥削中国的民众。它们对于某一资本家的帮助与否，就会决定这一资本家的生死。照例，它们只是对于它们本国的资本家给与助力与拥护。只是因为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的背后，有这样雄厚势力的后台老板，他们才能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没有这种银行做后台老板的中国资本家，自然只有失败之一途。

这些银行，尤其是汇丰银行，在中国营业的利息，往往高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这样高的利息，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是不

会有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证明财政资本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作用，是**寄生虫的，高利贷资本的作用**。它只破坏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

不错，帝国主义在中国除了银行之外，还有工厂，还有交通工具与商业机关。但是工厂的建设，大部分限制于纺织工业，烟草工业等轻工业的部门。铁路的建筑，自一九一一年革命起后，差不多已经完全停顿。现在交通方面发展得比较快的，是汽车，轮船，电话，无线电以及航空等等。这些东西的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绝对必要的。有了比较便利的交通，帝国主义者才能把他们的商品运入中国内地，才能把内地的原料运到外国。一切这些东西的设备，只是为了要更其控制中国的经济，使中国走向殖民地的道路上。（军事的目的，我们这里不说。）

帝国主义所以在中国创造最小限度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为了这一点，它不但不愿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尽量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这一点东西，我想除了任曙君之外，不会有什么异议吧，当然，单看到对外贸易的任曙君，决不能看到帝国主义**如何的**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正相反，在任曙君看来，正是帝国主义帮助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任曙君的所以变为帝国主义辩护士者盖以此。

其次，帝国主义这种殖民地政策，当然使商品经济在中国农村中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帝国主义商品（不但是工业品，而且也包含农产品）输入中国的农村，中国农产品以及原料输出外国，自然会**使中国农民出卖自己的农产品而购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商品**。但是这种发展，只是加紧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剥削，造成大批的破产失业与空前的大饥荒，正因为生产力的不发展，所以数千百万破产失业的农民，找不到生活，不能不成千成万的饿死，数千百里的沃野变成了一片荒凉的沙漠。正因为生产

力的不发展，所以他们不能不去当兵，当匪，以至当人家的牛马。同时，正因为帝国主义高压之下，生产力不能发展，所以中国的有些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改弦易辙，把他们的资本投到土地中去，对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就是农民分化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富农阶层，因为他们的剩余资本没有发展的余地，所以也乐于购买土地恋〈变〉成半地主与小地主。

虽是一切这些，在任曙君的脑筋中是“荒谬绝伦”，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的确是如此。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只要稍为知道一点政治经济常识的人，就可以知道，那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因为这里对立的不是在土地上投下资本取得平均利润的资本家，与得到工资的工人，而是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向农民那里收到地租的地主与农民。这种地租不论是生产品的或是金钱的，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含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至于这里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作用，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也是性质上不相同的。

帝国主义利用它在中国经济上的指挥地位，就是这样经过中国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推销它的商品，搜刮农民的财富。帝国主义只是因为乡村中有它的同盟者，所以它不但能够统治通商口岸，而且也能统治中国的乡村。所以在乡村中间，帝国主义维持着封建的剥削，也就是经过这种剥削，奴役着广大的中国劳苦民众。

至于帝国主义者怎样拥护中国的军阀，这些军阀怎样“非资本主义地”（就是说封建式地）剥削着中国的民众，这是人所共见的事，我想这里用不到加以说明了吧。

一切这些在任曙君看来，都不免是怪诞离奇的，然而现实常常比任君头脑所想的，要更其复杂些，那有什么办法呢？！

四，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

现在我要研究一下在任君大作内所有一些数目字，看任君对于这些数目字的解释是否正确。

任君最得意之作，即是引用海关册上的中国对外贸易表。他就用这些表证明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甚至同战前俄国与战后苏联的经济不相上下。但这些表所能证明的，只是中国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正因为帝国主义，地主军阀官僚，资本家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一天一天加紧，所以农民把他们所有的一切东西，甚至于老婆小孩子，都拿来出卖。很明显的，这种农产品的出口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如像在美国与德国等）这是一。第二，中国输出品中，主要的还是原料，而不是工业品。这表明出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的国家，而不是工业的国家。第三，那些输出输入的工业产品，不是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我想只要我们把中国农村经济加以丝毫的考察，就会看到中国农村中主要的生产方法，还是手工的而不是机器的，还是封建式的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主要生产者，是小佃农，小自耕农或半自耕农，而不是农业资本家与农村工人。他们因为受到军阀，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因为要完纳苛捐杂税，地租利息等等，不能不尽量的并且廉价地出卖他们的生产品。这同农业资本家为了取得利润，而耕种土地，而出卖农产品有根本不同的意义。中国的小农一年劳动的所得，养活一家人口还不够，还说得上什么利润？！这些具体情形，是为任君所看不到的。他所看到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

其次，只要看一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细目，就可以看出，中国主要输入品，是工业品，主要输出品是农产品。我们现在也引用下一九二九年海关册上的表：

民国十八年海关外洋进口货比较表

类别	百分数
棉货	13.76%
棉衣	7.20%

类别	百分数
面粉等	5.06%
煤油	4.36%
糖	7.80%
五金及矿物	5.60%
米	4.66%
毛制品	3.53%
化学产品	2.71%
烛等	2.62%
木材	2.20%
鱼介(蚧)海产	2.08%
粮食等	1.82%
纸烟	1.64%
人造靛	1.36%
人造丝	1.23%
丝货	1.08%
汽车	0.91%
纸	2.70%
机器	2.36%
菸	2.12%
麻货	1.84%
小麦	1.69%
煤	1.51%
染料颜色	1.26%
棉纱	1.13%
食品等	1.01%
其他货物	14.76%

民国十八年海关出口往外洋货品比较表

类别	百分数
豆及产品	22.62%
蛋及产品	5.09%

类别	百分数
茶	4.06%
饼子,仁子	3.26%
棉衣	2.92%
绸缎	2.07%
棉货(除棉纱)	1.70%
花生及产品	1.36%
猪鬃	1.18%
桐油	2.32%
丝类	16.26%
皮货,生皮,熟皮	4.48%
五金等	3.31%
煤	3.04%
粮食	2.59%
发毛,毛羽,絨毛	2.23%
棉纱	1.81%
木,木材	1.67%
纸烟	1.21%
盐	1.09%

从这两张表上,我们可以看出外国进口货中日常工业用品占进口的一大半。出口货中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原料。同时在进口货内,食品也占不少部分。这并不是表示因为中国工业化了,所以需要从外国输入食品,而是因为中国农民一方面因为要适应世界市场原料的需要,所以不能不少种稻麦,而多种其他农产品,如豆子之类,另一方面(这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灾荒区域的扩大与收成的减少,致使食品不敷应用,而依靠外国的输入。但这种食粮输入的增加在任曙君看来,都是中国资本急速发展的结果。同一事实,但所得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

最后,在外国的输入品中,机器的输入,只占全输入百分之二·三六,共值二九,八八六,五〇三海关两。同时中国又没有洪〈宏〉大的制造生产工具的工厂。那中国是怎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

家,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输出品中,工业品输出者,主要的为绸缎,棉麻与棉货。除绸缎的输出逐年减少外,棉纱与棉布的输出是增加的,尤其是棉纱的输出。关于这一点请看下表:

最近中国棉制品输出表

年 代	棉 纱(担)	棉 织 品(海关两)
1921 年	25,000	5,800,000
1923 年	88,000	9,100,000
1925 年	64,000	11,000,000
1927 年	325,000	13,500,000
1928 年	330,000	11,700,000
1929 年	345,000	17,300,000

这类工业制造品输出的增加是否如像任曙君所说的是中国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表现呢?不是的。这是表示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即是**国内市场的缺乏**。只有四百万锭数的中国纺纱工业(其中二百三十万是中国资本家的,一百六十四万是外国资本家的)的生产品,不能完全消(销)售于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而必须到南洋群岛,印度,以至日本等去找求市场,这表示中国民众的购买力是如何的低微。但这在任曙君看来,这种输出,当然是中国经济繁荣的象征!

此外,任君在论对外贸易时,大骂有位姓潘的朋友,说他把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减低了,说“他为要证实中国经济落后这一主张,以便他说明中国还是封建经济的理论,意识的引用过去五六年乃至十余年的事实,而不引用在**突飞猛进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关于近年的事实**”。(前书九十七页——梦云加圈)在另一处,他又说:“中国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中。它不因内战,灾荒,革命,以及所谓封建剥削的阻碍,而致停止其前进。”(同书一五七页)

然而,在这里我们也想拿一点小小的事实,证明任君的所谓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对外贸易**”,实在是吹牛的。

根据**海关**的报告(这在任君是最可靠的报告),一九三〇年进

出口总额为二,二〇四,五九九,三三六海关两(金银不计在内)。较十八年度的进出总额二,二八一,四六六,〇三九两减少七六,八六六,七〇三,即百分之三·三。但这只是拿银子来计算的时候是如此。如若拿金价来计算,则相差更甚。十八年度海关两之换算率为二先令七便士十六分之十三。则该年进口货,应值英金一六七,七八一,六一七磅。十九年度海关两平均换算率为一先令十便士十六分之十一,该年进口货只值英金一二三,八一〇,一一九磅,计减英金四三,九七一,四九八磅,即百分之二六。

这就是任君所说的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不了解中国经济恐慌深入的任君,当然这是不可思议的!这在任君看来,恐怕又是有意替资本家造谣,而不是事实。因为只有证明一切都在发展的数目字,才是任君的事实! ……

现在,我再来同读者研究一下,任君在“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一章中的一些数目字。

我想只有傻子,才会和任君争论,说中国资本主义**没有丝毫的发展**,说今年没有增加过一个工厂,或是二个工厂,增加过一个工人或是二个工人。我们所争论的,是中国现在到底是什么社会,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或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占统治的地位,还是封建的剥削或是封建的关系占统治的地位?所以任君的好些数目字,并不能够帮助任君,证明他的主张的正确。

譬如他写道:

“如果我们说中国的帆船可以表现封建时代的交通工具,轮船则代表资本主义时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请大家注意下列的记载:

历年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的百分比

年 代	轮 船	帆 船	合 计
1875 年	85	15	100
1905 年	91	9	100
1915 年	93	7	100
1925 年	97	3	100

年 代	轮 船	帆 船	合 计
1926 年	98	2	100

(见同书一四〇页)

任君利用这样的数目字证明他的结果,真不免令识者哑然失笑。即稍有常识者,而不是呆子,看到了任君这个像煞有介事的统计表之后,一定要问,难道在一八七五年中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五为轮船,百分之十五为帆船吗?这真叫做白天见鬼!可笑的,是这位学者,把“历年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的百分比”当做全国轮船与帆船的百分比。而且到底一八七五年中国有几个海关?设在那里?登记的是外洋船还是内河船?我想这位学者自己也莫明其妙。这位学者只是为得要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所以乱用数目字,把数目字的原意完全抛开,这也不免太难为情了。

然而这种乱用数目字,在任君的大作上差不多连篇累牍的都是如此。譬如接着这种有趣的证明之后,他又写道:

“如果说由钱庄和银行的兴替,亦可以相当的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那我们就介绍出如下的数目字来: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中国银业投资的百分比

	钱 庄	银 行	合 计
1912 年	68	32	100
1920 年	37	63	100

这一个小统计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十年之间,银行和钱庄表现了决定了新陈代谢的关系。银行投资日多,钱庄投资日少。这里我们很明白的看到中国同世界经济的发展没有两样;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人们再也不能拿历史上商业资本主义一语来比拟今日了!”(同书,一四〇——一四二页——梦云加圈)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不知道这一统计,是讲上海的还是讲全中国的?但是这一位科学家就可根据这类统计,说中国经济已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这就是说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真是在任曙君

的笔上突飞猛进的发展着。我们前面说过，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的经济，当然这同任君所要证明的，中国经济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完全不同。我们说，帝国主义经过买办阶级，钱庄，地主，军阀官僚，商业资本家高利贷者，来剥削与奴役中国的民众，而任君说，中国的银行已经大部分排除了钱庄，中国已经变成了财政资本(或金融资本)的国家！

这位任曙君在这一统计表的下一页，又用了一张统计表，证明出中国资本主义是如何的发展。这是一张“一九二八年各种生丝出口的数量和货价的比较”，其中：

土丝占百分之九·七(数量)百分之五(货价)

半厂丝占百分之□·九(数量)百分之五·八(货价)

厂丝占百分之八三·四(数量)百分之八九(货价)

“这个统计表示了什么呢？很显然的告诉我们：**中国农家原来生产的土丝在数量不到百分之十，在货价上不过百分之五，而厂丝半厂丝合计，无论在数量与货价方面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表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将要夺去生产的全部领域，封建手工业的生产将要完全消灭。**”(同书，一四三——一四四页，—— 梦云加圈)

拿生丝出口的比例，看做是中国全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品与资本主义生产品的比例，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戏法！

任君就是这样拿数目字来证明他的“理论”！这就是他应用数目字的“科学方法”！

读者诸君，我们现今已经完全看破了任君所玩魔术的手法，为了时间与精力的宝贵起见，想来没有再看下去的必要了吧！

五，是中国经济的繁荣？还是中国经济的恐慌？

在任曙君的脑子中间，决不会有经济恐慌的观念存在：我想这是可以断言的。

任曙君在论“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一章内，差不多到处都看到中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照他看来，“经济的繁荣”，现在是从美国转到中国来了。

譬如关于丝业的发展问题，任君先引用了下列的表：

历年上海丝厂发展概况表

——一九三〇年四月调查——

创办时间	厂数
民元以前,时间未详	20
民元至民五(1912—16)	12
民六至民十(1917—21)	11
民十一至民十五(1922—26)	20
民十六(1927)	11
民十七(1928)	13
民十八(1929)	25
民十九三月(1930,3)	2
合计	107 ^①

“这统计告诉我们——任曙君说——在一九二九年上海增加了二十五家厂,比以前任何年份都增加得多。本年三月止亦增加二厂。”(同书,一六五页)

除了上海之外,任君还引用浙江的无锡的丝厂的发展,结果自然是都有增加。于是任君胜利地说:

“由上面三个重要区域的统计,已经把小伙子们一切非科学的,空想的,布尔乔亚的反动理论的基础榨毁无余了。”

这位只看见树身而不见树林的任曙君,引了这些数目字之后,就洋洋得意,觉得又可以把人家大骂一顿,也不问这些工厂现在还是开着,还是关着。这同他有什么关系呢?工厂总还是工厂,不论是关着还是开着。

然而我们不能认关闭着的工厂为工厂呵!照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丝业不但没有繁荣的前途,而且正陷在严重的经济恐慌的深沟中。我们也看看资产阶级的学者所说的老实话吧。(很奇怪,有时候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比任君所说要靠得住些!)

“中国生丝产量,向来推测,应有四十万担上下,年来逐年减少。十

① 原文如此。

九年度计只二十七八万担，较之十八年度，约减少八九万担。其减产之重要原因，不外乎蚕茧歉收及茧质不良，致出口欠佳，而成本反贵。同时复因世界市面衰落，各国丝织厂大半减工停业，生丝销路大减。日本丝贬价出售，华丝无法竞争。故丝业之衰败，为数十年所未见。上海丝厂百〇六家中，年终时停業者约达七十家，无锡丝厂七十家中停業者四十家，广东丝厂情形之困难亦复相类。”（中国银行国民十九年营业报告书）

这就是任曙君的中国**丝业**的发展！

除了丝业之外，任曙君讲到中国航业的发展。虽是任君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受内战，灾荒等而受停顿，并且根据一九二九年海关报告上所载“上述英船吨数，较民国十三年最高之数，亦超过二百万吨，实为空前纪录之价值”而不禁狂喜，然而中国航业界的不景气的事实，任君想来还是不能否认的。

据招商局的报告，该局最近几年来的营业，差不多陷在完全衰落状态。即以去年上半年而论，招商局轮船因应差与零星装兵之损失，一月份计达二，五四三两，二月份三，八三三两，三月份一六〇，六三五两，四月份一八〇，三二〇两，五月份一六〇，八一七两，六月份一二三，四二五两。至于应差各轮所应收入之租金，还不在于内。合计招商局在去年半年之内，就损失了六十三万一千三百七十三两。其他各华商航业公司，也莫不受到大的损失。所以年来所谓华商的船业，也同样处在严重的恐慌的情形之下。

至于**铁路工业**又怎样呢？任君说：

“一般布尔乔亚的分子认为最痛苦的莫过于内战的延长，使铁路的交通大受影响。但这里我们应当知道在帝国主义干涉和监督之下（对于帝国主义应如何感恩不尽！——梦云，）铁路交通不但在内战一停止即有恢复的可能，而且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进展。”（同书，一七〇页）

任君的证明，当然又是那本宝贵的海关报告册。他选出了如下的数目字：

近两年铁道车辆进口的比较

	民国十七年(两)	民国十八年(两)
铁路机车煤小车	1,564,000	3,501,000
铁路客车货车 (电车在内)	2,289,000	2,935,000
未列名铁路 电车路材料	3,951,000	4,253,000
合计	7,804,000	10,689,000

不看中国铁路工业的**实际情形**如何,而拿这点数目字来证明铁路工业的发展,这是任君所说的形式主义者的最好的标本!

实际上,以一九三〇年而论,据国民政府铁道部统计,全国铁路除平汉陇海不计外(但这两路所受的损失实最大)营业上的损失达三百六十万元。但这还是不重要的部分。主要的,就是各铁路,年来因不断战事的关系,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现在预算各路车辆材料之补充,桥梁轨道的整理约需**五千万元**。据美人满台尔计算,则需七千七百万元。恢复铁路原状需要五千万元到八千万元,而任君却想拿几百万元的进口货当做铁路工业发展的标准!对于这类中国资本主义赞美者的布尔乔亚的分子有什么办法呢?!

至于拿一九二四年北京农商部所发出的矿业执照,以证明中国重工业之发展,真是开辟“科学方法”的新纪元!外国械器输入的略有增加使一九三〇年中国**机器工业**减少了百分之五十的事,对于任君当然是莫明其妙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主要民族工业部门之外,尚有**丝绸业**,在民族工业中也占过重要的地位。然而近年来,这一工业竟有一落千丈之势。如杭州区,在民国十四十五两年中间,丝绸业还比较发达。民国十六年底,杭州丝绸厂亦尚有五十二家,但到十八年已剩下十三家了。在湖州在最盛时期,城厢内外,共有丝织厂二十余家,零机二千余架,每年丝织物的产额有九十万匹。但是到十八年底绸厂倒闭已过半数。十九年实存者,仅三十家,零机开工的,已不满千架,全

年出产额不满五十万匹了。

此外如像**火柴业,糖业,面粉业,制油业**等,现在都处在严重的恐慌中(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举例),除了任君的脑海之外,找不到任何出路。恐慌原因虽各有某种不同,但总括起来,不外没有国内的市场(即广大民众的贫穷化),国外的市场(世界经济恐慌),外货的竞争(屯并政策包括在内),金价上涨使外来原料昂贵,本国原料的缺乏(恶化与歉收),国内战争与捐税的繁重等等。这些原因不解决,中国民族工业的长期恐慌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势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前途,是没有的。

但是各**主要民族工业部门**的长期恐慌,并不就是说,在**任何民族工业部门中,都不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最明显的,即为纺织业的发展。据华商纺织厂联合会最近的调查:

华 商	纱 锭	线 锭	布 机
前次调查	2,326,872	68,920	15,955
最近调查	2,391,074	88,144	17,018

此外在一九三〇年内如**橡胶业,化装业,调味业,制帽业**等都有相当的发展,但除纺织业外,这些企业都是新兴的,规模很小的,因为特殊原因而发展的。正像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当机器工业消灭着手工业时,手工业者从这一工业部门逃到另一部门,以保持他们的命运,而且在有些特殊的企业上,如像制帽业,可以得到相当的发展一样,在中国这些小规模工业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只是因为这里的一些利润并没有引起帝国主义者们的注意,或是因为特别的原因,帝国主义所制造的一时不合于中国人的口味。

所以这些工业的发展,决不能说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们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意义是非常微小的。而且这点发展也不过是短期间的,它们也将碰到其他工业部门所碰到的同样的障碍。

到这里,反对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特别提出的任曙君,一

定要站起来说，民族工业虽是不能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工业是能够发展的。如像在纺织工业方面在最近一年内全国纱锭增加十八万七千五百二十六枚，其中华商计增六万四千二百零四枚，日商计增九万九千四百十六枚。全国线锭增加九万另三百六十四枚，其中华商计增一万九千二百二十四枚，日商计增七万一千一百四十枚。全国布机增加三千二百二十六台，其中华商计增一千〇六十三台，日商计增一千五百八十三台。（见《纺织周报》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

不错，各国帝国主义者因为国内经济恐慌的深入，因为银价的跌落与工资原料的特别便宜，所以尽量的把他们的资本移植到中国来。只要有利润可得的地方，当然他们没有不来的。

在这里我并不想很具体的说出帝国主义如何在经济上控制了中国。因为关于这问题的材料比较的多，除了任曙君之外，一些明了的读者中间，都比较的还有相当了解。但是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主要的**还在政治借款方面。他经过借款，控制中国国家的收入（最主要的如**海关盐税，烟酒税，**）取得各种各样的特权。经营这些借款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各帝国主义**银行**。其次，投资之用于建设事业的，最主要者为**铁路借款**。**铁路工业**以及各种**交通工业**的“建设”，差不多是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使命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输出中国的原料，出卖他们的商品，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更能统治中国。

当然除了交通工业之外，帝国主义在中国还开设了一些工厂（如纺织工厂），开采了些矿山，但这些企业的资本，在帝国主义全部对华投资中实是比较微弱的。尤其在煤铁矿的开采方面。至于大的**机器制造厂**，简直一个也找不到。帝国主义比较更愿意投资的地方，却是那些土地，房屋，码头，旅馆，楼房，信托，保险，游戏场，贸易，橡皮，大都市的所谓公共事业各部门。即以上海地产公司而论，英籍的有十五家，法籍四家。在一九二八年收入资本已达一〇二，一三〇，二八六元。（见《统计月报》。二卷五期，七十一页）这些企业，都是取得极高度的利润，但对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关

系的。

帝国主义怎样掠夺(夺)中国而不发展生产力的最好的例子,即为各帝国主义银行的营业报告。(我常常说到在华的帝国主义银行,只是因为这些银行是扼住中国经济咽喉的魔手!)我手头没有去年各帝国主义银行的营业报告,我只能根据《统计月报》上刘大钧所摘录的一九二八年的情形。在这一年内,汇丰银行的资本共为二千万元,公积金为银一千四百万元,及金镑合银五千九百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元。除公积金内大都作为外国存金或投资外国票据外,该行手内却有印度证券及殖民地证券达一万一千七百万元。汇丰银行如此,其他银行差不多也是如此。刘大钧先生在那里更写道:

“**麦加利银行**之资本及公积金共有七百万镑,持有政府证券及他国证券共九百二十万镑,又于大英银行占有股本二百二十万镑。**东方汇理银行**持有法国国防公债十五亿九千三百万法郎,又有国库长期债票等一千六百七十万法郎,而资本及公积金仅一亿一千七百万法郎也。**大英银行**共有资本及公积金二百七十万镑,而持有之英印两政府证券共达二百九十万镑。**华比银行**共有资本及公积金二亿四千六百九十万法郎,持有之政府公债及政府担保证券四千六百七十万法郎,于联号银行占有股本一亿一千万法郎。**横滨正金银行**共有资本及公积金二亿零六百万日金圆,持有政府证券及公债二亿七千八百万圆。”(同月报,二十一页)。

除银行之外,再譬如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之各种保险公司。这些保险公司的资本虽是专为中国业务募集,但大部分仍投资外国证券,收入的保险费也是如此。刘大钧先生说:

“据某公司报告,其款项五分之二,存于中国境内之银行,五分之三投资于抵押及证券。而证券之中半为外国政府之债票及外国公司之股票。该公司之资本与盈余,合并计之,犹不及上述款项总数之半,故其资本完全投于外国可断言也。

“万国中法两储蓄会及外国信托公司亦颇有上述情形,甚至中国政府设立之邮政储金机关亦尝以收入之存款购置外国证券,是真可谓中

国对外之投资事实。”(三十五页)

这些事实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出帝国主义尽量的利用各种方法剥削中国的民众，尽量的破坏中国的手工业与农村经济，尽量的吸收中国的财富，但这些财富他们并不用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却用在保效本国的政府，用在发展自己母国的经济。这在任君看来，又是荒谬绝伦的(凡是任君不了解的东西都是荒谬绝伦)，然而在帝国主义，这是再自然没有的。

但是当我们说，帝国主义，投资的**主要部门**，是在借款，银行业，交通工业等等，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的资本完全不投于其他工业的部门。只要有高度利润可得，帝国主义者当然是不会客气，不会落人家之后的。在这一方面，近来表示特别积极的，即为日本帝国主义。最明显的是在**纺织工业**，以及**杂货业**方面。关于纺织工业方面，我们已略略说过，关于杂货工业方面，据大阪市产业部调查自去年五月至本年一月，日资本家在上海设立的有：

厂名	预定资本 (日金)	制品种类
上海纸业工厂	五千元	包装箱
泰山橡皮工厂	十五万元	橡胶鞋
美芳工厂	四万元	珐琅器
河野罐头厂	二千元	罐头
冠丽制帽厂	三万元	帽子
金属精炼厂	十五万元	铅制品
日华手染厂	三千元	手染
金水热水瓶厂	三千元	热水瓶
加藤电线厂	五千元	电线类
仁和珐琅厂	一万元	珐琅器具
中华工厂	五千元	制鞋业
安川电机厂	十万元	汽车类
大阪机器制作工厂	五万元	纺织用品
东华织厂	一万五千元	领带类
泰昌机器厂	三千元	机器

自一月至五月，日人在天津设立的有：

怡丰工厂	二万元	橡皮鞋
泰山胶皮工厂	三万五千元	橡皮底
世户工场	一万元	肥皂
田中工场	五千元	橡皮管
清水工场	二万元	煤油混炉
高桥工场	二千元	兽肠象皮制膜
宫崎洋行	三千元	日本酒
高桥洋行	二千元	领带

(见五月底上海《日日新闻》)

我有意把这些厂名，资本额与产品排列出来，是为得要使读者看到到底这些工厂是怎样的工厂，他们在中国经济上有怎样的影响。如若我们仔细的把这些数目字研究一下，那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出，这些都是规模非常小的，主要的都是出产些日常用品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厂主，都是一些被日本国内大资本家所排挤的小资本家，他们或是在国内为本国的大资本家所吞并，或是移植他们的资本到中国来，利用一些特殊的条件，发展他们的企业。这些小资本家同中国一些土着〈著〉的资本家竞争起来却常常能够得到胜利。但统治中国经济的，自然不是这些小规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资本同最近成立的欧亚航空公司德帝国主义的资本，中国航空公司的美国资本等比较起来，真是相差天地。(即中国航空公司，就有资本一千万元。)

但是就是这些外国工业的发展，同样的受着中国国内市场，即中国民众购买力的支配。我想除了任君等这些人之外，谁也不会梦想在贫穷的沙漠里，会生长出资本主义的蔷薇花。这些资本主义的企业，一时因为特殊条件而产生的，将同样遭到严重的经济恐慌的影响。破坏中国经济，使中国广大的工农群众贫穷到无以为生的帝国主义，以中国经济的破坏，与中国广大民众的贫穷化而为生的帝国主义，当然不能在中国造成资本主义的宫殿！

总结起来,现在不是中国经济的繁荣,而是中国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破坏中国经济,而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它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只有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如像任曙君其人者,才会闭着眼睛梦想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时代!

六,中国农村经济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任曙君,当然很容易拿海关册上的一些数目字来“证明”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剥削占着统治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我想现在不必再同这位中国资本主义的赞美者多费唇舌。我们在这一节中所要批评的是任君所说的:“我们就再指出那被人看作封建经济之中心问题的**土地问题**来,证明它的关键也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关系”。(原书,二〇一页)

我们现在就同任君来谈谈土地问题。

一开头,任君又表示了他玩弄数目字把戏的特别能力。他在他的大作二百零二页上,引用了这样的一张表:

户口的百分比	占有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中 农(10—30 亩)24%	13%
贫 农(1—10 亩)44%	6%
富 农(30—50 亩)16%	17%
中小地主(50—100 亩)9%	19%
大地主(100 亩以上)5%	43%

这张表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现在姑且不去管它。我们现在只要看任君如何解释了这些数目字。

“表上土地之集中是显然的事实。贫农户口多而土地少,不待言是**农村争斗的中心为土地**的表明。可是土地之集中,不仅建筑在贫农之失地,而且建筑在中农的失地。中农占有土地之少,不是**自足自给经济破坏的证明**吗?所以土地之集中,与贫农与富农地主之对立,都完全由于**封建生产之破坏,即资本主义关系之形成**。”(著者加圈——梦云)

这里任君所看到的,只是中农占有土地之少,自给自足经济的

破坏,所以完全是封建生产之破坏,即资本主义关系之形成。这就是任君从这张表上所能得到的唯一结论。但是**土地集中到谁的手里呢?**这对于任君是没有兴趣的。

就是从任君所引用的表上,我们也可看到占户口数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中小大地主,却占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土地的面积。这就是中国的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不是很显然的吗?下面他又列举中国佃农所占全体农民的百分数。他说,佃农在

“福建和浙江等省区,当全体农民百分之六十一至八十之间;其次是江苏,辽宁和湖北等省区,当全体农民百分之五十一至六十之间,又其次是河北,河南和黑龙江等省区……这是表现因**封建剥削关系而土地集中**吗?抑或因**资本主义关系而土地集中**呢?问题亦是不待辩而自明的”。(原书二〇四页)

接着他又拿广东与江苏佃农数目的增加证明:

“**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愈发达。反之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地方,土地愈集中,土地的集中与资本主义相依为命**”。(原书二〇五页,著者加圈——梦云)

这就是任曙君对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全部“理论”!

从上面任君自己所引用的表看来,这些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但是谁是地主阶级呢?任君除了肯定这一地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明。

我为得要说明这一问题,不能不从最近在新生命社出版的严灵峰先生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上,找到一些说明。虽是在这一部书内严先生大发雷霆,大骂任君为“侦探员”,为“机会主义者”,然而任君与严先生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并无两致。(很抱歉,我的文章做到这里,才拜读了“有特殊见解的”严先生的大作。“别开生命的《动力杂志》,我虽也见过一两次,但总没有拜读过里面诸位先生的大作)。

严先生对于中国今日的地主阶级这样的写道:

“中国今日的地主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主要的目的,却不在于农民直接供给他们一切必需的消费品,而是要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给地主

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流行而时髦的商品——生产物或货币——至于这种地租，由地主看来，是他的耗费购买土地的资本上应有的利息；由农民看来就是他自己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份剩余生产物，不过这种剩余生产物是他自己之社会必需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罢了”。

严先生更接着说：

“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商品侵入农村更急剧地促使广大的农民破产，农民破产的结果脱离土地，农村生产更趋衰落，于是乎使旧时靠着农民为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领主，贵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经济侵掠而结果之贫困的农民，要出卖自己的田地，即旧式的贵族宗室也要将自己的土地整批出卖的。其次，城市的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已开始发展，但大部分还是操在帝国主义手中，民族工业以资本积累的薄弱，不能与帝国主义工业对抗，于是拥有少数货币的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便趁土地上投资轻，本利厚的机会，出买其土地来了。这是新式地主发生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〇五——一〇六页）

如若把严君的主要意见总括起来，那就是说，中国旧式的地主，因商品侵入已经同他们的农民一起破产了。现在的地主是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的地主，是新的地主，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同城市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

虽是严君在有些地方表现了骂人的特别才能，然而在骨子里，严君同任君同样的对于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丝毫的了解。

任君难道会忘记，远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商业资本已经得到不小的发展。远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前，商品经济已经使某一部分地主破产，而出卖他们的土地，某一部分商人，高利贷者，或是官僚，因为货币的积累而购买了土地，或者因为某一部分地主，因为同时经营商业，经营高利贷，而更扩大他们的土地。在那时，难道这些地主已经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

我想我们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不是在研究他们的出身，而是研究他们怎样剥削中国的农民，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判断中国的地主还是资本主义化的，还是封建的。不然，你研究一辈子，

还是研究不出一个结果来。因为谁也没有法子专研究中国每一个地主的家世，考究他们的出身呵！

但是中国的地主，究竟怎样剥削他们的农民呢？是否像严君所说的，同城市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的呢？当然不是的！

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实际上并不由地主拿来利用新式的机器，雇用劳动者来耕种，而是把它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租佃给无地与地少的农民。所以在中国农村里，土地的**所有权**虽是集中到地主阶级的手里，但是土地**使用权**却是分散给千百万农民的。这难道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所做的勾当？难道这同过去封建时代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利用新式生产技术，雇用工资劳动者经营自己的土地：这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的唯一记号。然而正是这种记号是中国地主所没有的，这也说明，为什么任君严君等不能不从地主的出身去证明他们的“理论”的缘故！

至于这些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田地上所生产出来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奉献给地主。如若届时不能交纳时，地主就能用武力强迫佃户交纳。这种不用任何工资的代价做掩庇欺骗的公开露骨的剥削形式，请问同封建时代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形式，有什么区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第一，必须在法律上是“自由的”；第二，必须对于一切生产工具是“自由的”，就是说，他必须没有任何生产工具；第三，资本家付给他的工资是拿恢复他的劳动力的至少限度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但是中国佃农呢？第一，在法律上没有任何“自由”，就是这括弧中的自由。第二，他们自己还有一些原始的生产工具，他们就拿这类原始的生产工具耕种他们的土地。第三，他们把田租交纳出去之后所剩下的经常的不够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而经常的利用高利贷度日。换句话说，田租不但取去了他们的一切剩余生产品，而且也取去了他们工资的一部分。难道我们能称这类的农民为工人吗？

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地主的一部分政治的特权为货

币的权力所代替,使农民的田租,〔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从自然品的转为货币的,但是这对于剥削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中国的商人,资本家,高利贷者,军阀,官僚,所以要购买或掠夺(掠夺的形式,现在还是很普遍)土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正是为了实行封建式的剥削。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投资到土地中间,同投资到工业中一样,为的是要取得**平均利润**。在中国农村中间,这种平均利润是没有的。可惜关于这种政治经济学上的专门名词,任君严君完全不懂,所以也只马马虎虎说些什么“**由地主看来**”,“**由农民看来**”是“**资本上应有的利息**”,是“他自己的**社会必需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剩余生产物**”这些似通非通的话。所以同这类人辩论,有时恐觉得有些对牛调琴的不快的感觉。

然而不必要怎样丰富的科学知识,就是普通的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也会明白,中国民族资本家不能在工业方面立足以至把资本拿来购买土地,收租过活,一定是因为在乡村中间他可以更利害的剥削农民。他现在不必像工业资本家那样,要天天提心吊胆的去经营,他现在只要安安静静的坐着吃就行了。当然土匪来的时候,农民起来捣乱的时候,他还是不能不用一些心思专同土匪与暴徒做斗争!他还是要设法组织团防与民团,来保护他自己,以继续他对于农民的剥削。当然这不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化**”,而是资本家的**封建地主化**!

对于农民的剥削除了地主之外,还有**商人与高利贷者**。这些商人,他们利用农民的困难情形,廉价的收买农民的生产品,再转卖给比较大的出口商或城市的商人。他们在这中间所赚的钱,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家所分得的一部分利润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他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资本家那样,因为他代替工业资本家,把商品从工厂传达给消费者而分得利润的一部分,而是由买价与卖价的相差中来的。这种商人,在封建社会中是常有的。至于利重至于每月二分以至十分的高利贷,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借

贷资本完全不同,那更不用多说了。

在中国农村中,很多的地主,同时就是商人,与高利贷者。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真是无孔不入。农民今年如若交不出田租,那就当做农民对于地主的借款,拿高利贷的利息来计算。农民要出卖谷子或棉花时,他在乡村中所能碰到的主顾又是地主,又不能不廉价的出卖给他。不论在那一方面农民都受损失。这种各方面的剥削,当然使农民只有破产,或者变为地主的奴隶,或者流为乞丐,土匪,以至冻死与饿死。

但是我们这种意见,当然是严君所反对的。严君说:

“中国现在有许多商业资本都是带着买办的性质,而不是专门从事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高额利润,而是一方面的城市大商店为帝国主义或民族工业部门销售商品,这种商业利润,只是从工业部分中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取买办形式专门为帝国主义即直接属于外国资本家的买办或本国工业资本家,由生产部门中抽取一部分资本向农村购买材料;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隶属于生产部门的商业资本,这种商业资本已失去自力的‘独立’和‘优势’了”。(同书,一二九——一三〇页)

严先生真是善于创作似是而非的文章的大匠!他的整本大著就是这类似是而非的理论的杰作!我们同他争论,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怎样剥削农民,他就会同你讲许多“城市的大商店”,许多变成工业资本家的商人,以及什么“隶属于生产部门的商业资本”等等牛头不对马嘴的话。然而他究竟怎样证明中国商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统治时代的商业资本呢?他说,一方面因为“中国现在有许多商业资本都是带着买办性质”,都是为“帝国主义或民族工业部门销售商品”,另一方面又因为“取买办形式专门为帝国主义……向农村购买材料”,所以它“不是专门从事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高额利润”,而“只是从工业部门中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

实际上,这样曲曲折折的“绝妙好词”,无非说,中国商业资本带有给帝国主义和民族工业做出卖工业品与购买材料的**买办性**

质,所以它的利润不是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的,而只是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部分。

我现在要问一下严君与读者,为什么商业资本而一带有买办性质,就立刻会从封建时代的变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商业资本呢?

这除了证明严君这一段议论,是在给中国的商业资本家或买办阶级做辨(辩)护士以外,不能证明任何论点!

研究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主要的不在问它给什么人做买办,给帝国主义者或是民族资本家,而是问它**怎样做买办**。如若严君少做些骂人的“斗争”,而肯虚心地专一研究这一问题,那对于严君关于中国经济的了解一定有绝大的帮助,因为这问题的解答不但可以了解到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而且也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如何剥削中国的农民群众!

同帝国主义有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的买办,以及一切在中国乡村中间来来往往的商人高利贷者,他们利用他们的货币,利用同国内国外市场不能直接发生关系的农民的困难与他们对于他们生产品市价的无知,尤其是他们对于货币的急迫需要,用垄断,欺骗以及强迫的方法,廉价购买农民的生产品,这是人所共知的普通现象。我想这除了给中国买办做辨(辩)护士的严君外,谁也不能否认的。譬如在我手头所有的仅少的普通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书上,也可以找到不少这类普遍事实的叙述。

“中国农家常以经济困难,又无合作的习惯和组织,遇着急需款项或物品的时候,往往贱售农产品或预售农产品或举行赊欠,买卖均受莫大的损失。……分析研究,居间的商人固是一个剥削的拿手,而交通不便,运输困难,苛捐……也是同样的损害农家。阅者如不相信,可以事实证明,下表便是乌江农家出售棉花的损益:

乌江农家出售棉花每包损益的比较

售 价	改良棉花	普通棉花
在本地出售	32.00 元	30.00 元
售与无锡纱厂	42.00 元	38.00 元

打包,运输,保险 入栈等费	3.16 元	3.16 元
实收利益	38.84 元	34.84 元
由合作社代售 所得的利益	6.84 元	4.84 元

“观察上表,可见由合作社代售的价格比农家在本地出售价格,改良棉花每包可多得六.八四元,普通棉花每包也可多得四.八四元,……然此种售价,据报告所说,还是价格低廉,运输困难时的标准,若在平常年份所得可以更多。由此足以证明农家所受的损失一定不小了。**这种损失,必为居间人所剥削无疑**”。(见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古棣编著,二〇四页)

同书作者,更引用了民十八年十月立法院统计处在各乡村调查的“上等粳米在乡村和市镇出售价格的比较”。表很长,我现在只摘取其中最能表示出这一相差的几处吧。

地 方	乡村的价格	邻近市价格	百分比
江苏省句容县土桥村	13.0 元	14.0 元	92.8
同,扬中县,三圩埭	14.0 元	15.5 元	90.3
安徽省宿松县	9.8 元	14.5 元	67.5
同,秋浦县占村	8.0 元	9.0 元	88.8
湖南省临湘县涇港	10.0 元	12.0 元	83.3
浙江,义乌,东郭联合	10.0 元	12.0 元	83.3

……(见同书,二〇五——二〇九页)

但是这些统计还只是一些市镇价格与乡村市价的比较,实际上商人高利贷者对于农民的剥削,还不止此。

我现在想从我手头所有的一本关于东三省金融的书上,找一些普遍的例子,给严君与本文的读者看看。当然,在严君等看来,东三省是全中国最富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省区吧。

侯树彤先生在他的《东三省金融概论》上讲到钱庄与农民的关系时写道:

“钱庄之贷款营业,恒限于接济城市商民。中小各钱庄,间亦有贷资于农人者,惟另以一种‘批粮’办法行之。每年旧历六七月顷,年景丰歉,

大体分明,而时正青黄不接,农民需款孔亟。钱庄于此,常以现资接济农人,预约俟秋成后,以粮豆抵偿。实际本为一种贷款,而形式则为购买期粮。凡粮豆之价格,及交代之日期,皆预先议订。其期限愈长者,粮价愈小。其期限愈短者,粮价愈昂。盖此种‘现钱期货’交易,粮价以内,须扣除贷款利息。故期限愈远,所扣之利息愈多,粮价亦从而愈低贱也。此种贷款办法,在钱庄名曰‘批粮’,在农人名曰‘卖青’,**风行吉黑两省,可谓农村金融中最主要之制度。**钱庄而外,**粮栈,烧锅,当铺及杂货商为之者,尤夥。**所获盈利,以月息计之,率在十分左右。就哈尔滨附近言,十七年旧历七月一日批粮,每车(中东路货车容粮七十石)大豆,平均行市约值哈大洋一千三百元,比至十月一日,新粮上市时候,最高行市曾至一千七百五十元。是以一千三百元本金,于三月期内,竟获利四百五十元。约略言之,合月利(利)十一分五厘强,可谓骇人听闻。然此犹非极端之例证也。沈海路沿线,东丰西安各地带(俗呼东山里),十七年旧历七月一日批粮行市,大豆卖青,平均每斗价奉小洋二十二元。迨十一月一日新豆上市时,市价便为每斗四十七元。计四阅月间,可获纯利,已超过母金,约合月利三十分弱。**农人所受之剥削,可想见矣。**(《东三省金融概论》,一九四——一九五页,梦云加圈)

中国的钱庄,粮栈,烧锅,当铺以及杂货商等等当然是中国乡村中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标本代表者,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是否像严君所说的,“只是从工业部分中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我想除了严君以及他的朋友之外,稍为了解一点中国实际情形的人,都不会这样说的。

帝国主义者通都大邑,就经过那些大买办取得高度的利润,而这些大买办又直接间接的经过这些统治乡村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不论是三位一体,或二位一体,以至一位一体)来剥削中国的农民,譬如帝国主义者要把中国的大豆,运往外洋,帝国主义者,就把资本给中国的大买办,而大买办就经过这些居间人,到乡村中去贱价收买。结果得到高度利润的,不但是帝国主义者,而且也是中国的买办,以至一切这些居间分子。帝国主义者,不必要想种种方法,把资本投到中国土地中间,改良生产,以取得廉价的生产品。他

们经过这一剥削的系统,就能够在中国取得廉价的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实际上,帝国主义除了利用买办,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间接剥削中国的农民群众外,它还亲自出马,对于中国的农民实行高利贷的,封建地主的,以及奴隶式的剥削。最明显的例子,是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在满洲所做的营业。这一组织在东三省,利用它所有的种种特权,用高利贷放款给贫苦的农民,强迫农民给它做苦工(实际上这与封建时代的徭役无异),使农民不能自由行动,把农民变为它的奴隶。

这当然不是帝国主义对于我们大中华民国特别的赐与,这在非洲,在南美洲,以及亚洲的印度,南洋群岛等许多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上,差不多是很普遍的现象。南洋群岛荷兰资本家对于中国的“猪仔”的剥削,难道是资本家对“自由”的工人剥削,这是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剥削!

所以,在我们看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过买办(或是不经过),利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中国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同这些乡村中的封建势力结成同盟,拥护他们的统治,同他们共同宰割中国的民众,实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对于严君这类人,这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高叫着: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他对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严著,一二四页)

文明的进步的帝国主义,怎会同野蛮的落后的封建势力联合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最反动的理论”!

当然揭破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奴役民众的真相,在帝国主义者,以及帝国主义的辩护士看来,当然不能不是“最反动的理论”!

剥削中国农民群众的,除了上述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外,最出众的,当然是中国的**军阀**。至于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军阀扩张它的势力范围,军阀怎样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而存在,以至军阀如何

征收苛捐杂税，如何封马封牛，如何举行军阀混战，如何屠杀民众与破坏中国经济：这是人所共见的事，多在〈占〉篇幅去描写这许多事实，我想完全没有必要吧。

但严君在他的大著里却说：

“中国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军阀制度，不但帝国主义尽量想到利用去统治中国**扩充自己经济的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势力**，而中国资产阶级不管是独立的，买办的，半买办的，也想利用来扩张自己的利益，然而，结果，不管帝国主义占取全部统治也好，中国资产阶级在刻苦可怜的挣扎中侥幸发展也好，**总是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势力扩大。**”（同书，一二六页，梦云加圈）

对于这种违反任何事实的空洞的“理论”，我们当然是很佩服的。然而这是什么样的“理论”呢？

实际上，中国**现存**的军阀制度，是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把中国划分成许多势力范围后，依靠帝国主义，依靠封建剥削而存在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在每一军阀统治的区域内，除了对于帝国主义绝对尊重外人生命财产，对于各种各样体面商人资本家地主等须互相客气之外，对于广大的民众，可以任意征收苛捐杂税，可以任意强迫他们做苦工，可以有完全生杀予夺之权。这同封建时代封建诸侯对于他们统治下的庶民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所不同者，就是封建诸侯在他统治区域内自己是主人翁，而中国的军阀则同时是某一帝国主义的工具。

但军阀对于中国民众的这种剥削，这种特权，在严君等看来，无非为得要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看吧，在军阀统治之下，中国民众不是变成更其穷困，更其没有出路，中国的经济（不论是工业或农业）不是更其破产，灾荒的区域不是更其扩大，军队土匪的数量不是更其增加吗？但一切这些，说道都是为得要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些人说，中国军阀利用这种剥削方式取得来的钱财，等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的原始资本的积累。这实际上完全是似是而非

的论调。中国军阀的金钱，除了一部分用于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而豢养大批的军队外，大部分都是储蓄在外国的银行里，为得预备一旦失败后，能够到租界上过他们优裕的岁月。同时，他们还购买地皮，购买股票等这些最靠得住的交易。他们并不愿意把他们的货币变为经营生产事业的资本。

当然，也有些军阀，把他们一小部分的货币用在开设工厂，但这种百分比几乎小到不能诉说的。这种生产的事业，对于军阀们实不过是一种不关重要的副业。读者试想，中国民族资本家尚且因为民族工业发展的困难，而把他们的资本投到土地上或其他更有利的投机事业中去，何况军阀。

至于中国军阀同地主，买办，商人与高利贷者关系的密切是不成问题的。军阀制度的存在就依靠这些封建的剥削者。不但这样，每一军阀，往往自己就是地主，就是买办，就是商人与高利贷者。东三省的那些军阀，他们不但给日帝国主义当买办，而且自己还开设钱庄，发行各种各样不兑现的奉票与军用票，收买东三省的各种特产，拥有千万亩的良田沃野。所以每一军阀，必然的是地主，买办，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代表。

同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然也同军阀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成许多势力范围，造成各个区域的市场，所以每一区域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同这一区域的军阀有不可分离的政治上的与经济上的关系。在保护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受他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竞争，尤其在保护他们不受到工人阶级“捣乱”的损失这许多点上，军阀当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也常常提出一些统一中国，发展实业等空想的口号，提供给军阀，做军阀相互斗争的旗帜！但是不断的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的竞争，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工业，没有发展的可能，这不能不常常使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些“不满意”。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军阀，他们也就很难存在。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傻子，他们也是善

变的分子，他们难道不能利用他们的资本，做些有利的事业吗？当然能够的。这是说明，为什么他们的资本，近来也逐渐投向股票，地产，钱庄，银行等方向去的缘故。

广大的中国农民群众，就是处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重重压迫之下，他们的不安分，他们的起来做反抗的革命斗争，实是这种压迫必然产生的结果吧。然而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说的。

我现在还要说的，就是在中国乡村中间虽是封建的剥削占统治的地位，然而这并不就是说，那里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相当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侵入中国农村，当然使农民内部起了相当的分化，使农民阶级内部产生了**贫农中农与富农的阶层**。但是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势力在农村中占着优势，中国资本主义不能独立发展，以及长期的经济恐慌，所以这种分化一方面使广大的农民群众贫穷化，乞丐化，使他们不能到城市中变为无产阶级，而去当兵，当匪，或者大批的冻死与饿死，使地主们更加容易地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紧对于他们的剥削。另一方面，乡村中因分化而产生出来的**富农**，也因为同一原因与其把他们所积累的资本投入土地，自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还不如拿钱购买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对农民实行地主的剥削，或是做投机事业与高利贷更为有利。正因为这原因，在中国农村中产生了任君所认为荒谬绝伦的**半地主的富农**，这是说明为什么当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消灭地主与平分他们的土地时，他们不能不而且必然要反对到富农的缘故。

当严灵峰君论到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对于中国农民分化的这种特点没有丝毫的了解。他从一百十一页到一百十五页差不多完全照抄了俄人华林先生的文章（见《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前途》，李麦之译，七十一页——八七页），所不同的，就是华林以此来证明，中国农村中已经开始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是主要的矛盾是封建地主与农民，而严君却以此来证明中国的农村经济

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严君在这种地方，的确表示出了他的抄文章的特别能力！……

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资本家，富农等重重剥削之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现在无疑的，是处在一个长期的恐慌崩溃的时期。世界经济恐慌，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跌落，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号称数千年来以农立国的国家，现在不但要把工业品从外国输入，而且主要的农业品，如像米，麦，棉花等等的输入，也逐年增加。据一九三〇年海关报告册的统计，去年米的输入，竟达一九，九二一，九一八担，值一二一，四四二，〇五一关平两。这不是骇人听闻的事吗？然而这是农村经济崩溃过种〈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

农村经济崩溃的最明显的记号，莫如灾荒区域的增加。所谓灾荒，当然不只是水灾与旱灾，而且也是兵灾与匪灾等各种各样的灾害。这些灾害，当然不是天意，而是人祸。只是因为河道的经常不修，水利工程的不兴，旧的灌溉事业与闸坝等的崩坏，农村的不事讲求，所以雨水多些或少些，可成为水灾或旱灾。至于兵灾与匪灾，那更不用说是人祸了。此外，在重重剥削下的农民，不能不年年缩小他们的生产，以至完全抛弃不能给与他们任何东西的土地，而流为兵灾，再进一步的来破坏农村经济。在全中国现在差不多没有一省没有灾荒区域。即以今年的一次大水灾而论，受到重大损失的已经有十六省之广。今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万万人口，变成了灾民，等待着饿死，病死与冻死。

然而一切这些，在任君等看来，都是促进中国乡村中生产力的发展的！

但是，在我们看来，要发展中国农村中的生产力，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商人，高利贷，资本家与富农的统治，只有消灭中国农村中占着统治地位的封建的剥削。然而这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

七，革命性质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我们和任君等对于中国**经济性质**不同的估计，当然会得出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不同了解。任君既然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自然中国的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然而任君也说中国的革命是土地革命！

综观任君的全部大作，任君对于中国土地革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实际上没有丝毫的了解。他只是把这许多名词连接在一起，乱七八糟胡说一阵，把一些人的文章乱抄一下，甚至把俄国马札亚尔的话抄上去当做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话，说这就是“理论”，真不免令人肉麻不止！

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现在任君既不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不主张消灭封建剥削（这些东西，在任君看来，都是人家在造的），那末还有什么土地革命？老老实实说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了，还讲什么土地革命？这是一。

一切少数派的“**著作家**”（客气些，称他们为著作家吧——梦云）都认为假使这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革命是民主资产阶级的革命，那一定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君也就是这一类人。在任君头脑中死也不会想出，除了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土地革命的“十八世纪的勾当”之外，还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土地革命的二十世纪的勾当！

任君等根本不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动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与农民。他们所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就等于打倒资本主义。却正相反，在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资本主义反而**能得到更快的发展**。这一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所以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

无论任君与严君等怎样乱七八糟说得天花乱坠，然而在他们估计中国革命的动力时，他们从没有把占中国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放在眼里。他们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

看不到其他任何阶级，虽是他们嘴上说些“革命的性质由于社会的阶级相互关系来决定”（严著，一五〇页）的空话。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托洛斯基主义者对于这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从来不能了解，而且也不肯了解的。

他们总是这样的想：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革命，既然中国的革命也要打倒资产阶级，那当然没有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他们根本不了解，需要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农民群众，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为了要肃清一切阻碍他们发展生产的封建残余。他们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有勇气反对地主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向他们的私有财产进攻，以至主张，“土地的社会化”，以至拥护“土地国有”的口号，然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共产。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想取得他们自己的私产。

这种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的革命**，与他们的政权——**工农民主专政**——的建立的观念，在任君等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关于这一点，他们的“革命大师”托洛斯基先生最近还做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诋为这是最反动的主张。**最反动的**，因为它主张领导这数千百万的**革命农民**，先行取得工农革命的胜利！抛弃对于这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坐在自己家里，空喊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的精髓！

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之中国无产阶级，绝对不能跳过这一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谁想跳过这一阶级〈段〉，谁就会使中国目前的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谁也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只有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在一起，中国的无产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组织广大的**贫农群众**于自己的周围，进一步的去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

所以不但从客观的任务上讲，而且也从革命的动力上讲，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这是第二点。

土地国有，是土地革命的最后的一句话，即是土地革命的最彻

底的实行,因为这是消灭中国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的最彻底的办法。但是土地国有的时候,必然是工农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在主要的许多省份成立的时候,即是无产阶级能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所以这口号的实行在**那时**更将帮助工人阶级进一步的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时**,土地国有将是趋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的开始。

根本没有闻过李银^①主义气味的任君,在这里引用了李氏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说的下面一段话:

“现在的时候,革命又使土地问题,比之一九〇五至〇七年成为一个更大更深更紧张的问题了。……战争使参战国落入向所未闻的痛苦,同时战争又非常迅速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垄断的资本主义变成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无产阶级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即指广大的农民群众——梦云注)不能限止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

“在这样情形之下,土地政纲中的土地国有,必然要有另一个形势了。就是土地国有已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字,而是趋向社会主义**第一步的开始**。……组织模范式的经济”。(《俄国农民问题与土地政纲》二八二页)

任君想拿这一段话来证明土地国有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引用了李氏的话,这真不免太滑稽了。想来任君从没有知道过,从二十世纪之初起一直到二月革命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政纲上明明写着土地国有的主张,但是布尔塞维克并不以为那时俄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吧。却正相反,李银等曾再三指出托洛斯基企图跳过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主张,实是倒置的少数主义,是俄国革命的取消主义者。当然,关于这些是任君等所不愿意讲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引用李银的话,只是为得要反对李银主义!这是他们的祖宗托先生的惯技!

拿李银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说的话,来反对李银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说的话,这除了有意曲解李银主义,对李银主义实行污蔑外,

^① 李银即列宁。

没有其他的意义。明明是反李银主义的托洛斯基主义，一定要利用一些李银的话做遮掩，真是何等的卑劣！

再进一步说来，土地国有虽是土地革命的最后一句话，虽是没有超过革命的民主资产阶级性的范围，然而这一政策，不一定在一切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段〉中所能实现的。在某种客观条件之下，这一政策，可以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之内，实现出来，在另外一种条件之下，这一政策一定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之内，才得实现。所以很明显的，革命的性质，并不以这一口号的实现与否而决定。这关于土地国有的口号是如此，就是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也何尝不是如此。譬如俄国的二月革命不但没有实现土地国有，而且也没有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中国则不然，在中国有些工农民主专政已经成立的区域，地主的土地已经完全没收，而且已经平均分配了一切土地。为什么？因为革命所处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但这是不是等于说，**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在任曙君等的“辩证法”看来，这也许是可能的吧。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革命所以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不但是因为客观的任务没有完成，而且也因为革命的动力是工农的。中国现在所有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革命现在所要建立的，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有中国**目前革命的取消主义者**，才会拿将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空话，取消目前工农的革命！

说到这里，我还很想告诉读者，任君等对于他们所最喜欢用来做攻击对方武器的二月革命的例子本身，同样的表示了空前的不了解。

任曙严灵峰等，只是利用李银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政权已经落到资产阶级的手里，所以民主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的话，以此来证明中国现在用不到任何工农民主专政，因此他们还公开的

反对在目前的中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他们完全不了解二月革命的特点，就是**两重政权**：一方面是没有任何权力的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一方面，是有大多数民众拥护的工人与兵士代表苏维埃。在《论两个政权》中，李银说：

“我们革命的奇特之点，大部分就是在他造成了两个政权。这件事首先就要认清，因不了解这问题，即不能前进。……”

“两个政权在什么地方呢？他在这一点上，就是除临时政府（资产阶级政府）之外，还成立了现在很柔弱的处在萌芽时期，但实际上已是无疑地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别一个政府：——工人兵士代表苏维埃。

“这另一个政府的阶级成份怎样呢？无产阶级与农民。这个政府的政治性质是怎样呢？这是**革命的专政**，即直接依靠革命的夺取，不按集中的国家政权所颁布的法律，而由民众直接从下创设起来的政权。这并不是存在于国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国家里而统治着欧美各先进国家的那种寻常形式的政权……”（《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二七——二八页）

在《我们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李银也同样的伸说这一特点：

“我们革命中最主要的特征，最足令人深思熟虑的特征，即是在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天内所形成的**两个政权**。

“两个政权，表现于存在两个政府的事实上：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资产阶级政府，即尔伏夫辈的临时政府，在他掌握中，有全部的政权机关。此外还有补充的，附属的，监督的政府，即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他手中，没有国家政权的机关，可是直接依靠于显然的无疑的大多数人民，依靠于武装的工人和兵士。

“两个政权的阶级来源及其意义，就是在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不但废除了全部沙皇的帝制，不但把全部的政权转给资产阶级，并且还往前达到了**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那种上述阶级的专政”。（同书，五九——六〇页）

对于二月革命的这一特点，是一切托洛斯基主义者所不愿意讲的，因为这不免违反了“打倒沙皇，工人政府万岁”的公式！一切不合于托洛斯基主义的东西，都应该削去或缄默不言，这样才能把

李银主义曲解成为托洛斯基主义。

“工农民主专政在二月革命中已经实现了”，这是任曙君等所不能了解，也是不愿了解的。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了解二月革命，不能了解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不能了解李银主义的全部策略。以至托洛斯基不能不在十月革命之后，在“十月革命教训”一文内，说到十月革命后，李银主义的“重新武装”了。（关于这些问题，将专文论及）

因为二月革命有那种特点，所以李银那时批评了加米尼夫的错误。加米尼夫的错误，正是和任曙君以及一切托洛斯基主义者一样，在于不了解这一革命的特点。他们中间不同的，就是加米尼夫根本认为那时还没有工农民主专政，所以还要求有一个这样的政权的实现，而任君等则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工农民主专政，而且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专政。

可见任曙君等，反对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而想跳过这一阶段的思想，实在不是偶然的。但这一错误实际上等于去取消革命！

我重复说，中国现在所要建立的政权，是工农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工农民主专政，当然同俄国十月革命中所实现的，一定不相同。中国不会有那样自己握有政权，而又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府的工农民主专政，这是很显然的。中国的工农专政将实现很多在俄国二月革命中所不能实现的任务，这也是无疑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不同是必然有的。

但是能够因为中国的民主专政，能实现许多民主资产阶级性的任务，同俄国二月革命不相同，所以说那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

为〈当〉然不！这是我所要说的第三点。

最后，任君写道：“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而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原书二〇六页——著者加圈——梦云）

我想这样不通的文章，只有任曙君做得出。既然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那还有什么土地革命，还有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社会主义的革命，而还说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真是莫名其妙！

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土地革命，实际上对于任君这类人，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只是为得要使人相信他们，他们也是主张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所以不能不拿这些名词来乱用一顿，结果闹出这样的笑话！

中国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没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国有，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他不但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这土地革命，是反对大资产阶级的，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却是有利的。

然而这土地革命成功后，并不将在中国开辟一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前途，而是将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它在革命中，终不停止于工农民主专政，而将进一步的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时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关于中国革命转变的问题，我想这里没有多谈的必要。然而只有了解到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人，才会了解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

很明显的，革命的转变问题，在任曙君等是不存在的，虽是他们嘴上吹着什么“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落到他们的手里，就会变成“断送革命论”！这虽是很可悲的事，然而这是事实！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日本东京

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

自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①颁布《劳动法》^②以来,差不多快要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半内,由于《劳动法》的部分的执行,工人的生活是部分的改善了,工人的积极性是大大的提高了。然而这一年半的经验同时告诉我们,这一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一年半的经验,要求我们的党与苏维埃政府用十分审慎的态度来解决我们在执行《劳动法》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使《劳动法》的执行更能够适合于我们目前的环境与需要。

第一、我们必须说,《劳动法》的执行,决不能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相抵触。巩固苏维埃政权,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目前的最高原则。而巩固苏维埃政权,首先就是巩固工农的联合。机械的执行《劳动法》,无疑会影响到农民群众,使他们发生不满情绪。

举些实际的例子吧。在赣东北的横峰县乡下有个雇农,名叫陈克思,十六岁,由工会青工部领导,同雇主订立了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上规定,实行每日工作六小时,不担四十斤以上的担子,工钱

* 这是一篇反对当时经济政策中极左错误的文章。文中较早地提出了发展革命根据地经济需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观点。文章最初刊载于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十期(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出版),署名洛甫。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领导建立的中央政权机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② 《劳动法》,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全文共十二章,七十五条。

从八元增到十六元。而他的“老板”却是贫农。另外有个十五岁的牧童，名叫吴树德，每日工作四小时，工资由四元增到十元，挑担子不得超过三十斤，而“老板”又是贫农。还有一个牧童过去没有工资，现在拿十五元。这样的例子不可以举出很多。（见赣东北少共^①省委组织部出版的《团的建设》第十三期）

同志们试想，一个贫农雇用一个月每日工作四小时的牧童，那他每天至少还须雇用两个以至三个牧童来养他的牛，如若这样，他必须每年花三十余元大洋。这当然是贫农所不能负担的。结果农民不再雇用牧童，而使牧童失业。这样，不但农民不满意，就是牧童也会怀疑我们的领导。

在许多苏区，现在都是这样的情形。农民对于工人工资的加倍增加与工作时间的减少，是不满意的。这种不满意，就值得我们党与苏维埃政府严重注意。我们不能简单的以“这是落后的农民意识”一句话，把实际的情形掩盖起来。应该看到，在苏区农村中，目前雇用辅助劳动力的，大多数是中农，而这些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却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的党与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用一切方法改良工人的生活，而这种改良，应是农民也认为必要，而且也认为可以实行的。

就因为这一原因，所以国际雇农工会^②在《关于中国雇农工会的决议》上提出把苏维埃《劳动法》“加以必须的修改，以便适合于农业的特点（农业与工业是不同的）”，并且提议“雇农工会必须会同苏维埃机关提出公布雇农劳动法的问题”（见《工运指南》一百八十五页）。这里，修改的原则显然是要使我们的《劳动法》更能适合于乡村，使我们在执行《劳动法》中巩固工农的联合。

对于沿门卖工的师傅，情形也是如此。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劳动

① 少共，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当时是少共国共（青年共产国际的另一译名）的一个支部而有此称呼。

② 国际雇农工会，红色工会国际（又译赤色职工国际）下属的一个产业工会。

者，虽是他们剥削他们的学徒。这些人也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的人。然而我们现在把《劳动法》同样的搬到这里来。我手头有许多全总^① 执行局送来的劳动合同。这些千篇一律的合同许多是师傅同学徒订的。我现在抄一个在下面吧。“成年工人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若多做时间，工资加倍。星期日不做工，工资照给，若要做时，须经过劳动部及工会同意，工资加倍。工人吃烟、穿草鞋、剃头等都要师傅负担，不得克扣工资。工人有病要师傅诊治，药费、工资应由师傅发给。工人去当红军，应要师傅发三个月平均工资。工人参加机关工作，要师傅发给一个月平均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若要开除工人须经过劳动部及工会同意，发给三个月平均工资”等等。工资则一般的每月从四十毛到九十毛。

试问在这些条件之下，这种沿门卖工的师傅，还有愿意再带学徒的吗？当然没有。这里师傅会不满意，学徒也会失业，而熟练工人会没有后代。这种《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工人阶级本身都是有害处没有好处的。我们的党与政府应该用一切力量，立刻改善学徒的生活，消灭师傅对于学徒的封建式的剥削，但同时必须要使师傅带学徒是有利的而不是贴本的。这种利益，实际上等于学徒学习技术的学费。而且这样的师傅，我们并不能把他排斥于工会之外。这里，显然的，苏维埃政府必须订立关于学徒的新的补充劳动法令。

其次，《劳动法》的执行决不能使我们苏区的经济衰落。发展我们苏区的经济是目前为中心任务。我们的党与政府，要在事实上证明给千千万万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面的以至苏区内的群众看：我们不但能够破坏旧的，而且能够创造新的；在苏维埃统治之下不但生产力不低落，而且迅速的发展；工人群众不是领吃懒做的“共

^① 全总，即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会的领导机关。一九二五年五月成立，其前身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被迫转入地下，一九三三年初又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产”，而是新社会的创造者。

然而我们在执行《劳动法》中，却表现了我们的党与政府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的许多不了解与漠不关心的态度。这里，我手头有许多商人老板给工会的请求书，从这些请求书中也可以部分看出，机械的执行《劳动法》的结果，必然是工商业的凋零。

这里举一个汀州市的例子。恩格斯路恒丰荣烟店共有资本毛洋四千角，曾由工会介绍二个半工人去做工。其中烟工人李振光，从头年十一月八日起至次年四月二十日止每月工资大洋二十元，又年关双薪二十元，年关鞋袜大洋五元，特别要求大洋三元等等，老板共计付洋一千四百五十八毛。然而尤其奇怪的是，这个工人并没有在店内做过一天工。这个工人大约是在苏维埃政府或其他地方做事或开会去了。因为依照《劳动法》第五十二条，“工人去参加苏维埃选举，出席苏维埃大会，参加职工大会或会议，担任工厂委员会的工作，被法庭叫去作当证人、鉴定人或陪审员等，在执行工作期间，无论时间之久暂，都不是克扣工资。”

在小的城市中间，对于小的企业主，不管他现在所处的情形，而想机械的执行《劳动法》上的第五条文，甚至还要添加许多花样（如工人是少先队队员，则老板必须发雨衣、梭标、制服、套鞋等等，过年除旧历年关双薪外，还有过年费，等等），那结果老板当然因为不能负担而关闭他的企业。这种现象，更因为党、政府与工会实行向资本家强迫介绍失业工人的完全错误办法的施行，在目前更为严重了。当然一些老板、商人关门逃跑，是因为他们想破坏苏维埃的经济，然而我们这种政策的结果，正给了他们以关门的口实，而且确有不少企业是因为营业的不能维持而倒闭的。

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最极端重要的。但是要使私人资本家投资到生产中或商业中来，那必须使他们有利可图，而不是亏本。世界上没有这样

的资本家，他的投资是为了亏本。

在这里，我们必须估计到，在目前苏维埃区域内，我们还没有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我们所有的大多数是小的，至多是中等的企业。我们想在这里把《劳动法》上的每一条文执行起来，当然是不可能的。比如一个铺子内有两个青工的店员，如执行工作六小时，那这个铺子从早上八点钟开门，到下午两点钟就得关门，不然他还得用两个店员。如若一个青工在苏维埃或工会中工作，那他名义上用两个青工，实际上只有一个青工。再如若一个青工进店不久，即当红军去了，那老板就得付他三个月工资。如若一个工人进来不到三天，他就自请辞职，那老板又须付他半个月工资。这样下去，当然不久这店铺就不能不关门。

所以在小的企业中间，《劳动法》的有些条文是不能机械执行的。在有些企业内，应该尽量改善工人的生活与待遇，增加工资，但工作时间却不能完全依照《劳动法》的执行。如木船工人、造纸工人，这里要实行八小时、六小时、四小时的规定就极端困难，虽是在劳动合同上是那样的规定着。我们完全不能同意木船青工因为要实行他的六小时工作，所以船撑到半路上就停下来了。这里需要我们执行《劳动法》时不是官僚式的下命令，而是能够具体的估计到企业的大小，企业的特点与实际情形，有伸缩性。而且有些条文（如关于三个月、半个月的津贴，可以自由的以开会或疾病等名义不上工等）必须立刻修改。工人也不能有意破坏或不执行他们自己所订立的劳动合同。在工人自愿的原则之下，在增加额外工资的条件之下，在私人企业内增加工作时间是可以容许的。

最后，在劳动合作社内，《劳动法》的执行更不能不有变通的办法。然而我们过去党与工人垢领导者都同样的把《劳动法》完全搬到这里来，结果事作社同样的因为赚不到钱而倒闭了。这样，合作社不能发展，发展合作社的口号变成空喊。甚至有这样滑稽的事情：在工人自己的合作社里，大多数的工人同工人自己选举出来的管理员订立劳动合同，照样的实行《劳动法》！因此，群众觉得，与其

加入合作社贴本，还不如摆些小摊子的好。

工人们在他们的生产合作社内，可以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可以尽量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使合作社的生产增加，商品的成本便宜，生意兴隆，赚钱多，结果工人的生活也可有更多的改良。就是生产与消费合作社雇用工人时，我们在执行《劳动法》时也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具体办法。

在国家企业内，《劳动法》上有些条文的机械执行，同样的会损害国家企业的发展。这里在工人自愿的原则之下，可以相当的延长工作时间与减低工资。经济核算制度同样的适用于国家企业之内。必须用一切方法提高国家企业的生产力，使生产合理化。在国家企业内的劳动纪律，应该是模范的。在这里，工人们必须表现共产主义者对于劳动的态度。

总之，一年半来在为《劳动法》的斗争中，使我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使我们更能够根据实际情形修改与补充我们的《劳动法》，使《劳动法》更能顺利的执行。在乡村中农业工人应该有农业工人专门的《劳动法》，对于沿门卖工者的学徒，应该有单独的学徒保护法令。《劳动法》本身也应该有很多的修改^①。这种新的劳动补充法令的订立与旧的《劳动法》的修改，不但不会引起工人的不满意，而且更能够引起工人对于党、工会与苏维埃政府的信仰。

《劳动法》的修改与订立不但是为了工农联合的巩固，为了发展苏维埃经济，而且也是为了工人阶级本身生活的改善。只有苏维埃经济的发展，才能使工人生活得到更大的改善，才能使工人免于失业，才能在生产中容纳更多的工人。在目前用“把资本吃完了再说”的政策，结果必然使苏维埃经济凋零，使工人失业，使工人的生活恶化。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代表一部分落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的

^①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九三三年四月开始修改《劳动法》，同年十月十五日颁布新《劳动法》，共十四章，一二一条，除对旧《劳动法》的某些过“左”条文作了修改外，还特别规定：雇用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小船主、小手工业者及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在得到工人与职工同意的情况下，“得免除本法的某些条文的拘束”。

意识,代表一部分工人眼前的狭窄的工团主义的利益,而牺牲了或损害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当然,就是我们有了更完善的《劳动法》之后,我们的党与工会还是需要更活泼的来实现我们的《劳动法》。我们的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必须更能适合于雇主的对象与雇主所处的经济情形。譬如在目前对于获得很高的酒菜馆,可以提出较高的要求,而对于无利可图的洋货业,则不能不提出较低的要求。一切这些,只有党与工会的正确的具体领导,才能做到。只有这样,才能适当的正确的去执行《劳动法》,才能不是条文上的,而是实际上的改善工人的生活,把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与忠诚提到最高限度!同时苏维埃政府应该给各级劳动部以执行《劳动法》的训令,告诉他们,如何在不同情形之下,对不同的对象,变通《劳动法》的执行。

必须最坚决的打击那些反对改良工人生活、反对实现《劳动法》上的一些基本条文、以为工人阶级在目前应该牺牲自己的基本利益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但同时必须同那些不顾任何情形企图完全机械的执行《劳动法》的“左”的倾向做斗争。这种“左”的倾向正是在给右倾机会主义者造成《劳动法》不适用于苏维埃区域内的理由与证据。“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里同样是互相帮助的,因此要顺利的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必须同时清除这种“左”的障碍物。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据调查,兴县二区 14 个村战前共 872 户,内富农 41 户,占 5%。现在共 897 户,内富农 50 户,占 6%。战前雇农 53 户,占全户口 6%,现在 37 户,占全户口 4%。富农雇农合计,战前占全户口 11%,现在占 10%。若按一户雇农出一个雇工计,战前每户富农平均雇佣不到一个半雇工,现在平均不到一个。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成份在农村是很微弱的,封建的成份,即地主与农民的成份,还占优势。

但农民已起分化。除富农、雇农外,农村人口的大多数,是中农、贫农小资产阶级成份,这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园地。

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不会运用新民主主义政治力量,推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甚至机械了解“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以为,晋西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晋西北今天的经济,也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了。

应当知道:什么是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发展它?

晋西北封建势力还强大,农村资本主义只是萌芽,工商业资本

* 这是张闻天在晋西北调查之后写的一篇论文。当时党的农村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张闻天在这里对中央的政策作了深入的探讨,其根本思想是强调落后的中国农村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以加快发展生产力。“新式资本主义”这个词,毛泽东 1944 年也曾用来概述过新民主主义经济,及至 1948 年他则提出今后不用这个词,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张闻天这篇文章生前未曾发表,1989 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 29 辑首次刊载时,标题是编者拟的《关于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本书这里用的是作者的原题。

家根本没有。封建剥削制度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可使社会进化的。封建剥削制度下，地主出租土地，农民租进土地，土地使用很分散。地主以高额地租盘剥农民，而农民缺乏生产工具和资本，生产情绪不高。所以农业生产力是低下的，农民生活是痛苦的，社会也是贫穷的。

在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下，首先是富农经营自己土地，并雇长工。土地集中使用，而又合理分工。富农饲养牲畜猪羊，经营工商业（油房、粉房、磨房、染房、商店等），自己有工具，有肥料，有资本，可以把土地耕种好，多打粮食和棉花。土地产量越高，对富农和资本家越有利（所以他们不象地主那样对生产漠不关心，当寄生虫），对全社会更有利。资本主义经营，可使商品经济园艺业等发展，因工业需要原料，商业需要货物，富农和资本家又需要货币支付工资和投资工商业。我们在晋西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定要靠农业积累资本。将来社会主义，又要靠新式资本主义发展做基础。

为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第一，不要怕晋西北资本家多。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一个雇工，垄断不到一百垧山地，这有什么不得了呢？倒是应该限制地主，奖励农民，才合我们的政策。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

为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第二，不要怕农民受苦，就是说，不要怕雇农多，没法安插，失业、工资低、生活恶化。今天雇农、贫农的生活，都是很苦的。说贫农永远比雇农生活好，贫农不要丢失土地当雇农，这是落后的想法。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的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只要资本主义发展了，工人生活一定会改善。因为革命政府颁布劳动法令，限制富农资本家随意剥削工人，政府将有计划从农村征调工人，不会造成农村无政府状态，

造成农村破产。

所以，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

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

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

在合江^①的群众已有初步发动、土匪已经开始肃清、民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之后,正确的规定与执行工商业政策已经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今后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则人民经济生活的真正改善是不可能的,因而根据地的真正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对于几个有关工商业的主要问题作如下初步规定,望各地党委讨论执行。

关于私资与公资

一、为繁荣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承认,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过去为了打垮城市中敌伪反动势力的统治、发动基本群众、彻底改造旧政权而进行的反奸清算运动^②,是必要的,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但在这个目的初步达到之后,我们即应停止城市中的清算运动,而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繁荣工商业方面去。沉溺于城市的清算运动,模糊我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对于封建主义的政策的基本原则

* 这是为中共合江省委起草的决议,也是解放区中最早对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作出比较系统政策规定的文件之一。

① 合江,当时的一个省,位于今黑龙江省东北部。一九四九年四月同松江省合并,一九五四年六月又随松江省同黑龙江省合并。

② 反奸清算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新解放区的农村和城市普遍开展的,一次清算汉奸、恶霸的罪行,收回被他们霸占的土地、财产的群众运动。

区别之偏向,是应该纠正的。我们应该劝告与鼓励纯正的工商业者恢复与继续他们的工商业活动,同时有一切可能方面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与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与安全。一切侵犯工商业者正当权益的行动,必须严格禁止。

二、公营资本在繁荣工商业方面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排斥与吞并私人资本,与民争利,而是在调节私人资本的活动,补助私人资本的不足与缺陷,使之与支持长期战争的需要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相符合。但能够起着这种照顾全局的调节与补助作用的,只有大公家^①的资本。至于小公家的资本,一般都是为了解决本单位供给上财政上的需要,往往只照顾本单位的局部,不照顾全局,容易与民争利,破坏政策,因而小公家资本的活动范围是应该受到限制的。它们使用各种特权同私人资本争利的一切举动是应该禁止的。

贸 易 政 策

三、凡是遵守政府法令的贸易,在我们地区内是应该自由的。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大地主大买办所实施的统制贸易^②。为使我区的大量农产品(如豆子、麦子、高粱、小米、烟叶子等)及加工业品(如面粉、油、酒、豆饼等)大量输出换入工业必需品(特别是布匹与盐等),我们应该鼓励私人贸易的发展。一切妨碍私人贸易的障碍物(如许多不必要的关卡、税收、摊派、检查与没收,以及强占商店商场等),必须坚决废除。这里还应再一次指出,一切

① 大公家,这里指由省、地区、县所掌握的公有经济。小公家,指党政军各机关、单位所有并经营的经济。

② 统制贸易,原指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时期日伪政权在商品的收购、供应(配给)、输出和价格等方面实行严格“统制”的贸易,其“统制”形式包括由日本垄断资本和伪满政权合资经营所谓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强令民间企业按行业组成“组合”,指定配给店实行专卖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各种垄断性商业机构所控制的贸易,也具有类似性质。

伪满时代的“军用品”，除枪支武器外，均得自由出卖，不得任意检查与没收。

四、本省贸易以后均统一于省政府的贸易公司。每个县以后只能有一个商店^①，直接受省贸易公司的领导，执行党的统一的贸易政策。军区如经营商业时，亦应服从省政府的一切法令，并受省贸易公司之指挥。为避免特殊，公家贸易人员以后一律穿着便衣，不得携带武装警卫员。其他小公家的贸易，连粮食的贸易在内，一律禁止。过去有些机关或单位依靠军政特权而进行的贸易，不但破坏了工商业政策，而且也损害了自己。既解决不了自己的供给问题，又腐化了自己的一部分干部，使干部放松了对业务的掌握。实在是利小害大的小公家的各种商店，必须于最短时期内宣告结束。

物 价 政 策

五、为改善农民生活，使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格不致相差太远，农产品价格的自然上涨或有间的酌量提高，是应该的。为了大小公家的局部利益而有意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是错误的。这种政策只对少数市民及小公家有利，对大多数人民、对大公家都是不利的。

六、大公家的贸易机关必须善于掌握物价政策，使之有利于工业品的输入与农产品的输出。大公家的贸易还应善于吸收或抛出物资以提高或压低物价，使之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单纯的财政观点或盈利观点，是错误的。同时政府方面必须及时使用政权力量同投机操纵、囤积居奇者作斗争。

^① 这里所说的商店，其地位相当于县贸易公司。

工 业 政 策

七、为鼓励重要工业部门的发展，政府对工业家恢复与发展生产的企图，应给予特殊的保护与帮助。一切妨碍生产的不法行动（如占领厂房、低价强买，买货不给钱等），应一律禁止。银行对重要工业部门，应给予必要的贷款。

八、大公家的公营工业（军事工业除外），应一律采取经济核算制，并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同私营企业实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不得借特权的保护，吞并或排斥私营工业。真正公私合营的企业，须根据公司法或习惯法，实行民主的管理。公家人不能利用其公家的地位，把持一切，使私资代表处于帝观或无权的地位。相反的，我们应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以改造生产事业。“好汉股”^①类的公私合股，一律禁止。小公家的小手工业生产，在其上级机关允放垢条件下是可以发展的。

工 资 政 策

九、工资政策的正确与否，对发展工商业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酌量提高工资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是必要的。但片面的、不顾一切的提高工资的方针，则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是工商业的衰落，因而也增加工人失业的机会。根据最近多方面的经验，分红制对劳资双方有利，既可发扬工人的劳动热忱，又可提高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是对发展工商业有利的好办法。因此，我们必须很好研究各生产部门的具体情况，细心的具体实行。

^① “好汉股”，原指旧中国恶霸、豪绅、军阀特别是黑社会头目，利用权势，分文不出或象征性出一点钱，就算入股，逞强分红。这里借用此词来表示我党政军个别单位不应该有类似行为。

税 收 政 策

十、税收政策不应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相对立。反之，它应该是帮助工商业发展的有力武器。为此，各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以及县与县间的过境税（这等于变相的厘金等），应该取消。对工商业除少数出厂税、面粉税、酒税外，只收营业税。为避免人力与物力的浪费，免除税收人员的贪污中饱，以后营业税一律采取合理摊派的简单办法。省的过境税的征收目的，不过是为了相当调节省与省间的贸易，鼓励农产品的输出与工业品的输入，并非要实行封锁性的关税政策。因为我们现在的出口，是向着自己的邻省，而不是向着敌占区。

十一、国营工商业机关，除特许者外，同私营工商业机关同样纳税。为保证省方需要，面粉出厂税、酒税、省过境税归省征收，其他则归地方。

合 作 社 的 建 立

十二、在发展工商业方面，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生产与消费合作社，应该起很重要的作用。各地方党应根据人民切身的需要，帮助建立民办合作社。首先在一个区、一个乡，建立一个典型性的，先行突破一点，然后再向其他地区发展。官办的、强制性的、形式主义的合作社，一律禁止成立。

加 强 领 导

十三、为加强对工商业的领导，省委、地委或中心县委下应设财经委员会，以掌握与监督经济政策的正确执行。此外，必须教育所有党、政、军干部紧紧把握住长期打算的观点，反对“抓一把”观

点,加强群众观点,抛弃本位主义观点。我们必须同心协力保护与发展工商业,同各种乱摊派、乱没收、敲诈勒索、横行霸道的各种倾向作斗争。只要工商业繁荣起来,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政府的收入自然也会增加起来,大小公家人的生活自然也会得到改良。老百姓丰衣足食了,作为老百九事一部分的公家人自然也丰衣足食了。人民的利益同公家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

今天,我还要把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讲一下。

同志们大多是做农村工作的,大家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的方向是农业集体化,今天为什么还不搞集体化呢?回答是因为今天还为时尚早。须知我们要利用国家的经济力量,使农民走向集体化。小商品经济走向合作的方向,需要国家与农民的结合,这中间还有个斗争过程。只有国家工业化,农民才能集体化。国家经济与小商品经济结合了,私人资本主义的中间剥削就只占附带的地位了。

目前农村的经济,主要是个体分散的、无组织的经营。党的方针是集体化,但今天还不能办。过早提出农业集体化,会妨碍农村经济的发展。春耕开始时,好多地方搞集体化,普遍组织起来,搞集体喂马。这种换工互助中的强迫命令的集体化,结果是垮台、失败。今天的换工互助只能在农民个体私有的基础上,在自愿两利的原则下,进行某种劳动的互助才是可能的。这是农业集体化的萌芽。

农民今天担心的是,分到的房子、牛马、土地,是不是成为他的私有财产?我们只有巩固农民的这种私有财产权,才能发展农业生产。今天政府出了布告,宣布保护私有财产权。但农民还是不放心,

* 本文是张闻天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各地区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联席会上所作报告的节录。标题是编者拟的。张闻天时为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做此报告时,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东北全境接近解放,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乡村转向城市。报告在此战略转变之际,结合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实践,及时回答了农村为何不能过早实行集体化的问题。

这是由于我们在插犍换工^①中强迫命令的搞集体化的影响造成的。

我们今天搞插犍换工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要使农民觉得有利他才自愿。农民今天不愿组织换工,自己去搞也是可以把地种好的。强迫命令不但对生产没有好处,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农业集体化是将来的方向。要使农民走上集体化须做两件事:一是说服教育,二是做出样子给他们看。在目前个体经济的条件下,他乐意自己干也可以,急性病对于农民的生产发展没什么好处。这种做法是否会向资本主义发展?是否有害呢?我们说,没有什么危险。这样做下去,大部分农民都会成为中农,少数发展成富农,这种状况,我们还是可以允许的。它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将来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经济,中农是要占多数的。

组织互助换工的基本问题,是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如不愿合作,可以自己干。个体经济的提高是逐渐的。我们应该知道,农民是私有财产者,不是共产主义者。农民的个体私有财产权巩固起来,会不会妨碍集体化?不会。农业集体化是在提高农业技术、使用机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插犍换工,互助合作,还是个体经济,它只是集体化的萌芽。真正的集体化要有机器。列宁讲,有十万台拖拉机加上苏维埃政权就可以实现农业集体化。东北搞农业集体化是有有利条件的。用粮食进行对外贸易,可以换点机器。将来像鞍山这样的重工业企业,我们也可以自己搞。东北如有两万台拖拉机,加上新民主主义政权,农民也可以走向集体化,走向社会主义。当然,只有机器而没有工业化的基础,农业集体化也是不会搞好

^① 中国农村旧有的劳动互助形式。犍是牵引犁、耙等农具的畜力单位,能拉动一张犁或耙的畜力(如一头大牲口,两头或两头以上小牲口等)叫一犍。插犍即由两户或几户农民将各自的单只牲畜合成一犍,各户轮换使用,无牲畜的以人工抵换畜工,解决畜力不足的困难。换工则泛指两户或几户农民之间的换工互助,可以是人工换人工,可以是人工换畜工、畜工换畜工。

的。

有了机器还不能一下就做到集体化。还要先从国营农场开始试验,农民看到了机器,思想上会起新的变化。他们看见机器有好处,也想弄几台使使看。自己有了机器,就会感到一小块块土地种起来不方便,不如大块好,省工又方便。他就要合作入股,由合作而集体化。农民要从切身利益的体验中感到有好处,才会组织起来,欢迎拖拉机,走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要大家吃的好,穿的好,生活都能改善。所谓共产共妻,那是资产阶级的谣言。今天农民的生活还穷困,他们要巩固其私有财产权,是想能发财致富,改善生活。将来有了拖拉机,也不能强迫农民搞集体化。他们还要看一下行不行,也还有少数顽固派。总之就是说,要有一个过程,这里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机器,一个是说服教育农民。所以好多同志今天就想去搞集体化,是集体不起来的,硬搞只有垮台。

今天我们强调了自愿,那些鳏寡孤独无劳动力,他们的地种不上怎么办?可以照顾。但不是强迫命令去照顾,强迫命令去照顾,会使劳动力多的不积极,照顾要有一定的代价。劳动力多的可以出卖功夫,牲口也可以记分。总之,要使劳动力多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出来。好多同志的思想总是不解放,头上套了一个紧箍咒,头脑中总是在想集体化。生产换工组垮了台,不去研究其中原因,而是下命令马上组织起来。农民对这种做法的反应是:是公家叫我们组织起来的,不组织起来对不起公家。这样做的结果是,工作人员去了,农民就“集体”,走了就分散,对我们应付。现在,自上而下关于农民有组织地搞集体化的假报告是很多的。这是好心好意的主观主义。农民不愿意甚至反对的事,我们又何必勉强他们去干?即使勉强干了也会失败。

农民的私有财产权要巩固起来,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今天这样做,明天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不是更困难了吗?我们说,今天不巩固农民的私有财产权,他们就不会走向社会主义。应该看到,今天

农民的私有财产权，比封建的私有财产权是进了一步的。我们对私有财产应该有历史的观点。奴隶社会有了私有财产，比原始社会进了一步。原始共产社会好是好，但没饭吃饿死人啦！奴隶社会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提高了，封建社会又比奴隶社会进了一步，今天消灭封建制度后的农民私有财产是更进了一步。所以，今天巩固农民这种私有财产权，应该说具有进步的意义，破坏这种私有财产权，才是反动的思想。在今天的条件下，就要实行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倒退的，破坏性的，是反动的。道理很清楚，因为今天只有巩固了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农民才会拥护你，才能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私有财产权的巩固，要与革命的基本利益结合起来。农民要翻身，就要依靠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你要保护已经得到的私有财产，就要参军，交公粮，支援前线。只有这样，私有财产权才能得到巩固。没有共产党，蒋介石来了什么都要落空。这就使巩固农民的私有财产与革命的利益相结合了。农民巩固了私有财产权，就会拥护共产党，依靠共产党。因此，今天巩固了私有财产权，将来才会取消私有财产权，这是与共产主义完全吻合的。真理总是具体的，要看什么经济基础与历史条件。

关于东北经济的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

一、东北经济基本上是由以下六种经济成份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这里苏联国家企业都用“秋林公司”名称)。(尚有少部分自然经济，因意义不大故略)。正确认识这五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和发展趋向及其相互关系，是正确决定东北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也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在经济战线上把握住正确的阶级路线。

二、国营经济。东北的国营经济，由于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较之其他解放区都要发展。所有大的企业，差不多全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如铁路、电气业、煤矿、铁矿、邮电、航运、金矿及其他各种矿山、林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造纸业、盐业，以及银行、对外贸易、国营农场、大的贸易公司等；无不掌握在国家手中。应该说，在东北城市工商业中，国营经济是已经占了领导的地位。这些国营经济，是当前支援前线争取胜利的最重要的物质力量，是同乡村农民在经济上结成联盟的有力依靠，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进行阶级

* 本文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文件，文件上报中央后得到中央的肯定。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结构和经济建设方针的基本设想被中央采纳，吸收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之中。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选集》收录了经中央修改的稿本，本书这里所收的是张闻天亲自修改定稿的上报中央的稿本，同时将中央修改的稿本附于文后。

斗争的最有力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因此，我们对它必须加以特别的关心、照顾与扶持，要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位，尤其是工业，尤其是工业中的重工业与军工工业。我们必须节衣缩食，用一切方法挤出资金来，以恢复与发展国营经济。任何轻视或忽视恢复与发展国营经济的观点，任何把恢复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不去有意识的掌握这一国家经济的命脉，不去强化这一经济力量，它就会遭受不可补偿的损失，以至失败。

当然，在国营经济所经营的事业方面，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投资与经营，带有一定程度的甚至完全的排他性（如一定程度的或完全的垄断，如大生产挤掉小生产等）。但国营经济的这种排他性，不能被认为“与民争利”或“大鱼吃小鱼”。这是先公后私，是人民暂时利益服从于长远利益，是大生产代替小生产，是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是进步代替落后。而国营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对国计民生有益的事业还很多，因此，私资的活动地盘仍然给留着的。公外是仍然有私的，排他性与共存性是同时存在着的。这就是“公私兼顾”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

目前国营经济的基本缺点，是一方面缺乏集中统一的计划性与合理的管理掌握，而另一方面在集中统一下充分发挥各地党政机关的人力与物力还很不够。这一基本缺点，今后必须努力克服。

三、合作社经济。东北的合作社经济，在生产与供销（消费）方面，已经开始发展，但也还只在开始。现在的合作社主要还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即毛主席所说的“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它们在东北农村中虽较普遍，但问题还很多，还很不巩固。在城市中还有手工业合作社，但为数极少。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在城市中虽有，大都等于合股小商店，并未真正起合作社的作用，在乡村中差不多还没有。

我们认为，把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组织在劳动互助组一类

的合作社的工作，今后必须严格根据自愿两利的原则，使之巩固，并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发展。这种合作社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劳动互助的习惯，给将来农民的集体化准备有利的条件。但把小生产者组织在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今天也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只有生产合作社而没有消费合作社，虽在小生产者与国家之间还缺乏一个经济的桥梁，一根经济的纽带，把小生产者与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把小生产者的生产合作社与国家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反之，如果我们在农村中城市中普遍的有了消费合作社，国家就可以经过这种合作社去和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直接结合起来。国营经济生产的日用必需品，可以经过消费合作社合理的分配给小生产者；农民、小手工业者的各种生产品，国家又可以经过消费合作社去有计划的收买，然后由国家出卖、出口或制造。这样，国营经济可以得到丰富的原料，粮食与各种生产品的供给，掌握有充足的物资，去进行生产分配与出口，去同各种破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投机操纵作斗争，而小生产者既可出计划的出卖他们的生产品，把他们的生产品去交换他们的日用必需品，又可免除商人资本家的中间剥削。国家同小生产者的这种经济结合，自然更会刺激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因而进一步推进生产合作运动的发展。故发展消费合作社目前必须十分重视。

由于东北国家政权比较集中，交通便利，人民日用必需品（如油、盐、布、煤、木材、火柴，部分粮食等）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消费合作社应当是群众的普遍的经济组织，正像人民代表会议是群众的普遍的政治组织一样。但其具体实行的步骤，仍然应该根据有重点的，由点到面的逐步推进的原则。

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国营经济没有合作社做基础，它在经济战线上就会孤立无援。国营经济只有同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才能有可靠的经济上的同盟者，去同各种投机倒把，同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破坏活动做斗争，使新民主主义的

计划经济取得优势。而合作社经济,也只有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免除商人资本家的中间剥削,而大家富裕起来,才能使他们从国营经济方面得到各种机器而真正集体化,才能使他们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这种合作社经济,其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一天天增加。但这种合作运动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坚强的党的领导,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有力的直接的关心与支持、对于这两方面,我们过去都注意得非常不够,今后必须大大加强我们的工作。

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特别显著的类型:如出租制,国家把自己无力开发的林场、农场、渔场以至矿场出租给资本家开发,同资本家订立一定年限的合同,规定双方便利的条件,资本家负责开发,取得利润,国家给资本家以一定的便利条件,并从资本家方面取得一定的租额;如加工制,国家给资本家以原料,订立加工合同,资本家为国家生产成品,交给国家,挣得一定的利润;如定货制,国家向资本家定购一定数量与质量的成品,资本家从此获得利润;如代卖制,国家给一定的私人商店或百货公司以成品,由该商店或该公司推销,资本家从中挣得一定的商业利润等等。现在东北加工制的形式比较发展,其余的形式,还在开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与交换的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最为有利,因为这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来利用私人资本,并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经济所需要的资本,一般的不是一个小资本家的资本所

能承担,而必须是许多资本家的合资或合伙,这可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

这种经济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式,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的加以提倡、组织与扶助,特别在开始时,应给以优越的有利条件,并保证其原料、粮食等的供给以及运输的便利。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有利的方向。

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还做得很少,我们过去还只是自发的、被迫的、盲目的做了一些,我们还缺乏自觉的、主动的去做。在这方面,我们还需在干部的思想克服许多阻力。有些我们的干部,现在对于发展一般私人资本主义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甚至还有过分迁就私人资本家的态度,而对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则往往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特别对于出租制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宁愿把天然富源荒弃着,不愿给资本家开发,怕国家受损失,赔本。他们还不了解,把一切富源开发出来,增加社会的财富,即使利用的是私人资本,仍然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有利的,虽然给资本家交纳了一定的利润。在国家无力经营的地方,在私人资本的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地方,如果采取排斥私资的态度,是错误的。

五、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由于战争的关系,目前私人资本主义偏于商业投机及部分军需、民用的小机器工业及小手工业方面。较大的私人资本也因此一般是向着分散,而不向着集中。由于国营经济力量的有限,由于合作经济的不发展,由于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需要,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与必要的。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的发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建设的与积极的意义,决不可轻视。同时,由于国家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强大,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是可怕的。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就是把所需要发展的

私人资本,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除把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成为战争与民用服务。我们的各种经济政策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而凡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无利可图,因而使之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过剩的商业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这就是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鼓励与限制的标准,也即是联合与斗争的标准。

但一切私人资本主义,即使是国家资本主义也罢,既然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政府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所以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操纵、同它的破坏性的经济活动作斗争,是今后经济战线上的经常任务,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私人资本向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减少它的破坏性,增加它的建设性。

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天已经落后于国营经济,将来还会落后于合作社经济,其比重是不算大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轻视它的作用与意义,尤其因为它在小商品经济中有着它的深厚的根源。因为小商品经济,照列宁的说法,是每日每时生长着资本主义的。因此,如果我们放任私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则私人资本会通过自由贸易去联合小生产者,而发展生产与交换中的商品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活动与投机倒把,来破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任何计划性,而使国民经济向着旧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因此,为了使私人资本不起这种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还要使它成为国营经济在组织小生产者的合作事业中的一个帮手,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至于一般的私人资本家在我们的管制与监督之下如何去投资发财,那是用不到我们去给他们一个个操心的。他们在这方面确实

比我们有更多更丰富的经验。相反的,在合理生产的技术方面,在经济核算方面,我们还应该好好向资本家学习。

六、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主要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在数量上占完全的优势。斯大林说:“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小商品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他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像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定要发生的情形这样。”接着斯大林解释农民经济“这样不稳固”,“这样不独立”的原因时,又说:“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散漫,无组织,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信用系统,依赖国家政权性质。最后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原因,即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农村都是跟着城市走的,而且一定是跟着城市走的。”

显然的,这种小商品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也是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的。这已经在东欧的许多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得到了证明,而且也将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得到证明。但正由于我们这里,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所以小商品经济的最后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还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斗争过程。

我们对于小商品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现在一方面要用一切方法巩固他们的私有权,而同时又要要在他们个体的私有经济的基础上,鼓励他们的生产热忱,使他们努力生产发财致富。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根据于小生产者自愿两利的原则,把他们组织在各种合作社里,不但不应动摇他们的财产私有权,不但不违反他们的发财致富的要求,而且正是为了使他们更能迅速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发财致富。这种合作,对于小生产者本身是很有利的。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强调:第一,小生产者的这种合作,是以他们的个体私有经济为基础,是以落后的手工业技术为基础,因而决不是、也不能是农村的集体化。以为经过这样的合作,我们立即可以

走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第二,因为小生产者的这种合作,是根据于“等价交换”、“按劳得值”的两利原则、因而在合作的小生产者内部,是必然会由于勤劳程度的不同而存在有或发展有穷富不齐的现象。第三,因为这种合作社是根据于自愿的原则,小生产者可以而且应该有完全的权利加入或退出合作社,因而除已经组织起来的小生产者外,独立的无组织的小生产者的存在,也是必然的,而且甚至会很多的。由于以上情况,因而在发展小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在农民小生产者内部的某种程度的分化,将是必然的与不可避免的。少数的农民小生产者在今后将会上升而为富农或小资本家,另一部分农民小生产者,则会下降而为贫农雇农,为半雇佣或全雇佣的劳动者。这是社会生产力向上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用不到害怕的。只要我们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并且能够经过发展合作社的道路,使大多数农民小生产者都上升为富裕的农民,为富裕的手工业者,而不再重抄旧资本主义时代少数人上升为富农资本家而大多数人陷于穷困与破产的悲惨境地的老路。但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过程,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力量,克服各种阻力,才能取得确定的胜利。

在小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与旧资本主义将必然会发生争夺农民小生产者的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将用一切方法,把农民小生产者组织在合作社内,使之与国营经济结成巩固的联盟,以利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而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切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的残余协助之下,也将用一切力量,争取农民小生产者,使之向着旧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而农民小生产者呢?他是劳动者,因而只要我们政策上不犯错误,他们是愿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组织起来向合作经济的方向发展的;但农民小生产者,同时又是少部分生产品的出卖者,他们带有或多或少的小商人的投机性,这就造成了资本家商人争取他们与其合作,来反对国家对于商品的资本主义进行管理与监督的可能性。这种危险的发展,是我们必须清楚看到而加以防止的。

如前所述,私人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而在于小生产者的小商品经济。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在于使资产阶级从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那里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陷于孤立,而使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要做到后者,特别使小生产者在经济上也处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把他们组织在合作社中之后,小生产者固有的那种弱点,如无组织性、散漫性、动摇性、投机性、极端自私性、偏狭性等,还会在合作社内部同无产阶级的领导进行或大或小的对抗的。如果无产阶级的领导缺乏坚定性,而向着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投降,那合作社也会变质而向着私人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显然,资产阶级是会利用一切方法使合作社变质的。争取小生产者的阶级斗争,在合作社内,还会长期的存在。

所以,对小生产者的各种弱点进行必要的斗争并加以克服,实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不可分离的部分。这种斗争,不但在合作社内,甚至在国营经济内,甚至在共产党内,是同样存在着的。而要克服小生产者的这些弱点,如果采取行政的强迫命令的办法,那是一定会失败的,只有采取毛主席所指示的“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办法,才能收效。这也就是斗争的困难与曲折之所在。但我们相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胜利与国营经济的发展,还是会保证这一斗争最后胜利,使小商品经济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民手工业者,在前进的道路上,根据其切身经验,会最后了解到,只有合作社化,只有把合作社同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才能使小生产者免于分化,免于少数人上升为资本家,大多数人沦于贫穷与破产的境地。也只有如此,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才能真正结合起来,并使这种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服从于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最后走向社会主义。

七、秋林式的经济。这种经济在东北虽有,但并不占如何重要的地位。这种经济是我们国营经济的很好的朋友。它的发展,对我

们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它同蒋管区的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本不同之所在。这必须使我们的同志有原则的、本质上的认识。

八、这就是东北经济构成的具体内容。一般说来，所有上述的五种经济成分，现在都应加以发展，但在发展中，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阶级路线，这条路线应该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紧紧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改造小商品经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这条路线是力争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的路线。只有这条路线，我们才能顺利的加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并给社会主义的前途开辟道路。反之，我们如果把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同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如果我们想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向资本家的要求表示无原则的让步，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投降，那我们就不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只能建设旧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那时，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将因为缺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不能巩固与持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必然将会因此蜕化而为旧民主主义的政治，而这在实际上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条路线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路线。这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路线。

应该清楚的看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有意识的在我们党内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在每一个具体的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左右摇摆。

只有根据这一条阶级路线，才能制订出明确的经济建设计划，减少盲目性、减少自发性，少走弯路。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具有明确的计划性，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的布置我们的人力与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

附经中央修改的稿本：

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

一 东 北 经 济

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份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尚有小部分自然经济，因意义不大，故略)。正确地认识这五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是正确地决定东北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也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在经济战线上把握住正确的路线，实现无产阶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领导。

二 国 营 经 济

东北的国营经济，由于东北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比较中国的其他地区都要发展，所有大的企业，差不多全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如铁路、电气业、煤矿、铁矿、航运、邮电、金矿及其他各种矿山、林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造纸业、盐业，以及银行、对外贸易、国营农场、大的贸易公司等，无不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国营经济，在东北的总生产量中虽还未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但已占有很大的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东北城市工商业中，国营经济的这种领导地位更加明显。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当前支援人民革命战争，争取胜

利的最主要的物质力量；是城市无产阶级同乡村农民在经济上结成联盟的依据；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它必须特别关心，使它获得一切可能的发展，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的地位，尤其是工业中的重工业与军事工业应当如此。我们必须节衣缩食，用一切方法挤出资金来，以恢复与发展国营经济。任何轻视或忽视恢复与发展国营经济的观点，任何把恢复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果不去有意识地掌握这一国家经济的命脉，不去用一切可能的和正当的方法并在一切方面强化这一经济力量，它将会遭受不可补偿的损失，以至最后的失败。当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在这个矛盾上的斗争，特别是在这个矛盾上的长期的经济竞争，将要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普通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国营经济在目前还有很多缺点，除开战争状态在经济上所造成的各种破坏与困难而外，目前我们还很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事业，有不少的经济单位是管理得极坏的，以至经常赔本。此外，由国家有计划地合理地去集中统一管理一切国营企业也还不够，许多企业仍然是各自为政地去独立经营，在各个国营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因而就更加造成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混乱。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路线还不够具体与明确，有许多同志还常常用一种旧的资本主义的办法，或者用官僚资本主义的办法去经营与管理国营经济，因而就使国营经济不能很好地领导市

场,领导整个国民经济,服务于人民大众。因此,我们必须用心学习管理经济,必须由国家统一集中管理一切国营经济。一切国家经济机关,必须在统一的法律、制度和计划之下,在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的指挥之下,去进行经营管理,首先消灭自己的无政府状态,并与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斗争。为此,就必须由国家颁布严格的法律,规定严格的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机关,并按各个产业系统,实行适当的分工,建立各种公司与托拉斯,在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分别的经营。原料的供给,工人、职员雇请,成品的运销,流动资金的调剂等,都应建立专门机关统一管理,并须适当地规定各个地区各个时期收买原料和推销商品的统一的价格政策,不许各个国营企业用不同的价格到市场上去竞争。国家银行必须普遍发展其促进生产、稳定市场的社会业务。除国家总的银行外,还必须建立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储蓄等各种专业银行,去分别进行各方面的银行业务。如此,就会使所有的国营企业,在统一的计划之下去经营。如果再经过合作社系统,去结合广大的小生产者,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并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一部分私人资本也吸收在国营经济体系之内,就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有可能把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加以组织,使它成为有计划的经济,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恐慌。

三 合作社经济

东北的合作社经济,在生产与供销(消费)方面已经开始,但还只是在开始。

现在的合作社,主要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即毛主席所说的“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①。它们在东北农村中虽较普遍,但其中的问题还很多。在城

^① 见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市中还有手工业合作社,但为数极少。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在城市中虽有,但大部等于合股小商店,并未真正起合作社作用,在乡村中则还很少。

我们认为,把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组织在劳动互助组一类的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后必须严格根据自愿和两利的原则,使之继续发展。这种合作社可以提高生产力,以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的习惯,给将来农民的集体化准备若干有利条件。但把一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组织在供销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天更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的注意。只有生产合作社,而没有供销合作社,则在小生产者与国家中间,还缺乏一条经济的桥梁和一根经济的纽带,把小生产者与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把小生产者的生产合作社与国家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反之,如果我们在农村中、城市中普遍地有了供销合作社,国家就可以经过这种合作社去和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直接结合起来。国营经济生产的日用必需品及手工工具、农业用具等,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合理地分配给小生产者;农民、小手工业者的各种生产品和原料,国家也可以经过供销合作社去有计划地收买,然后由国家配给各工厂,或出卖,或出口。这样,国营经济可以得到丰富的原料、粮食与各种生产品的供给,掌握着充足的物资,去进行生产分配与出口,去同各种破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投机操纵作斗争,而小生产者又可有计划地出卖他们的生产品,用他们的生产品去交换他们所需用的各种必需品,免除商业资本家的中间剥削。国家同小生产者经过供销合作社的这种经济结合,自然更会刺激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就能进一步地推进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很明显,如果没有广大的供销合作社为桥梁和纽带,把小生产者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就无法在经济上对于千千万万散漫的小生产者实行有力的领导,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的建设,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去领导千

千万万的小生产者，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无法施行对于国民经济的领导。

必须了解：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起来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用一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并在将来要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采用这种行政手段，将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无产阶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就是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及将来的集体农场等。而目前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则是在经济上指挥农民小生产者的司令部，是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是土地改革后在经济上组织农民与小手工业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没有这种供销合作社，我们就不能在经济上去组织领导和指挥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因为农民小商品生产者是依赖市场的，他们在过去不能不依赖残酷剥削他们的商人，而今天他们就可以也有权利指望依赖无产阶级领导的不剥削他们的供销合作社，去进行他们的小商品生产。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在这方面给予他们满意的帮助和领导，他们自然会跟无产阶级一道前进，否则只有去依赖商人，并跟着资产阶级前进。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一个中心环节，依靠供销合作社作为我们目前的主要手段，去推进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事业，并在经济上实现对他们的领导。

由于国家政权在东北比较集中，交通便利，人民日用必需品如油、盐、布、煤、木材、火柴、部分粮食等，主要地是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所以普遍地建立供销合作社的物质条件，是十分有利的。供销合作社应当是城市和乡村的一切劳动人民群众的普遍的经济组织。它的任务，应该是以尽可能公道的价格供给社员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工具、原料）与生活资料（例如粮食、煤炭、油、盐、布匹等），收买社员所生产的商品（例如农民多余的粮食、棉花，手工业

者的成品),再运销出去或卖给国家,免去了商人的中间剥削,从而在经济上为社员服务,保护社员的利益。它必须直接地向国家经济机关及其他生产机关定货,运输到一切社员所需用的地方,卖给社员,又将收买来的各种原料,直接卖给国家经济机关或卖给消费者,而不要经过商人的手,即在广大范围内,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担负社会分配的任务,代替投机操纵的商人。因此供销合作社,决不应当照商人一样去经营自己的业务,决不应当贱买贵卖,单纯地以营利及分红为目的,而必须尽可能地作到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出卖必需品给社员,又以公道的价格收买小生产者的生产品。这样,才能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及劳动人民巩固地组织到供销合作社中来,否则它就决不能普遍地组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失败。为了使供销合作社能够巩固地组织千百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为了使供销合作社能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供给社员必需品,及以公道的价格收买小生产者的生产品,除开合作社自己的组织与经营的合理化及克勤克俭而外,国家在资金、税收、运输以及定货诸方面,给合作社以经常的适当的优待和帮助,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必须使供销合作社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之下来进行经营,避免合作社与国家经济机关及合作社与合作社互相之间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供销合作社为了在千百万劳动人民中执行自己这一伟大的经济任务,必须制订自己的统一的章程,规定自己的任务、经营业务的方针、社员的权利及必须遵守的纪律和义务,以及组织的范围和系统等。政府亦须制订关于合作社的法律,严格保护合作社的财产,保障合作社章程的实行,规定国家税收及经济运输等机关对于合作社的优待,取缔冒名合作社去进行投机操纵剥削人民的一切行为。这种供销合作社,必须有从上至下的系统的组织,有全东北的总社,及各地方的省社、县社、市社、区社、村社和工厂机关学校中的支社,及某些专业的总社和分社,例如盐业、渔业合作社等。在合作社内部,必须实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召开定期的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委员

会,由各级委员会任命各级合作社的经理及其他重要办事人,并须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下级合作社的成立,必须经上级组织的批准,业务的经营则在统一的计划之下进行。我们党则在这种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建立健全的党组,并应创办合作社运动讲习会,培育大批有能力的干部,给以足够的训练,来作为这种合作社的骨干。必须有一大批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并清楚地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律,精通合作社业务和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干部,去领导这种合作社,才能系统地执行无产阶级对于合作社的正确领导路线,把合作社普遍办好,完成上面所指出的伟大社会任务与国家任务,否则这种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这种供销合作社健全地组织起来以后,国家贸易公司的许多商店,就可由合作社来代替,国家商店与合作社商店就可以实行一种适当的分工,并可根据国家商店与合作社商店的统一计算,了解各地市场的需要和市场的条件,国家和合作社就可以根据市场的确实需要和条件,去计划和指导各种生产事业,就可以使生产适应市场的需要和条件,避免生产上的盲目性和经济危机。但是要办好这种合作社,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必须是有步骤地有重点地去进行。

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之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国营经济没有合作社的帮助,它在经济战线上就会是孤立无援的。国营经济只有与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并领导与帮助合作社经济,才能有可靠的经济上的同盟军,才能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吸引到自己一方面,去和各种私人的投机操纵的行为作斗争,同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破坏活动作斗争,使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取得优势。而合作社经济也只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免除商业资本家的中间剥削,而大家富裕起来;才能使他们在将来从国营经济方面得到各种

机器,而进一步地实现生产的集体化(合作化);才能使他们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种经济形式,在东北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以后还会发展,特别显著的类型如下:(一)出租制:国家把自己现时还无力开发的林场、农场、渔场以至矿场,出租给资本家开发,同资本家订立一定年限的合同,规定双方有利的条件,资本家负责开发、取得利润,国家给资本家以一定的便利条件,并从资本家方面取得一定的租额。(二)加工制:国家配给资本家以原料,订立加工合同,资本家为国家制造成品交给国家,资本家得到一定的利润。(三)定货制:国家向资本家定购一定数量与质量的成品,资本家从此获得一定利润。(四)代卖制:国家给一定的私人商店或公司以成品,由该商店或该公司推销,资本家从中挣得一定的商业利润。在城市和乡村供销合作社大大发展之后,这种代卖制的需要,就会大大减少。现在东北加工制的形式比较发展,其余的形式还在开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吸引私人资本来为国家服务,并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经济所需要的资本,一般的不是一个小资本家的资本所能承担,而必须是许多资本家的合资或合股,这可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

这种经济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承认“国家资本主

义”这个经济范畴，有意识地加以提倡和组织，特别是在开始时，还应给以有利的条件，并保证其原料、粮食等的供给以及运输的便利。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利的方向。

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还做得很少，还只是被迫地、自发地、无目的地做了一些，我们还缺乏自觉地、主动地去做。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在干部的思想克服许多错误。我们有些干部，对于现在发展一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常常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甚至过分迁就私人资本家的态度，而对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则往往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特别对于出租制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宁愿把天然富源荒弃着，不愿给资本家开发，怕国家受损失赔本。他们还不了解：把一切富源开发出来，增加社会的财富，即使用的是私人资本，仍然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有利的，虽然资本家取得了一定的利润。在国家无力经营的地方，在私人资本的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地方，如果采取排斥私资的政策，那就是错误的。

五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由于战争的关系，目前私人资本主义偏于商业投机及部分军需民用的小机器工业及小手工业方面。较大的私人资本，则一般是向着分散，而不是向着集中。由于目前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由于合作经济还不发展，由于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当的发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与积极意义，决不可轻视，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家机构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强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可怕

的。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范围以内，除把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战争与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各种经济政策，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即是：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凡属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之无利可图，因而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商业投机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对国计民生十分有害的商业投机资本，是有极大的膨胀的，几乎全部的银行资本都成为商业投机资本。在城市中的商业资本，常常占到总资本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对于社会上这样强大的商业投机资本，不能不采取坚决的办法，迫其转入工农业生产方面。其办法除由国家宣布法律禁止一切操纵国民生计的经营外，必须发展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在广大的范围内去代替私人商业资本的地位，使商业资本无高额利润可图，才能迫使其向生产方面转移。这就是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鼓励与限制的标准，也就是联合与斗争的标准。

但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罢，既然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政府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所以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的经济活动作斗争，是今后经济战线上的经常任务。只有正确地坚持这种斗争，才能使私人资本向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减少它的破坏性，增加它的建设性。但是这种斗争是一种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而且主要地是在经济上的和平竞争，而不应该不适当地采取行政上的办法去进行这种斗争。

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天已经落后于国营经济，将来还会落后于合作社经济，其比重今天还不算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轻视它的作用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在小商品经济中有着深厚的根源。因为小商品经济，照列宁的

说法,是每日每时生长着资本主义的^①,它在将来还会要发展。因此如果我们放任私人资本主义自流地发展,则私人资本会经过自由贸易去联合小生产者,而发展生产与交换中的商品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活动与投机操纵,来破坏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因此,为了使私人资本不起这种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还要使它成为国营经济在组织小生产者的合作事业中的一个帮手,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适当地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

至于一般的私人资本家在我们的管制与监督之下如何去投资发财,那是用不到我们去给他们一个个操心的。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有更多更丰富的经验。相反地,在合理生产的技术方面,在经济核算方面,我们还应好好地向资本家学习。

六 小 商 品 经 济

这种经济主要地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它在数量上还占优势。斯大林说:“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象在我们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定要发生的情形这样。”接着斯大林解释农民经济“这样不稳固”、“这样不独立”的原因时,又说:“原因在于农民经济散漫,无组织,依赖城市,依赖工业,依赖信用系统,依赖国家政权性质,最

^① 列宁的原话是“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后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原因,即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农村都是跟着城市走,而且一定是跟着城市走的。”^①

显然的,这种小商品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也是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的。这已经在东欧的许多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得到了证明,而且在经过比东欧各国更长的过渡时期以后,也将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得到证明。但正是由于我们这里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所以小商品经济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还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教育与斗争过程。

我们对于小商品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现在要用一切方法去巩固他们的私有权,在他们个体的私有经济的基础上,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象我们在前面所说,根据于小生产者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把他们组织在各种合作社里,不但不应动摇他们的财产私有权,不但不违反他们发家致富的要求,而且正是为了使他们更能迅速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发家致富。这种合作,对于小生产者本身是很有利的。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强调:

第一、小生产者的这种合作,是以他们的个体私有经济为基础,是以落后的手工业技术为基础,它还不是苏联那样的集体农场。要使中国的农业走向社会主义,当然必须实行集体农场制度。但是,这在中国的条件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做不到的。这必须经过许多准备步骤,主要地是由国家供给新式的农业机器,并为农民所乐于采用,方能做得到。

第二、因为小生产者的这种合作,是根据于“等价交换”、“按劳得值”的两利原则,因而在合作的小生产者内部,是必然会由于勤劳程度的不同而存在着贫富不齐的现象。

第三、因为这种合作社是根据于自愿原则,小生产者可以而且

^① 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8—449页)。

应该有完全的自由加入或退出合作社，因而除已经组织起来的小生产者外，独立的无组织的小生产者的存在，也是必然的，而且甚至会是很多的。

由于以上情况，因而在发展小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在农民小生产者内部的某种程度的分化，将是必然的与不可避免的。少数的农民小生产者，在今后将会上升而为富农或小资本家，另一部分农民小生产者，则会下降而为贫农雇农、为半雇佣或全雇佣的劳动者。这是社会生产力向上发展的必然结果，用不到害怕的。只要我们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并且能够经过发展合作社的道路，使大多数农民小生产者都上升为富裕的农民，或富裕的手工业者，而不去重抄旧资本主义时代少数人上升为富农资本家、大多数人陷于穷困与破产的悲惨境地的老路。但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过程，充分发扬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力量，克服各种阻力，才能取得确定的胜利。

在小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将必然会发生发生在农民小生产者中争取影响与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将要用一切方法，把农民小生产者组织在供销社的与生产的合作社内，使之与国营经济结成巩固的联盟，以利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则将在一切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的残余的协助之下，用一切力量去争取农民小生产者，使之向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农民小生产者呢？他们是劳动者，因而只要我们在政策上不犯错误，他们是愿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向合作经济的方向发展的。但农民小生产者同时又是小部分生产品的出卖者，因而带有或多或少的小商人的投机性，这就造成了资本家商人争取他们并与他们合作，来反对国家对于商品的资本主义进行管理与监督的可能性。这种发展的危险性，是我们必须清楚看到并加以防止的。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而且也在于小生产者的商品经济。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归根

到底是在于使资产阶级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从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中孤立起来，并使农民小生产者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要做到这一点，特别要使农民小生产者在经济上也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把他们组织到合作社之后，小生产者们原有的那些弱点，例如无组织性、散漫性、动摇性、投机性、极端自私性、偏狭性等，还会在合作社内部同无产阶级的领导进行或大或小的对抗。如果无产阶级的领导缺乏坚定性，如果在无产阶级的领导集团内部缺乏铁的纪律，而向着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投降，那么合作社也就会要变质，而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显然，资产阶级是会利用一切方法使合作社变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小生产者中争取影响的阶级斗争，在合作社内部还会长期地存在。

所以，无产阶级对小生产者的各种弱点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教育，并加以克服，实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不可分离的部分。这种斗争，不但在合作社内，而且在国营经济内，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内，是同样存在着的。而要克服小生产者的这些弱点，如果采取行政的强迫命令的办法，那是一定会失败的，只有采取毛主席所指出的“耐心说服，典型示范”^①的办法，才能生效。这也就是斗争的困难与曲折之所在。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有极大的容忍性。但是我们相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胜利与国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其他各种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因素，还是会保证中国人民在这一斗争中的最后胜利，使小商品经济最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民手工业者，在前进的道路上，根据其切身经验，会最后地了解到：只有合作社化，只有把合作社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才能使小生产者免于分化，免于少数人上升为资本家，而大多数人沦入贫穷与破产的境地。也只有如此，小生产者的私人利

^① 见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7页）。

益与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才能真正结合起来,并使这种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服从于人民大众的公共利益,而最后走向社会主义。

七 东北经济建设中的阶级路线

以上所述,就是东北经济构成的具体内容。一般的说来,所有上述的五种经济成份,现在都应加以发展,但在发展中,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这条路线应该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这条路线是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所必须力争其实现的。只有实行这条路线,才能顺利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加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以便将来能够顺利地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反之,我们如果把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把一切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的要求表示无原则的让步,向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投降,那我们就不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能加强反而削弱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而在实际上则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那时,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将因为缺乏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不能巩固与持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必然将会因此蜕化而为旧民主主义的政治,而这在实际上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条路线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路线,这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有意识地在我们党内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在每一个具体的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左右摇摆。

我们只有根据这一条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才能制订出明确

的经济建设计划,减少盲目性,减少自发性,少走弯路。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它具有明确的计划性,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地布置我们的人力与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

关于农村工作的三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五月)

关于农村工作,我向你们提出三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否妥当,请给以指示。

正确认识 and 对待土改后 农村经济中的新趋向

一、东北农村土改后在经济上已发生了如下的新的情况。(一)多数贫雇农上升为中农,中农在农村中开始成为多数。(二)一部分分得土地牲畜的贫雇农生活仍很困难,并有失去牲畜土地者。(三)少数新旧中农(其中还有极少数被斗富农)开始上升为富裕中农及极少数的新富农。(四)一部分贫雇农及一部分被斗的地主富农,要求出租土地,甚至出卖土地另找职业。有的要进工厂矿山,当工人当职员,有的要专搞副业或做小买卖、当苦力,有的佣愿留在农村当雇工。(五)过去分了土地的工人,现在凡能回到工厂者,均要出租或出卖其分得的土地,甚至无代价地交出其土地回到工厂去。(六)还有一部分农民或被斗地富要求出租或出卖其在本地所分得的土地,迁移到别地去租进或买进土地,或去开荒。许多关里

* 这是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报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三次发出,标题和文内插题都是本书编者加的。张闻天同志当时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

来的农民，因华北解放，宁愿不要这里的土地，而搬回到关里去分地。以上情况在南满特别显著，因南满农民分地少（每人二亩上下），劳动力过剩，而工矿业恢复又快。

二、这些新的情况，表现出东北农村经济中有以下的几种趋向。（一）多数农民的生活有改善。（二）阶级分化已开始。（三）农业人口向城市工矿业转移，工人回工厂矿山，一些农民向工人转变。（四）土地的所有与使用，有更趋于合理的新的调整。这些趋势是农村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要求向上发展的各种不同的表现。

三、根据这些新的情况与趋势，我们在农村中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一）继续采取具体办法，尤其是发展供销合作社与劳动互助等办法，以进一步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为农村集体化准备有利条件。（二）清醒地正视农村中阶级分化的实际情况，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视无睹，也不要过分夸大阶级分化的危险，而表示恐慌，或采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以限制。^①（三）凡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及有利于工矿业副业的发展，即凡有利于社会分业的发展的租佃关系及买卖、移居，我们不应反对。（四）继续在各方面帮助贫雇农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并保护贫雇农不受新富农的过分剥削。（五）凡不愿从事生产的地主富农分子及一小部分二流子，则仍应加以监督，使之在劳动中得到改造。

为使同志们在农村新情况前面不是茫无头绪、举棋不定，或步履零乱、“左”右摇摆，我认为以上看法与基本方针，目前有提出的必要。

^① 作者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有针对性地再次阐述以上观点，并强调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要很冷静，不能感情用事，不要搞成农业社会主义”。

发展劳动互助要反对 强迫命令和放任自流

关于农村中发展劳动互助问题，我们同志中还有一些糊涂观点，使他们在强迫命令与放任自流这样的两种偏向中摇摆不定，而不能解决问题。这些糊涂观点归纳起来如下。

一、不承认农民中自发的、小型的、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亲朋好友间的插犍换工，也是“组织起来”，而以为必须是依照我们主观所要求的，参加户数较多，比较经常、搭配合理、评工记分清楚的劳动互助组，才算“组织起来”。

二、不承认因种种原因而不参加或不能参加劳动互助组的农民雇物犍或出租土地，是使他们的土地能够种上的一种办法，而以为不参加互助组，地一定种不上，因而要种上地，就一定要把他们编入互助组，即使强近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

三、不承认有足够车马能独自种地的个体农民有不参加互助组的权利，因而以为要组织起来就一定要把他们编入互助组。

四、以为要农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把所有农民都依照我们的愿望组织在生产互助组内。为此，似乎即使多少强迫命令一点也不要紧。

由于同志们中间存在有这种糊涂观点，所以强调组织起来，就必然会发生强迫命令。强迫命令的结果，如众所周知，或者是农民被迫依照我们的愿望组织起来，或者是向我们作假报告，说已经“普遍组织起来了”，而实际上还是照他们的习惯办事。其结果必然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障碍，使党脱离群众。也正由于这种糊涂观点的存在，所以一反对强迫命令的组织起来，同志们也就沉独无事可做，而只有放任自流了。

为了澄清同志中的上述糊涂观点，我认为应该说明以下几点。

一、承认农民中自发的插犍换工，是最能为农民接受的组织起来的初级形态。我们不但不应反对这种初级组织，而且还应该帮助没有参加这种组织的农民同样地互相组织起来。同时，这种初级形态的具体表现也是这样性的，在各时各地都不尽相同，因而也不能千篇一律到处硬搬硬套。

至于一切比交高级的劳动互助组织，只能是从这种初级的形态出发，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与群众的觉悟程度，而加以提高的结果。它是不能主观地任意提高的。这种比较高级的组织，开始也只能为比较少数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只有先做出榜样，使农民亲身体会到高级的组织的确比初级的组织更为有利时，这种高级的组织形式，才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而普遍化。这里任何的急性病都是有害的。

二、承认因种种困难而不参加插犍换工的农民，有雇牛犍，出租其土地，使土地种上的权利。只有对那些有劳动力而不肯生产的二流子或地主分子才应给以适当的强制与监督，使其亲身参加劳动，把地种上。

三、承认有足够牛犍与劳动力的农民，有不参加插犍换工而独自耕种其他土地的权利。他们土地不够种时，可以租入土地；他们牛犍有多余时，也可以出卖套子^①。但我们应该注意，不使在这处买卖关系与租佃关系中复活封建性的剥削。

四、为使农村向着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今天应特别重视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今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农民最关心的是供销问题。因此，今后使农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是先供销合作然后生产合作。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农民在生产上的集体化，必须在城市工业给予他们以农业机器之后。今天的初级的劳动互助组甚至较高级的劳动互助组，

^① 套子，即牲口连同所拉的车或犁（耙）。一副或两副套子，即一匹或两匹牲口所拉的车或犁（耙）。

在没有改变农业技术以前,只能给将来的生产集体化造成若干有利的准备条件而已。这种劳动互助组同集体农庄这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以为不经过农村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不发展城市工业使之能给予农民以机器,就能使农村集体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五、这种在农村工作中违反毛主席“耐心说服、典型示范”^①的方针的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必须加以坚决的转变。这种作风在过去军事时期还有若干地方可以为农民所原谅,在现在生产时期,则已开始为农民所不能忍受了。我们应该觉悟到农民今天已经很不高兴我们在生产上的各种强迫命令与过多的干涉,对各种冗长的充满政治清谈的会议,也已经表示厌倦。这种作风如不加以坚决的转变,我们会脱离农民群众,而为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制造有利条件。不说清楚上述许多问题,空喊反对强迫命令是反对不了的。

六、反对农村领导生产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决不能等同于主张放任自流。以为不强迫组织我们主观上所要求的劳动互助组,我们在发展农村生产力上就无事可作的观点,实在是非常错误的。在今天农村中去帮助农民因时因地组织农民所乐意接受的各种形式的插犊换工组,与帮助农民组织与发展供销合作社,这就是能做而应该做的艰巨而又有价值的工作。此外,如改良生产技术,改进农作法,发展水利事业,繁殖与保护耕畜,发展副业生产,提倡技术作物的种植等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工作,我们不是做的太多,而是做的太少,或是根本还没有做。而且事实上,劳动互助组之从初级向高级的转移,及供销合作社的发展与巩固,是同这些农业技术上的改良与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密切结合着的。把这一切能做而应做的工作置之不顾,这就是真正的放任自流。这种领导上放任自流的实质,是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迫切需要与党的方针,不懂得如何真正去为群众服务。它也是脱离群众的一种表现。但反对领导生

^① 见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7页)。

产上的这种放任自流,是决不能等同于回转到强迫命令去的。反对放任自流而说不清放任自流的实质,不指出农村中许多可做与应做的工作,放任自流也是反对不了的。

农村党员要为合作化方向奋斗

土改后的农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必然是资本主义方向与合作社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之间的顽强的斗争。我们党在农村中一方面不能不容许少数新富农的产生与其在某种程度内的发展,但同时必须为农村的合作化而奋斗,以争取农村社会主义前途的胜利。因此,在农村共产党员前面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由于新富农的产生的不可避免,因而去帮助新富农的发展,或自己“以身作则”转变为新富农呢,还是坚决为农村合作化而奋斗,使自己成为合作运动的先锋与骨干呢?这即是说,今天在农村共产党员面前提出了发财致富的两条道路,即新富农的道路与合作化的道路。我的意见如下。

一、应该教育农村共产党员,坚决为农村合作化的方向奋斗,而且应该使自己成为合作运动的先锋与骨干。

二、应该教育共产党员,只有经过合作社的道路才能使大多数农民发财致富,也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得到真正的改善。

三、应该向农村共产党员指明,新富农的剥削贫雇农的道路,同共产党员是不相容的。凡农民党员有向新富农转化的趋势时,应给以事前的警告,使其转变,如不可能时,应允许其自由退党,或开除其出党,不要留恋。为此,在党内应加强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育。

四、注意在合作社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在真正贫苦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

五、增加党员中城市工人成分的比重。

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一 大跃进的成绩

“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①列举的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肯定。中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记录》的这一部分有必要讲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怀疑的也是有的。

成绩从何而来?来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

* 1959年7月2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这是张闻天在华东组会议上的发言。

① 《记录》草稿,指庐山会议上印发的供讨论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日庐山会议的议定记录(修正草案)》。

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①，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看到了的。

二 缺 点

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虽然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

对《记录》草稿所讲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可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

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路线，违背了总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

三 缺 点 的 后 果

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

^① 三个“并举”，“两条腿走路”，是对于当时经济建设方针的概括说法。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其中包括“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这三个“并举”，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工业方面的集中领导必须同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是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不是一条腿或者一条半腿走路的方针”。

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

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前一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过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估产过高,仿佛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调整估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

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究,现在还难以断定。

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①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吨。如果在此基础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搞到八百多万吨,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样一种办法。当然,我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志说,大洋炉^②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土炉。那也不一定,从

^① 八大二次会议,指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所做的工作报告估计,1958年我国的钢产量将超过710万吨。

^② 大洋炉,指大型的近代炼钢设备。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遍地开花地搞“小土炉”炼钢,而将上述设备称为“大洋炉”。

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额^①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们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投产,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基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标提高,去年招工两千零八十万人,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三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和生

^① 限额,指基本建设投资限额,是我国为便于对基本建设项目分级管理而对其投资额大小所规定的标准。建设项目中,凡投资等于或大于限额者,为限额以上的项目,一般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其设计任务书由中央审批;小于限额者,为限额以下的项目,其设计任务书由地方分级审批。

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六保户”^①。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这样。

——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有个材料说,不少生产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象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到外地调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损失是很大的。

——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

^① “六保户”,指当时有原材料供应和制造能力的安排上优先保证其需要的六大产品,即轧钢机、电站设备、矿山设备、洗煤炼焦设备、排灌机械、机车货车。当时还强调,这六大产品的生产必须是主机、副机和配件全面地进行安排,确保成套地供应。

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损失。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①，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②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供应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还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个同生产的调整联系着的问题。城乡人民手里

① “一平二调”，1958年轻率发动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做法，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地抽调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财产和劳动力。

② 郑州会议，指1959年2月17日至3月5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拿着货币,当然可以储蓄一些,但是总要买东西,而国家手里却没有东西,因为生产失调,劳动力闲着没有创造价值。所以说,市场问题,不是简单的几样副食品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比例调整问题,是经济法则问题。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因为缺水要停产。在这个简单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调问题。

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九五八年的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时间。

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还有,外贸也很紧张。进口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说,人家完成了计划,我们完不成。进口多,出口少,逆差七亿元。出口商品质量差,在国外名誉不好。总理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还是解决不了。

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在国外,失掉了信用。“你们吹牛皮,没有生产这么多,硬说这么多。”弄得我们很被动,产量指标公布不公布都

被动。

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①之类。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主要是去年三个月中的事。现在有了好转，基本上有了好转，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这是要长期做工作的事。虚报现在还有，少报产量也是虚报。强迫命令也还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

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了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之，这些缺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当然，由于领导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四 对缺点的估计

我同意《记录》草稿所说，这些缺点是局部的（但却是重要的），暂时的，有许多是难免的。《记录》草稿还讲到，这些缺点纠正得快，这点讲得很好。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中央、毛主席领导很坚强，抓得紧，因此我们有信心纠正这些缺点。但是，纠正缺点，例如把比例调整好，也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有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发现。例如财政平衡问题到这次才提出来，过去就没有得到重视。有

^① “观潮派”，是在1958年轻率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种贬称，被错误地加在对运动表示不同意见或提出正确批评的人头上，指斥他们对“大跃进”运动潮流袖手旁观。

了正确的决议案,能否一下子贯彻执行得很好,也不一定。而且,旧的缺点纠正了,新的还会产生。

五 产生缺点的原因

同意《记录》草稿所说,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是,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脑子冷静地想一想,就可以取得经验,发现当时有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现在已经证明当时确实就有人坚持实事求是、挡住了“共产风”。他们当时被当作白旗拔了^①,现在证明是红旗。所以,《记录》草稿讲到产生缺点的思想上的原因,说缺点部分地是由于主观主义、片面性所引起,这话是对的。从研究、总结经验的角度看,尤其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研究哪些缺点难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这样,今后就可以避免重犯这些错误。否则,都讲客观原因,就总结不出经验,接受不了教训。

六 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虽大,但是强调得过了分,还反对讲条件,这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还要考虑实际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是就可以接受经验教训而言

^①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曾把反对高指标、浮夸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以及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评、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曾肯定这种错误的作法为“拔白旗”,也叫“拔白旗,插红旗”。

的。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可能不办坏事。

比如订产量指标就不能凭愿望，想当然。可是，在这类问题上，正好看出我们的主观主义。冶金部过去订钢产指标，两千万吨、三千万吨，都说可以做到，结果总是做不到。现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能否完成，我看也还有问题。不论两千万吨，三千万吨，所提根据都是同样的几条，究竟这些根据是否经过调查研究得来的呢？订指标，总得有现实的可靠的根据。我们是外行，但是搞业务的人，应该是有这样的根据的。在各个相互联系的部门中，如果有一个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说高指标不可能实现，就可以对整个计划产生好影响。当然，这个部门也可能会因此被插上白旗。

如果说，虽然指标高了些，计划没有完成，但是总还是搞到了一些东西，我说，这样搞到的局部的成绩，不能拿来为主观主义及其造成的损失辩护，损失总是大的。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上面这种说法就同主席讲的精神不相符合。

七 政治和经济

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否定，只能利用它来为我们服务。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的规律不一样。但是，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同样是要吃亏的。我们是否真正认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意义？是否注意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是空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不能单纯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

经济规律的要求。一定要考虑这项任务同各方面的平衡,否则,把重点过分突出,就会造成失调。工业布局,就不能光从战略上考虑。比如建设武钢,就要考虑到它与各方面的平衡,不能说武汉是战略要地,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建设武钢,而其他条件是否适应就不加考虑。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法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使之大体上是个平衡的计划。在经济上运用相对平衡,要考虑到计划可能会突破,遇有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保守,消极平衡,是必须反对的。但是,积极平衡也是平衡。

生产不能只满足于得到产品,还要考虑成本,要计算。有些“高产田”确是高产,但所用的化肥、种子多,成本太高,要赔钱。农民搞这种生产就要破产。有些企业,如重工业的某些企业,开始时总要赔本。但是,到底赔多少,要有个数,要争取逐步少赔,争取早日做到能有盈利。因此,我建议,在《记录》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

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帐,并不是“算帐派”^①。主席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说,要精打细算,要算帐。不算帐,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帐”。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算经济帐,不仅要算今天的帐,而且要算明天的帐。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帐是一致的。如果现在无利,将来也无利,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办。有些准备兴建的企业,如果从经济上考虑不合算,就应该考虑修改决定。当然,特殊的可以例外。

总之,我们国家“一穷二白”^②,社会主义制度给了我们很快改

① “算帐派”,又称“秋后算帐派”,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贬称,被错误地加在不相信虚报浮夸,表示要计算秋季实际收成之后才能信服的人头上。

② 见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2页)。

变面貌的条件,但是目前还是“一穷二白”。我们的资金有限,应该严格控制使用。应该实行节约原则,把钱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摊子不能铺得过大。要反对大少爷作风,反对满不在乎,大而化之,以为从政治上算个大帐就行。我们每增一个工人,都要经过核算。现在有些工厂不执行中央关于招工的规定,一招工就是千把人。听说太原钢铁厂现在有万把人放着,要做很多工作动员他们回去。这样的事是很不好的,划不来的。

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的体会,就是因为 we 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对它估计不足。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的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否认普遍规律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一般干部也要学。我提议编些通俗本。例如,农业上花多少人工,多少化肥,要计算成本,不然就要赔本。

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这方面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使人家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鞍钢把工业生产质量定额制度一把火烧掉了,好象打土豪时烧地契一样。现在到处找也找不到,弄得一个时期生产秩序很乱。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节约原材料,也要有根据。基建中不适当的节约,搞得建筑物摇摇晃晃,危险之至。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要搞新办法,一定要反复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实验室里成功了,还不等于在工业生产中也已成功。工业中少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也不一样。使一项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下来并不容易,这也是经过一个时期的反复试验才能做到。例如,活性染料,

我们说已经超过英国，英国人说我们吹牛。上海的“英雄”100型钢笔超“派克”，据说美国人开始很怕，后来试验了，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关键没有摸到。”原来并不超“派克”。上海造的表，也吹了一阵，其实走得也并不怎么行。“八字宪法”^①的原则完全正确，但是密到何种程度，肥要施多少，等等，也还要反复试验。超过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

八 三种所有制的关系

在刮“共产风”时，这方面的偏向很大，现在已经基本纠正。

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巩固、稳定下来。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

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对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实行“吃饭不要钱”是对的，但对多数人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按现在的规定，工资部分在社员的劳动报酬中应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个比例实际上达不到，即使达到了，也还嫌少；以百分之三十作为社会保险，比例还是嫌大。我主张彻底一点。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① “八字宪法”，即农业“八字宪法”，指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合理施肥）、水（发展水利和合理用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止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项措施。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这八项措施被作为农业增产的根本大计提出并称为“八字宪法”。

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现在在农村里,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一些,如自留地、小农具。至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生产愈多,消费也应该愈多。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使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对于这一点,中央是清楚的。但是一部分干部中认识上有问题。他们仍想来一个拉平,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贡献大、生活富裕的农民,批判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人,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等等。对这些干部,要多做解释工作,给以耐心的教育,使他们的错误思想得到纠正。

九 民主和集中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社会历来分散,革命胜利后需要强调集中。搞计划经济,不多注意集中更不行。过去的集中有缺点,分散一下是对的,但体制下放过多了,分散主义搞得很厉害。这有其社会、历史、地理的根源,往往是分散容易集中难。现在中央、毛主席强调权力收回,很好,我很赞成。企业随便招工,银行随使用钱,这怎么行?当然,集中要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什么叫地方积极性?它主要应该表现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上。地方根据本身特点需要投资建设一些项目,也要列入国家计划。至于地方搞点油水,则是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在所得的利润中适当地分点成。

工业化要求分工更细。分工协作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一个进

步。现在对这点应该加以强调。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经济体系，甚至一个工厂也要搞成既炼钢、又搞机械的托拉斯。这样做，据说是为了方便，简单，自己要什么就有什么，结果却是搞得质量降低，资金积压。社会愈进步，组织愈复杂，就愈加要求分工协作；想简单，原始社会就更简单。

工厂企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采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形式，是正确的。但是，一经党委讨论决定，厂长负责这一条就很重要，不能弄得厂长不敢负责。现代化企业的特点是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科学的、果断的指挥，不能慢腾腾，不能凡事都要讨论讨论。好象打仗要有指挥官一样，生产中也必须有集中的指挥，只能一人指挥，不能多人插手。

群众路线问题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创造。问题在于经济建设中实行群众路线应该有其特点。它与群众斗争中的情况不一样。搞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要有利于生产，而不能妨碍生产。我看到有些工厂里花样太多，似乎要想把所有好事一下子都做完了。又是党的会议，又是团的会议，又是工会活动，还有写诗、学习，等等。结果搞得工人疲倦不堪。开会太多，工人休息不了，第二天就出事故。马雅可夫斯基^①讽刺“开会迷”，讽刺得很厉害。我们工人在这方面花的精力也相当多。所以，会议必须精简。还有大字报，是否要经常贴？我看，总结工作时可以贴，但是不能规定指标，追求数量，每人一定要写多少张，弄得工人通宵不眠。总之，花样要精简，政治工作要保证工人精力充沛，有利于生产。否则，搞得工人精疲力竭，不利于生产，算什么政治工作？还有，熬夜妨碍工作很大，不可多搞，只能在十分必要时，偶尔来一次。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

^①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他于1922年写了著名讽刺诗《开会迷》。

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记录》草稿的第三部分第二小段有一段话说：“……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我很欣赏这一段话。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十 缺点讲透很必要

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不对。现在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事后诸葛亮嘛。这一段有痛切的经验,应该严肃研究,认真总结,这样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如果采取轻率态度,泛泛地讲几句,就不解决问题。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所以,对缺点要采取郑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

有人说:“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对于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就更不会了。至于有些人不怀好意,企图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把我们说成漆黑一团,那就要同他们辩论、斗争,也不是泄气不泄气的问题。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他就高兴,积极性就提高。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①。做了蠢事不要怕讲,不要怕泄气。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但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就是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会上升。是鼓是泄,要有一个标准。这次会议的文件,就是针对缺点写的,就是泄虚气的。

至于说,讲了缺点,就被认为是对成绩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

^① 指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中所说:“我们应该重复马克思的话:在革命时期不但不会少作蠢事,有时还会多。我们必须冷静地和大胆地来看这些蠢事,我们革命者必须学会这一点。”(《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5页)列宁所指的,是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的一段文字:“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会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以致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6页)

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讲缺点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帐。

十一 光明前途问题

前途光明，这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只有两个人，就开创了无产阶级的天下。我们加入共产党，就看到了光明前途。我们现在有成绩、有希望、有办法，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可以继续跃进，因此，早已是光明前途。对我们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来，这一点更不成问题，讲不讲都可以。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着，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中，“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地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还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就可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正确与否，需要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样，还要做起来看，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农业生产能否每年保持增

加百分之十,也要研究,要多想办法,不能骄傲。我们的发展一定比苏联快,也应该快,因为我们有它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是“拿来主义”,把人家最新最先进的东西拿来。加上我们人口比它多,天然条件比它好,中央领导坚强,能把普遍原理同具体条件相结合。但是,我们究竟能够快多少,还要研究,还要努力。现在不要吹,做到以后再吹不迟。我的意见是即使做到了也不要吹,让人家吹比我们自己吹更好些。我们有了成就,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来研究我们的经验。

十二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①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

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关于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讲话的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

^①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1959年7月14日写信给毛泽东,这封信印发时被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

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①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不紧,就不那么容易。

十三 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但是,人家那样说,我们也不要生气。这些说法可以研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即使说是三七开,也是肯定它基本上是好的。我们肯定斯大林,但是也说斯大林三七开。当然,斯大林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性质与斯大林不同。总之,成绩和缺点是客观存在,说多说少,都不会对它有所增减。今天我

^① 北戴河会议,指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缺点讲得多些,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跃进;我并非怀疑派。有些地方措词不当是可能的,外行人容易说外行话嘛!



第 二 辑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四年)



要正确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所谓“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①,应该把有计划与按比例分开。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有计划的领导则是属于上层建筑,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东西,属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国民经济计划是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要求,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纲领。这种有计划领导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所有制决定的。所有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不只是按比例发展的规律,都要经过有计划的领导,通过人的正确认识和运用,才能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规律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力量,而是被认识了了的必然,从而又为人所自由利用。

正确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就会得到积极的结果。否则,就相反。

领导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是复杂的、困难的,但必须是负责的,原因就在此。因此,需要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同时,还需要有后

* 张闻天 1959 年由于遭受打击被撤销外交部副部长职务,1960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一批理论研究笔记。本文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是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下的笔记。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① 斯大林在他 1952 年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道:“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引自该书中文版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后来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延用了斯大林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上述提法。

备力量,以准备万一。

一切经济规律如何发展,如何实现,都决定于许多具体条件(经济的和政治的),如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物质资源,人们觉悟水平等。同一经济规律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也不相同。所以利用经济规律,必须研究各种条件,使经济规律获得最有利的结果。

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日)

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但要看到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苦性。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自身的,即在社会主义自己所创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才能达到。从不成熟发展为成熟,从初级发展为高级。

必须指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这里需要认清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革命——改变生产关系——大大发展生产力——再改变生产关系。现在是要利用有利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不用改变,应是更加完善;现在生产关系中的分配也不用改变,也应更加完善。需要经常调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地方、个别与全体,国家、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这一切也是为了有利于发展生产。

物质生产,决定一切,这是唯物史观。因此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人的最后解放,决定于对自然力的控制力量。使生产关系更加完善,是为了适合于生产力水平。而没有物质技术基础,不可能到达共产主义。

总之,增加社会总产品,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民财富,增加公共积累,把主要力量以及劳动力直接用在物质生产方面,减少非生产人员,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本文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是张闻天所写《论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一文的节录。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关于按劳分配提纲*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日、十一日)

(1)不劳动者不得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2)这是社会主义原则,即是初期共产主义的原则。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也为将来的共产主义服务。不实行这一原则,就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按劳分配所带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必要的,必然的,正是适合于实际情况的。要消灭这种法权残余,就要经过按劳分配阶段。

(3)关于按劳分配的错误宣传:

一种,似乎叫人们只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

另一种,似乎叫人们不要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而只关心集体利益,(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其实列宁就反对过早向农村灌输共产主义!)^①说强调按劳分配就是经济主义。

* 本文是张闻天针对1958年以后流行的一股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将其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需要加以破除的“左”倾思潮而写的一篇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原题为《关于按劳分配》,现题是张闻天在后来的笔记中提到此文时使用的。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辑录了这篇笔记,本书根据《选集》版本排印。

^① 列宁这一论述见《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他在说了“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权把城市工人真正培养成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之后,立即强调,“决不能把这一句话了解为似乎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对于共产主义,这样作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危险的。”紧接着又说:“不能这样作。应当从建立城乡的联系开始,决不能过早地抱定向农村灌输共产主义的目的。这个目的现在是达不到的,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提出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0页。)

这两种偏向都不对。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建立正确的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先公后私,公私两利。今天的共产主义教育,就是要使人们懂得,集体好了,个人也好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①)

多劳多得,同时也是对国家多贡献。多劳,多贡献,多得。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就是为公;按劳分配,则是为私。

计较物质利益,并不只是计较个人利益,也是计较国家、集体的利益。我们不是利他主义者,也不是利己主义者,是两者的统一。

今天的评工计分^②、三包一奖^③、劳动定额、计时和定额奖励等等,经济核算等等,都是要斤斤计较物质利益。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集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为了共产主义。

(4)关于“政治第一,物质第二”。

关于工资政策,劳动报酬政策,应该研究的首先是物质报酬问题。这个政策规定得正确,执行得正确,就是政治。正确地宣传按劳取酬,就是政治宣传。

把政治同物质报酬脱离,甚至对立,是不妥当的。

政治教育,必须有适合于当前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不能脱离实际,成为空谈、说大话。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5)必须从社会再生产的原理,来阐明按劳取酬。其实,按劳取

① 见列宁《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② 评工计分,当时集体所有制农业企业评定其成员的劳动量和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方法。即按照各个成员向集体提供的劳动量,评定其应得的工分,年终结算时按该集体经济单位的每一工分值和各个成员的工分总额,分给劳动报酬。

③ 三包一奖,当时有些农村人民公社内的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责任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一般是由生产大队确定所属各生产队的产量作为包产指标,计算完成包产任务所需的劳动工分数和生产费、管理费,作为包工指标和包成本指标,将三包指标落实到生产队。年终结算时,对超产的生产队给以奖励。

酬并非完全按劳取酬(不折不扣的),而是有折扣的按劳取酬。

国民收入应分为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

消费基金应分为个人消费基金与集体消费基金。

人民要改善生活,就要提高生产,努力劳动,给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集体的利益,同个人的利益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不去谈多劳多得,怕谈多劳多得,实际上对社会不是有利,而是有害。

(6)既然劳动是光荣的,多劳多得是正当的,那么劳动好的人生活得好些,生活富裕些,就是应该的,正当的。这样生活好的人,对社会主义更加积极拥护。说愈穷苦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愈坚决,愈富裕的人愈不坚决,这样的观点,应该有适当的修正。

把公社农民的生活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应该是理想,不应该反对。富裕了就不好,那末谁还愿多劳多得呢?愈穷愈好,甚至装穷,这种思想与现象,并不能认为是正常的。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但这种矛盾不在于多劳多得,而在于有些人想少劳多得,或者多得的人不愿再多劳,而想采取不正当的方法(如投机等等)来更大地多得。这些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或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是必须经常进行教育与斗争而加以克服的。

(7)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是客观的必要?

第一,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人们劳动的平等权利,使用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从而取得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

第二,因为生产力水平不够高,产品数量还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因而分配只能根据已经生产的東西来分配,只能根据劳动来分配。

第三,因为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只有利用这一原则来鼓励劳动(按数量与质量),发展生产。鼓励劳动者多方面提高其技术文化水平和劳动的熟练程度,更多地发明创造,利用新经验新技术等等,同时遵守劳动纪律,改进劳动组织等等。

(8)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决定于劳动者及其子女的生活所必要的消费品的价值。但这个价值,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支付工资的最高界限,而是最低界限。消费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只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

(9)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的现象。

(10)增加集体消费基金是必要的。是以个人消费为主,还是以集体消费为主?应该以个人消费为主,但逐渐增加集体消费基金,量力多办集体福利事业。

(11)工资政策,要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生活。

(12)工资的提高,应该跟在劳动生产率的后面提高。扩大再生产是保证工资提高的先决条件。

(13)劳动力不是商品,不能买卖。这同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差别。但国家也雇用劳动者。列宁曾经指出,在国营企业中,全体工作者都受雇于国家。当然这种雇佣不同于资本家的雇佣。这里存在着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当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为何要订立劳动合同,为何工会特别要在这方面起作用,其原因就在这里。国家往往可能为了国家的利益,不重视工人的利益,违反工资政策。

劳动力虽然本质上不是商品,但在商品生产的形式还存在的条件下,劳动力也还有其价值。如果劳动力没有价值,工资如何决定就成问题。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第八项内所指的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消费品的价值。

许多教科书不讲这些问题,怕说劳动力有价值。

社会主义下的劳动基本上虽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但也不完全。由于劳动的差别性(熟练与不熟练、脑力与体力、复杂与简单等等),要计算劳动消耗,还必须把它转化为单一的抽象劳动,转化为价值,转化为价格。(还不能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劳动,如像在共产主义社会那样。)在社会主义下,劳动力虽然基本上不是商品,但仍然需要有价值形态,有工资形态。这种形态有时使人们看不清劳动和劳动力的本质,而产生雇佣观点(当人们只看到外表,而看不到

本质时)。雇佣观点的产生今天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人们强调社会主义下的劳动是自觉、自愿、平等、自由的劳动，这基本上是对的，但也还有不自觉、不自愿、不自由、不平等的一面。按劳分配是自觉劳动的分配原则，但也带有强制性（不劳动者不得食）和不平等性（多劳多得）。因此，在劳动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两重性。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有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

在人们的思想行动中，不想劳动，怕劳动，挑拣“好”的、轻松的劳动，这些雇佣观点和雇佣态度的表现还是不少的，甚至还是相当多的。按劳取酬就是同这种思想行为斗争的有力武器。虽然它还带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但却正好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有力武器。对付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就要有带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武器！

(14)关于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采用何种制度，应该根据何者有利于促进生产、何者适合于生产的具体条件为标准。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

(15)关于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

是物质鼓励加精神鼓励。

怕说物质鼓励是不对的。

仿佛谈物质利益就卑鄙，谈精神就高尚？

精神不能离开物质，无物质就无精神。

只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愿劳动，那是卑鄙的。劳动之后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这有什么卑鄙！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为它奋斗？一定的物质条件，使工人更有可能提高其文化与技术。物质鼓励同精神鼓励是分不开的。它们达到同一个目的，即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努力创造发明的目的。

精神鼓励是必要的。说明为什么一个人要受到物质鼓励，也就是一种精神鼓励。

为什么穷苦的人最革命？因为他们生活得最苦，迫切要求改善

生活。改善生活的愿望无疑是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伟大动力。经济生活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精神。精神一经发动，也就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是利益，都属于物质鼓励的范围。

关于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的原则，有不同的理解。

怎样使收入差距缩短？

(1)按劳分配既反对平均主义，也要求消除工资上过分的、不符合实际劳动支出的差别；(2)缩小劳动者之间熟练程度上的差别；(3)收入上的差别会随着向共产主义前进而缩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免费满足需要的公共事业的发展有关。

马克思讲，把工资从资本主义限制下解放出来，就能够“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已有的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人的完全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资本论》卷三，1148页）^①。

工资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从物质上鼓励工人的生产，另一方面也从精神上鼓励其发展智慧、才能和技巧（“发展个性”）。

生产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生产的技术改造，也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又推动生产的发展。人的个性的发展，文化技术知识的提高，劳动能力的提高，经验的生长，也使人的要求不断提高和多样化（人的个性多方面的自由发展）。

按劳分配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自觉的自愿的劳动纪律，提高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

按劳分配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学校。

^① 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引者略去了第一句“社会已有的生产力”后括号内的一句话：“（那就是他自己的劳动当作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这段引文另见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90页。

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和经济 关系问题提纲*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

(一)经济是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反对政治决定经济论。

(二)政治为经济服务。反对政治脱离经济。

(三)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或者叫全面表现,概括表现,全局表现,统一表现)。它全面反映经济规律,使经济规律成为指导经济运动的武器。因而政治积极影响经济基础,并对经济起主导作用。这里主要表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马列主义的领导。

但如果政治不能集中表现经济,以全局来表现经济,那么政治就不能指导经济,为经济服务,或反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政治起主导作用,是指政治能很好地运用经济规律替经济服务,而不是指政治可以违反经济规律,脱离经济。政治最后为经济基础所决定。

(四)政治和经济,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矛盾的统一,而经济是决定的。

(五)关于政治领导(政治挂帅)与经济业务的相互联系,也应

* 张闻天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所论述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 1961 年党中央为克服当时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而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之后,张闻天又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本文就是他当时写下的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首次发表于《党的文献》1990 年第 4 期。标题是本书编者参照张闻天 1973 年 9 月 20 日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题目所拟的。

如此看法。政治领导,只有正确的领导经济业务,解决经济问题,才能说是正确的,才真是挂了帅。否则,就不能那样说。反对空头政治,也要反对事务主义。

(六)关于红与专,也应作如此解释。

(七)何谓经济主义?就是不能从全局观点来处理工人中经济斗争问题。

政治思想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即政治观点),也往往同不能正确处理经济问题有密切联系。

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五日——十七日)

—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思想意识上还将长期存在。但今天在思想意识上的主要矛盾,是否在于思想落后或超越于实际。当然这种矛盾也带有阶级烙印,但主要问题在于不能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还多少存在,但不占主要地位。在这方面的基本矛盾,能否说是在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的需要。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其本质应是一个东西: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的统一。基本上是统一的(生产为了满足需要),但有矛盾(生产不能满足需要)。这种矛盾统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表现形式。

* 1956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个基本正确的判断,随后不久即在1957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改变,重新肯定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观点。本文是张闻天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经过认真思考提出自己不同观点的几则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第一则写于1961年8月15日,第二则写于8月17日,第三、四则写于8月16日。标题是编者加的。

二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谁战胜谁,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等到集体农庄运动胜利,公布斯大林宪法^①,宣告社会主义建成、私人资本主义消灭,谁战胜谁的问题、两条道路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以后的问题,已经不是谁战胜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问题,而是不断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需要的问题了。

我国的情况是,在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时间内,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但在一九五八年后,就不能这样说了^②。同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斗争是长期的,但不能说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

三

把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基本矛盾,归结为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把三个差别、所有制的差别、劳动报酬的差别,都说成是旧社会的残余、资本主义残余,是不正确的。这种差别同旧社会的差别,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这不是资本主义残余,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要改变这种差别,不能同这些差别去“斗争”,而是利用这种差别,去发展生产,最后消灭这些差别。

^① 斯大林宪法,指苏联第八次非常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6 年 12 月 5 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②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何时发生变化,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肯定了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的论断,即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四

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

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二十九日)

一 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现在普遍的论点是,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湖北教科书^①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例子。它那里只讲生产关系,不讲生产力,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脱节。其实,这两者的不可分是如此的明显,有意把它们分割,必然陷于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也就无法正确说明和了解生产关系本身。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自己提供的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的鲜明的例子。它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如何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最后生产关系又如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离开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以至灭亡,是全然不可了解的。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唯生产关系论”),正像离开了生产关系而谈生产力,必然

* 本文是张闻天阅读196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一书时写下的一组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笔记针对该书中突出的、也是当时国内经济学界普遍盛行的若干“左”的观点,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标题和第一、五、六、七、八个插题是本书编者加的,顺序也作了调整。其中第一节写于8月29日、21日,第二、三、四、六、七、八节写于8月23日,第五节写于8月17日。

① 湖北教科书,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湖北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义”编写小组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陷于机械唯物论(“唯生产力论”)一样。湖北教科书就犯了第一种偏向。

马、恩、列确实也曾多次说到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他们为了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他们指出,在物的关系的背后,要看到人的关系,阶级的关系,而过去一切经济学却忽视或有意隐蔽这一点。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他们的看法不但在《资本论》中可以看到,在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也可以看出。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法则”(见该书第 65 页),也有片面性。但是,他虽然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却没有主张离开生产力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他说,“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上书第 56 页)“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同上书第 57 页)

人们普遍认为,研究生产力就会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研究生产技术的科学。其实,“生产力”本身并非技术科学的范畴,而正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生产力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是“人们为了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对自然界进行斗争的能力”。这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经济现象,正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当然,生产力的一些要素,如机器、生产工具等,可以从技术方面去研究,但为何不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来研究呢?

也有人认为,研究了生产力,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就不明确了。其实,对事物愈是正确了解,阶级性就愈鲜明。片面性并不能代表阶级性。满口“生产关系”,其实际可能是完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把物的生产和人在这种生产中的关系结合起来。

见物不见人,是“唯生产力”论,见人不见物,是“唯生产关系”论,都是不对的。不谈物的生产,不谈生产关系在物的关系中的表现,还有什么政治经济学?!

“生产”这个词本身,就包含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首先是对自然的关系,是生产力,其次是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商品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有物的关系,也有人的关系。再生产有物质的补偿,有两个部类的比例,有生产力;也有价值的补偿,也有生产关系。劳动有具体劳动,生产力;有抽象劳动,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中,有些规律突出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规律,有的规律生产力表现的比较突出(如按比例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等),也有的规律生产关系表现的比较突出,但没有一个规律不是表现二者的一定联系的,因为没有一方面,就没有另一方面。

湖北教科书的缺点之一,就是只谈改变生产关系,而且强调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却很少联系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改变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而不知归根到底改变生产关系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改变最后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湖北教科书甚至将主张发展生产力的意见,名之曰“生产力论”。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但它必须结合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进行研究。

应该把“生产关系”分为二类。一类是所有关系,分配关系,阶级关系,另一类是劳动关系和上下左右的关系(如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地方,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这二类生产关系原则上有什么区别,但互相影响。它们都是生产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或思想关系。后者属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起反作用,但不同于生产关系。教科书把这一切都混同了。对第一类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相当长时期内)不能不断改变(或叫“调整”),第二类关系比较可以更多地改变,但也不能过多。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生产关系是不能任意变更的。过早改变生

产关系(如“共产风”)会破坏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

二 关于人与物的关系

教科书批评唯技术论,因而过低估计技术、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重要性,而且把自己偏向了唯意志论。

教科书批评了“见物不见人”,但它自己却有点“见人不见物”。在生产中人是决定的因素,因为没有人就没有生产。但人的行动,受当时的物质条件限制;人不能为所欲为,物又决定着人。人要改变现状,首先要改善物质条件。人要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改变生产技术,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没有最新的技术,单靠体力劳动,社会主义是建立不起来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在工厂管理中不能单靠专家,要反对专家路线,这是对的。但是没有专家,工厂生产也是搞不好的。教科书在这方面是估计不足的。

三 关于平衡与不平衡

毛主席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平衡与不平衡是矛盾的统一,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些道理都是对的。但湖北教科书从此得出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强调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则未必对。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规律,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要求平衡,要求按比例。国民经济的运动有两种可能:不平衡的趋势和平衡的趋势。人们的有计划的领导,就是要避免不平衡,争取平衡。如果不平衡出现,及时加以调整,使之平衡。平衡本身是发展着的,但由于

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可以经常是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的发展。在这里,由于情况不明,计划工作的缺点,可能发展成或大或小的比例失调,但那是可以改正的。说因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有不平衡趋势,所以得出平衡只能是暂时的,不平衡才是经常的,这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作用,把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混同了。

再者,平衡本身也有相对稳定性,持续性。国民经济计划,可以是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有时间。同时,计划的制定,生产的安排,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计划不能时时改变(指较大的改变)。社会主义初期,计划时间短些,越到后来计划时间愈长。

再者,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也不是只看今年一年的现状,而要瞻前顾后,估计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变化。

四 关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有人把眼前利益说成只是物质利益,而长远利益说成是精神利益,这是不对的。其实在眼前利益中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利益;在长远利益中也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过一个是今天要兑现的,另一个是在思想意识中存在(观念上存在),今天还未兑现,但将来也要兑现的。这两者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如何正确解决两者的关系,需要好好研究。不能一谈到眼前利益,就说是物质刺激,是经济主义,好像只有谈长远利益,才算合乎理想,才算高尚。不知道眼前利益中也有精神刺激,而长远利益中也有物质刺激!

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吃不饱饭的人,他们对眼前利益特别重视,甚至“斤斤计较”。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不计较,他们就要饿死、冻死。党的力量,就在于能够立即采取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能够立即取得群众的拥护。如果空谈长远利益,而不解决眼前利

益,群众就会不相信我们。未来的利益所以能动员群众,因为这使他们相信,经过斗争和生产是会改善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的。不能否认,物质利益对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当然,这要加以思想政治上的解释,才能使群众了解。物质利益和思想教育是分不开的。

只给物质利益而不进行思想教育,就不能了解物质利益同政治的关系,同阶级斗争的关系,就不能提高人民的觉悟水平;只进行思想教育,而不给物质利益,思想教育就没有具体内容,就成为“买空卖空”了。

按劳取酬是根据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给以物质报酬,但它又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符合于社会主义利益,也有利于将来的共产主义。要解释这个政策的政治意义。把这一政策单纯当作物质刺激是错误的,同时因为要加强思想教育,就反对按劳分配,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法权,也是不对的。

五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教科书过分强调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利益原则,认为按劳分配的原则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和列宁都谈到过资产阶级法权(见《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

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引号的资产阶级法权,不但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神圣的权利,而且承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他们对工农的压迫也是他们神圣的权利,并且用一切法权关系保证这种权利。在社会主义下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即带引号的资产阶级法权,不但对生产资料私有的权利,而且也不存在对工农剥削、压迫的权利,而只是承认在实行按劳分配之后,还存在着生活上的差别,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这是平等劳动者间的不平等。把这种不平等称为“资产阶级法权”,正像列宁称我

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国家”一样的。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但外形上还有近似之处。

马克思、列宁为什么特别讲到“资产阶级法权”呢?这是因为他们当时要同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者、一切平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因而使用了这一术语。

六 关于党的领导和一长制

湖北教科书因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而主张党要“包办代替”,主张党政不分,显然是不妥当的。

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

党包办代替一切,把国家、工会、青年团的单独的作用给否定了。

马列主义原则是党领导一切,但必须经过各该组织的党员在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说服群众接受党的指示,并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在群众中可能对党的指示有不同意见,有补充修改的意见。这种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党都必须加以郑重考虑。如果各该组织中多数人坚持他们的意见,党也不能强迫群众服从党的决定。

要知道党员在群众中只是“沧海一粟”。一千五百万党员在六亿五千万人中,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他们是先进分子,但并无命令一切的特权。

至于全盘否定一长制,把一长制说得一无是处,也是不妥当的。把一长制说成不要党的领导等等,是不合实际的。没有党的领导,哪里来的一长制?!

过分强调党委领导会产生两种结果,或者书记制代替厂长制,或者有党委集体领导而无厂长负责。最近强调党委领导下的厂长

负责制^①，是对的。但党委的决定权也不能是无限的。工厂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调拨计划等，凡上级党、政决定的，党委一定要保证其执行，不能任意改变。不然，就只有民主，而无集中了。

七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和统一

湖北教科书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因而否定精神上、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重要性，这也是不对的。首先，矛盾并不否定统一，而是以统一为条件。有统一，才有矛盾。其次，正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统治物，不能是物统治人，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一发现矛盾，就能及时加以克服，所以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部分人民中间是基本的。团结、统一内部，旧矛盾克服了，又会发生新的矛盾，但新矛盾又会克服。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各部分人民中间矛盾是基本的，斗争是基本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了。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毛主席的公式是：团结——批评、斗争——团结，团结是出发点与归宿点。这同教科书中的解释不相同。

八 关于所谓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利于党内民主，人民内部的民主。

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否能长期共存？有的人可能认

^①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党中央当时的政策，即在国营企业中，企业的生产指标、经营管理均由国家委托的厂长全权负责。

为要长些,有些人则认为要短些,在这里尽可展开争论,各抒己见,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不能说,说长些的,就是右倾,而说短些的,就正确的了不得。

再比如高速度与按比例。有的可能主张速度快些,有的可能主张慢些。这里,也尽可以争论。不能说,主张慢些的,就是少慢差费,快些的,就是多快好省。

又比如按比例中的二大部类的比例的多少,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的多少,都需要研究许多条件,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不能说要求积累多些的人就对,少些的人就不对,而且就是阶级斗争等等。

又如在现代企业中如何搞群众运动,等等。

这类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大量存在的。这是人民的内部矛盾,只有多方面提出意见,交换意见,提供材料、证据,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决定。

关于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问题*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七版载有一篇题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署名君达)的文章。该文引用了列宁关于不要过早把共产主义的目的向农村宣传的论述(见《列宁全集》第33卷, P. 420)^①后,认为在我国亦然。

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又向广大群众灌输和要求纯粹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即高级共产主义),势必既不能认真贯彻社会主义原则,也不能真正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只能混淆革命发展的阶段,造成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这“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

作者又引用了1940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应分开的论述,并认为根据这一指示:“可以这样说,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宣传,同对于社会主义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区别开

* 本文是张闻天的一篇读报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标题是编者加的。

① 见1923年1月2日列宁《日记摘录》(《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0页)一文,列宁指出:“决不能过早地抱定向农村灌输共产主义的目的。这个目的现在是达不到的,是不合时宜的,现在提出来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对的,但硬套主席 1940 年的话,则有些问题。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革命性质不同的阶段,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这样说:我们现在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要适合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需要,关于将来高级阶段的许多理想,可以作为将来的思想来宣传(宣传口号),而不作为今天要行动的口号来宣传。(或对部分共产党员来说,也是行动口号。)

读孙冶方同志的《论价值》*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

孙冶方同志《论价值》一文(《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写得比较好,很有思想性和启发性。他企图打破几十年来对于价值问题所形成的陈旧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把价值规律等同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即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规律,即是存在于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社会的经济规律^①。在我国经济学界中开始是怕价值规律,要限制、防止价值规律,要对它提高警惕。后来虽然谈到要利用价值规律,但仍然认为只有商品经济才能有价值规律,认为价值规律同计划经济和国家领导作用是不相容的。计划经济限制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经济消亡了,价值等范畴也就跟着消亡

* 1960年,张闻天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时,正是过去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他同窗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担任该所所长。他们俩人接触交往不久,即在面对当时经济学领域流行的“左”的思潮的许多问题上,思想上产生共鸣。他们反对那种把“价值”和“价值规律”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异物的观点。本文是张闻天读孙冶方《论价值》一文(副题为:《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后写下的笔记。现在看来,张闻天在批评“价值规律”问题上传统的“左”的观念的同时,仍然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等问题上存在着历史的局限。尽管如此,他在文中不但强调“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而且在理论上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经济范畴与社会主义社会存有共同性的一面,这就是他后来在调查基础上向中央提出建立全国市场建议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参阅收入本书的《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本文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6)”,标题是原有的。

① 这里作者将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是长期存在于过去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的传统观念,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才终于彻底打破了这个观念,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

了。孙强调价值规律有狭义的和广义的。同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是狭义的。社会主义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律是广义的,不仅现在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而且还会变得更加重要。

当一个规律(价值规律在内)被认识以后,它就不但不能起破坏作用,而且可以很好地为人们所利用,造福于人类。关于价值规律的防止、限制和提高警惕等说法,表示人们还是不能掌握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因而在这个规律的自然作用前面表示恐惧。

有的人认为利用价值规律就一定要使价值与价格相等,不相等好像就不是利用价值规律,或者认为利用价值规律就一定要使企业赢利,不赢利就是不利用价值规律。其实有意识地拟定价格的高低或确定一个企业的盈利或赔本,就要根据价值规律,利用价值规律。价格同价值背离多少,赔多少,赔多久,都要有有价值的依据。这不能靠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或单纯的政治考虑。

价值的质的方面,“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就是:价值是生产费用(即社会必要劳动)对效用的关系。……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是意味着要把劳动耗费同劳动效果比较。因此,重视‘价值’概念,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就意味着重视经济效果。……正因为如此,所以,长期在理论上否定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概念之后,就会引起对经济效果的轻视(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成本的概念,认为资金利润率、投资效果等都是资本主义概念等说法即是由此而来)”。(孙冶方文,《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第61页)

的确,在我们干部中,价值概念非常薄弱。只要完成任务,就不计一切,不计代价。这也有供给制的影响。怕计算,反对斤斤计较物质利益,把物质利益等同于个人利益,反对算小帐,算经济帐。有人把价值仅仅看作同物质鼓励有关,也是错误的。

从这里又使我想起,我们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经

济范畴的使用,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错误,同时使用时却又照搬原来的意义,而不去指明旧形式下的新内容。我想,只要说明《资本论》的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因为这些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化生产的共同性,还不说在社会主义下也还有资本主义的残余。

我想,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不只是表现生产关系,而且也表现生产力,是从两者的统一中来表现。现在生产关系根本改变了,生产力还存在。所以在指出这些范畴的本质有了根本改变之后,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仍可以而且还必须利用。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决定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各种这项事所有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资本论》卷三,第1116页)

可见,资本主义的“价值”(即表现为交换价值的价值)虽然不需要,但作为社会化生产的必要劳动的“价值”仍然存在。因为价值不但反映生产关系的阶级性,而且也反映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化生产所必要的。

人们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性、特殊性,因而忘记了共性、一般性,忘记了继承与发展。社会有不同的特殊阶段,但它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统一的运动。它们不是绝对隔离着的,而是密切联系着的。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

(一九六一年九月六日——十五日)

一 共性和差别(个性)

(1)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2)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胜利,在中国大约有八年时间是这样的过渡时期),它本身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是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不是在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以外独立的经济形态,它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

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形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经过几个阶段,如生产协作阶段,工场手

* 从1958年起,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在国内普遍流行两种错误观点,一是轻视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是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说成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针对这两种观点,张闻天写下了这篇笔记,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地位、性质、动力和任务等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该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7)”,写于1961年9月6日、7日、8日、9日、10日、15日。

工业阶段,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以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而把它们看作是从封建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指从无产阶级专政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并不是指整个社会主义阶段。)

(3)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成长,就是为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准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它是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是过渡的阶段。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就有不同的小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后,相信共产主义阶段还会有许多发展的小的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不但不会停滞不前,而且还会以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前发展。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阶段,是不对的。

(4)为了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首先必须充分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就是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社会主义阶段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不能跳越。不走完这个阶段,不完成在这一阶段所应完成的任务,不准备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能到达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拥护社会主义就是拥护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5)社会主义阶段担负着准备好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的一切条件、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的光荣任务,所以这个阶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而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者担负着为后人创造共产主义的巨大的、光荣的任务,为共产主义大厦建立基础工程的任务。反对轻视社会主义、急于想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思想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相对稳定性”和关于“凝固论”。)

为何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的经济

形态(虽然还是不成熟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以下的基本共同点:

(1)生产资料公有制;

(2)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互助合作,永远根绝了人剥削人和民族压迫民族的根源;

(3)国民经济的有计划领导;

(4)发展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

(5)生产的动力是全体劳动人民各尽所能的劳动积极性。

为何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同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以下的差别:

(1)生产力的水平还不够高,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

(2)两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的存在;

(3)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的存在;

(4)文化、技术和政治觉悟、道德水平还不够高;

(5)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

为何说,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必须经过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呢?这是因为,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文化、技术和政治、道德的水平,使消除两种所有制的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劳力劳心的差别成为可能,并使按需分配也成为可能。简言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共产主义准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过程,就是给共产主义建立物质、技术基础的过程,就是教育人们成为有高度文化技术和政治道德水平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就是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所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才能达到。(这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不只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规律,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不但是为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且也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规律,在共产主义阶段仍将起着作用。社会主义的一些特殊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在共产主义阶段将失去作用而为另一种规律(如按需分配规律)所代替。但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仍然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服务的。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1)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动力,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运动。现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就不能成长,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不可能。这不是“生产力论”,而是历史唯物论。

(2)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要经常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只是为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脱离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但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僵化不变的东西,和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可以任意调整的东西,都是把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脱离,都是不对的。

生产关系调整的是否适合,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物质生产。

(3)在社会主义阶段,某些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如属于所有制或分配制方面的),反映生产关系的局部的质变。因此这类性质的调整,不但本身需要具备有一定的条件,不能轻易进行,而且更不能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的质的规定性。某些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如在生产管理的民主集中制方面或劳动组织方面的调整,

虽然不属于生产关系的局部质变性质,但对生产力的发展很有影响,也必须慎重从事。一切生产关系的调整,都必须冷静估计当时生产的具体条件及改变后对生产可能发生的利害关系,不能保守落后,也不能轻举妄动。

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发现和解决,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发现矛盾需要时间,对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适合于这种矛盾的具体解决办法,也需要时间。匆促从事,并不是良好的办法。

(4)在社会主义阶段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如从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这是一个阶段,这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又是一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建成到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又是一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是“谁战胜谁”的斗争。这一斗争是以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告终。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基本上已经堵死了;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基本上也已经消灭了(它的主要队伍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时已经消灭)。虽然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分子也存在着,但已经不成其为决定的因素了。虽然对于这些残余不应有丝毫的忽视,但这终究是次要的矛盾了。所以,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主要表现,或基本表现,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注 1〕,而是生产和需要(也即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轻、重的矛盾)或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了〔注 2〕。这些矛盾的特点,就是在于它们基本上的一致性,统一性,不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因此矛盾可以不断发现和不断得到解决。当然。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资产阶

级思想残余的存在,这种矛盾有时也带有阶级矛盾的烙印,但这并不改变这类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的。

〔注 1〕有人把供给制说成是共产主义因素,这当然是不对的。各取所需性质的供给制才是共产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必要消费品的供给制,不能这样说。

〔注 2〕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它可以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例的矛盾,也可以表现为农、轻、重的关系的矛盾,也可以表现为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生产关系上,表现为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也表现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这些矛盾解决的原则,是全面照顾、适当安排,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结合,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适当结合。但究竟如何结合为好,如何结合才算适当,这就可能发生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这种争论,只有经过民主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才能解决。

有人把社会主义内所存在的几种差别(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和由于按劳分配的结果所产生的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当作资本主义残余,或旧社会的残余,因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这些残余的矛盾。这种思想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所以有质的差别,就由于存在有这些差别。这些差别不是靠斗争能够消灭,而正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这些差别,基本上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残余。社会主义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以及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已经同资本主义下的这些差别根本不同了。这是社会主义下的差别,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差别。消除这些差别,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历史任务。当然,这些差别在形式上还带有资本主义残余或斑痕,还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这是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没有的。这些残余的最后消

失,也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生长壮大,和它的过渡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就是成长着的共产主义。它的发展的动力,应该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内容去寻找,而不是从它同旧残余的斗争中寻找。

社会主义社会内的许多矛盾(许多差别),产生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身,不能任意消灭。它的存在与克服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客观必然性(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的动力。这些矛盾不能看做是偶然性的“缺点”或“资本主义的残余”,它们是共产主义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合乎客观规律的东西。只有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创造克服这些矛盾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同时这些矛盾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也是发展着的,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任务,是不断发现这些矛盾的具体表现,并创造条件不断加以克服。(矛盾的解决,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发现矛盾,并不等于现在就能解决这些矛盾。)

(5)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规律的表现,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这种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两极化”,不断激化。在一定阶段,内部矛盾也能得到暂时的解决。但每一次解决之后,矛盾不是削弱了,而是以新的更激烈的形式再产生出来,一直到对立双方以内战的形式出现,并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改变生产方式而告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是被消灭了。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规律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开始产生并起着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规律,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普遍的规律,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的表现和作用却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注 1〕〔注 2〕首先,在社会主义内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等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上是统一的,两者间有矛盾,但并非对抗性的矛盾。第二,矛盾的出现,可以经过人们的认识和自觉行动而及时得到解决。第三,矛盾解决之后,新的

矛盾还会出现,但并不是旧矛盾的激化,而是两者间更加统一(和团结)。第四,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引导到(爆发式的)新的革命的转变,而是(渐进性的)和平转变。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而是阶级差别的最后消灭。从差别到无差别。第五,因此,共产主义不是从根本消灭社会主义而产生,而是从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经过的是和平的转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新的质变,是一种飞跃,但不是革命的突变(使用“不断革命论”的名词,应该是有条件的)。〔注3〕第六,解决矛盾的方法,经过批评自我批评。是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专政的方式。

〔注1〕在社会主义下,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因此矛盾的发展有不同的规律性。

在社会主义下矛盾的性质改变了,这反过来又改变了矛盾发展的趋势、克服矛盾的形式和手段。

在社会主义下和在资本主义下,矛盾的发展的路线和趋向是不同的。

〔注2〕必须具体研究矛盾,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性质硬套到社会主义中来。

试比较资本主义矛盾和社会主义矛盾的差别:

(1)资本主义的矛盾

①对抗性的矛盾。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两个阶级间的矛盾。

(矛盾的性质)

②矛盾不能根本解决。矛盾的暂时解决,只是造成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一时的缓和只是更激烈斗争的准备。

矛盾的发展过程是从差别到本质差别到对立(“两极化的对立面”)。矛盾必然发展为对立。

(矛盾发展趋势)

③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

社会主义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才能产生和胜利。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用革命暴力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

(矛盾解决方法)

(2)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①非对抗性的矛盾。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根本一致。

②矛盾的解决,是可能的。矛盾不断产生,但可以不断解决。

某些矛盾的不断解决,可以使矛盾逐渐缓和以至消灭。

如几个差别,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对立,到本质差别,到非本质差别,到消灭。当然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仍会产生,但新矛盾也可以逐渐解决。矛盾是永远会有也永远可以解决。

客观上,矛盾不能转化为对立。

但如主观上犯错误,矛盾就有发展为对立的可能性。改正了错误,对立性的矛盾又会缓和下来。

③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在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中求得解决。它不要求消灭社会主义,而是发展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它是和平的转变。在思想意识上,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批评自我批评。公式是团结——批评或斗争——团结。

[注3]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关系,能否套用“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成语?值得研究。这里不是革命的阶段,如像人民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样。这里是发展的阶段,同一经济形态的发展的不同阶段。飞跃,“渐进的中断”,质变,可以是革命的结果,也可能是改良的、完善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内,属于后一种。

三 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成长及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规律性,必须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一切经济规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规律性)只有在再生产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离开了社会主义再生产,孤立起来谈各种经济规

律或经济范畴,必然会使理论与实际脱节,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这里只想谈一谈从再生产过程来看社会主义怎样成长并且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规律性。

(1)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其他一切,如精神生产,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存在是第二性的。

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问题。这里有人对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问题;也有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即生产关系问题。再生产过程,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过程,就是提高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增加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的过程。

社会主义再生产,必然是扩大的再生产,而且是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否则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迅速成长,最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里的问题是:①社会主义的壮大,国家的富强,决定于物质资料的扩大再生产,物质产品数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多快好省)。②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最合理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物力和人力(当然也是财力)来进行物质生产,缩减非生产性的物力和人力的消耗。要考虑如何合理安排或以何种比例分配物力(物化劳动)或人力(活劳动)于生产与非生产部门,分配于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③在利用物力、人力方面,主要是最合理地、最充分地使用现有物力和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增加新的物力和人力。④教育人民真正重视生产劳动,重视物质生产。

(2)社会主义再生产是扩大的再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再生产,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年生产的总产品和总产值不仅能在自然形态和价值形态方面(前者分为生产资料的产品和消费品;后者分为 $C+V+M$)补偿生产中的消耗,而且还有新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产值,

也就是还有积累。所有生产部门的产品和产值,不但够本,而且还有赢利。没有剩余产品和产值,没有盈利,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自然也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里的问题是:①要研究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成本与利润的比例,安排年总产品、国民收入、纯收入的关系,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②所有生产单位必须进行经济核算,精打细算,不但算大帐,而且也算小帐。使每年生产,不但够老本,而且有盈余。目前没有盈余的企业,同样也要经济核算,以便将来也有盈余。③必须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不浪费人力物力,不浪费时间,不浪费一针一线,以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

社会主义生产愈发展,积累愈多;积累愈多又愈能扩大再生产,这样使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有高速度的发展,有利于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基础。

(3)扩大再生产,就要把积累基金分成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生产基金中又要分成生产资料生产的基金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基金;消费基金中又要分成满足个人需要的消费基金和满足社会需要的消费基金。(一般教科书只把国民收入分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积累基金只指扩大生产用于物质资料方面的资金,而用于增加工人、增加消费品方面的资金,则归入消费基金。)为了扩大再生产,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部门,同时也要相应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这中间必须要有一定的比例,使之适合于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其目的是要既能满足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又能更多地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适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里的问题是:①社会主义生产的扩大和高速度发展的程度,要根据于生产品积累的数量和质量,有多少布做多少衣服,有多少米做多少饭,不能有主观主义。②生产资金的分配,要有一定的比例,生产的需要和生活的需要,要统筹兼顾,从全局出发来打算。③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资后备,准备生产脱节或自然灾害或战争之用。

(4)从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国家

经济力量(全民所有制)的加强,就是人民公社经济力量(集体所有制)的加强,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这都有利于向共产主义更高阶段准备条件。(人民公社经济的发展,使人民公社的公积金增加,社有经济力量增加,有利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以至向全民所有制逐渐过渡。这也有利于这种差别的逐渐消灭。)

从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怎样表现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生产两大部和农轻重比例的矛盾,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及时发现矛盾,加以妥善解决。从这些矛盾的表现中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并非对抗性矛盾,这些矛盾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中的矛盾,是成长中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可以解决得使之既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成长,又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注〕

〔注〕关于这一矛盾,在各阶层、各集团、各种人物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表现出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见。这类意见只要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以人民内部的方法求得解决。是否真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也要认真研究,不能乱戴帽子。即使原为反对社会主义,经过批评,已经放弃己见的,也应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要以反社会主义论罪。各种不同思想中间,会有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那都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思想上不通的人,只要组织上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决定,也容许保留。这样方能言路大开,真正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一切关于这类问题的解决,真正合乎实际情况。

(5)社会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应该做很好的研究,而现在,一般对这一问题都很马虎,或者不考虑。不考虑在这一问题中所包含的马列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甚至违反这些原理,这是不应该的。把再生产过程全面摆出来,指出其中无可争论的基

本原理,对不了解问题的人,就会有很好的说服力,对于伪马列主义者也容易揭发。〔注〕

〔注〕虽然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生产发展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快得多,但物质生产的增长,是一点一滴的,物质、技术、经验积累过程,在手工业、半机械化的条件下,不可能太快。从建设开始到建成到过渡,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可能很短。人们文化、技术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新的劳动习惯和风气的养成,也要相当长的时期。

四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1)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有机的统一体,所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要联系到它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虽然上层建筑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能不研究它同上层建筑的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它是由党和国家自觉地根据被认识的经济规律来组织和领导的。

(2)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列主义阐明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这个规律有它自己的特殊表现。

党所领导的国家,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政治决定于社会主义经济。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劳动人民之间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和按劳取酬的制度,所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政治职能以外,特别突出的,是它的经济组织的职能和文化教育的职能。它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并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并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一切条件。它为全体人民服务。政治决定于经济并为经济服务。政治不能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

(3)社会主义国家是国民经济的组织者。国家所采取的一切经

济政策和措施都影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如果是符合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国家就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其发展。国家对经济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共产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首先通过国家来实现。政治占首位,就是指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而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或者可叫全面表现,全局表现,概括表现,统一表现)。它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的诸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为国民经济服务。没有党和国家的领导,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成为自觉的、有计划的,就不可能顺利地发展,当然这样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自发论、同客观主义不相容。经济不能脱离政治,而且政治占首位。

(4)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直接表现于它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和许多具体经济措施,表现于动员和组织千百万人民为实现这些而斗争。国家对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在一定条件下(在归根到底它是为经济决定的条件下),它起决定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和国家可以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为所欲为。党和国家不能无视、取消或改变客观经济规律。党的一切政策等等都必须根据客观规律来制定,都必须和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的主要趋向相一致。党必须善于利用和驾驭这些规律为共产主义服务。党和国家愈能正确地认识这些规律,熟练地运用它们,它们就愈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愈能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社会主义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相容。

(5)正因为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作用,正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必须在为人们认识之后,成为“被认识的必然”,才能为人们所利用,所以它们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无比复杂和艰巨。它们必须对经济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其规律性,然后根据此种规律性定出政策、计划、措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在这方面犯错误,就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影响到亿万人民的生活。

因此,对此必须谨慎从事。在这方面,一般说来,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不犯大错误,即使犯了大错误能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就是很好的领导了。

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自发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些客观经济规律前面无能为力,它不能起经济组织者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必须在被认识、被利用之后,才能起积极作用。而党和国家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可以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所以国家就有直接组织经济的任务。

(6)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工、农、知识分子的经济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各族人民的经济利益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这种经济上的一致,又表现为政治上精神上的一致。如果说,生产资料私有制使人们分散、隔离、对立,把人们分成为不同的敌对的经济集团,那末,生产资料公有制则使人们联合,统一成为一个伟大的集体,把各族人民团结成为一个友爱的大家庭。这种团结、统一和友谊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就是发展和巩固这种团结。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还存有几种差别,因此也就存在有矛盾。这种矛盾也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工、农、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很为复杂的。由于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任务,就与资产阶级国家不同,不是站在一个阶级、一个集团的利益上,反对另一个阶级、另一个集团,而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是照顾到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巩固工农联盟。矛盾的解决,不但不破坏团结,而更有利于团结;不但不削弱群众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更有利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就是要经过党和国家的自觉行动来实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客观经济规律,一定要经过人们的自觉利用,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由于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所以解决的方法,主要的应该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

依靠教育与说服,依靠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内,几种差别将长期存在,所以矛盾也将长期存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善,矛盾将不是激化,而是逐渐和缓。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及时发现矛盾,解决矛盾。

(7)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必须使人们能够掌握经济规律,掌握生产技术,并且有高度的生产积极性,正确的劳动态度,很健康的身体。国家的文化、教育职能,就是为此服务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改善对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和国家不但要改造自然,而且也要改造人。上层建筑的文化思想领域,也必须动员起来,为经济建设服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都要为发展生产服务。只有生产发展了,劳动时间缩短了,人们的文化水平、思想水平,才能进一步提高,人们才能从自然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生活问题上解放出来,而成为多方面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文化教育应为经济服务,经济又把文化教育工作提到更高的阶段。

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特点,就是马列主义是唯一统治的思想体系。所有各阶级各阶层都接受马列主义,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但在思想领域内的矛盾,还是比较复杂的。这里,需要克服的是各种各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各种保守落后的思想和盲动冒进的思想。在思想领域内实行民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自由争论的空气,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马列主义是唯一的统治的指导思想,所以更需要如此。)人民思想生活的活跃,科学文化的繁荣,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

(8)从上面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基本上适应于经济基础,能为经济基础服务,但两者也有矛盾。基本适应,表现在党和国家基本上掌握着经济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指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矛盾主要表现在,党和国家在领导经济上,由于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短,经验不足,还有缺陷。这些缺陷表现在:①有的经济规律还未摸透,有的规律还未充分认识或者认识有片面性,因而某些政策、计划或措施不尽合乎实际情况。②有些政策虽有原则规定,但还缺乏具体措施,或者虽有具体措施,但未被下级正确了解和执行,或被官僚分子或反坏分子有意歪曲。③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还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下情不能上达,群众未充分发动,没能很好贯彻群众路线。④没有很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制度,民主不够,或集中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未能很好开展,等等。这些缺点,都使经济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不能及时迅速反映,加以正确的研究和处理。但这些矛盾,是能够解决的。虽然它们的解决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每一次解决,会使上层建筑更能为经济基础服务。当然,经济的发展又会使两者之间发生新的矛盾。矛盾及其解决,永远是我们前进中的动力。

待研究: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大搞群众运动?轰的办法如何?实践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应强调。它是认识的基础,真理的标准。

提高文化的重要。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文化不行。

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

(一)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已取得了“完全的最终的胜利”，为时过早(过高的估计，得出过早的结论)。实际上《纲领》所谈的下一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阶段(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后期阶段)。照《纲领》上所谈的20年共产主义建设，达不到“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

因为那时两种所有制，并未改变，按劳分配还存在(而且类别还会增长)，三种贸易形式不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如何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国际条件的限制，要把很大一部分经费用来备战。

(二)问题何在？

只发展生产力，不改变生产关系，建不成共产主义。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领导，建不成共产主义。修正主义思想，只能建设福利国家，不能建设共产主义。

(三)批评中应注意之点：

批评其不重视生产关系，不要走到否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批评“全民国家”，不要重复阶级专政的旧观点。

(四)应当看到：

*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纲领》。《纲领》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并宣布再经过20年，“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本文是张闻天读《纲领》时写下的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7)”。标题是编者加的。

阶级矛盾基本解决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

无产阶级专政仍然必要*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

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政治、思想的作用,不是削弱,而是应该加强。没有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和党的组织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只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过渡就不可能。

资本主义思想和行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其生长的基础。

无产阶级的职能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变化,但专政仍然必要。

镇压的职能将从主要成为次要,但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持社会主义秩序的职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职能。这一职能,靠说服教育工作,但仍然不放弃镇压,如有这种必要。而且对国外间谍特务,更不能不采取镇压!政府的决定、法律,仍然有强制性。强制性,这就是专政的一种表现形式。

* 本文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7)”。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按比例”与“不按比例”*

(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日)

所谓“按比例规律”实际上是“不按比例”和“按比例”的矛盾统一的关系。生产的进行，一定要有一定的比例，但这种比例经常同不按比例统一着。在资本主义社会，按比例只是在不按比例中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社会，按比例起着主导作用，但仍同不按比例结合着。有计划的领导，就是要扩大按比例，缩小不按比例，使生产有节奏的进行。而自发的按比例，为自觉的按比例所代替，也就是扩大按比例，缩小不按比例。(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能动作用，亦应有如此看法)

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因此都有对立面，都有两种可能性、两种趋势。这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也是适用的。自觉领导的任务，就是发展有利于我的趋势，缩小不利的趋势。如此而已。

* 本文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7)”。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 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

(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月)

一 社会主义建设要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经验

社会主义建设要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经验。这里有摸索的过程，试探前进的过程。多变是不可避免的。^①

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道理是容易懂得的，但如何建设，要靠人民群众的集体经验。^②

如何实际地去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寻找到达目的地的切实可

* 本文是张闻天读列宁著作时所写的一部分批注选编。标题和分类标题均是编者拟的。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了总结经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在中央进一步调整全国经济政策的形势下，张闻天4至6月集中阅读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三卷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并在阅读过程中结合思考写了大量的批注。张闻天这次阅读是在他南方调查途中进行的，不少批注也同时集中反映了他在调查过程中对中央许多政策性问题、特别是集市贸易问题的思考。

① 这是张闻天读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5月26日）时写的一条批注。列宁的话是：当我们完全按照新的方法来组织几亿人生活的时候，“这里当然不能像俗语‘七次量衣一次裁’那样简单地来处理事情”（《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3页。（以下引文均为张闻天当年读的1958年版）

② 列宁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依靠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同上，第384页）。张闻天在读列宁这段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行的途径和形式。^①

二 社会主义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 是组织经济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即组织经济建设的任务！^②

经济工作不能像政治军事工作那样迅速达到目的。它不能凭一时的热情前进，也不能跃进，计算时期，不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而要以几十年计算。

政治军事任务靠工农的革命热情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不能如此。^③

在学习新政策方面的主要错误，就是往后看，迷恋于过去的经验，即政治军事斗争中的经验。

新政策是我们学习管理经济的一种形式。

根本错误就在于根据昨天的经验来解决经济任务。过去的优

①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实际主义和求实精神”时说：“大厦的图样我们早已绘好”，“现在问题就在于从各方面着手实际地建设一座大厦”（《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96页）。张闻天在读列宁这番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② 这是张闻天在读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月—4月）时写的一条批注。列宁的话是：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取得了和平，“就能够在相当期间内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方面，即集中到组织任务上来”（《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16页）。

③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12月23日—28日）一文中论述经济任务与政治、军事任务的不同，指出：“在这里，我们已能像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那么迅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可以在工人农民当时的觉悟水平上靠提高他们的热情来解决”，而在经济方面，“我们不能凭一时的热情前进，也不能跃进；在这里，时间也不同，时间是以几十年来计算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34—145页）。张闻天在读这些论述时写了这两条批注。

点变成今天的缺点。“一个人的缺点仿佛是他的优点的继续。”

轰轰烈烈惯了的人，不习惯于冷冷清清。

现在任务是，完成政治变革，消化它，把它实现，而不是改变它，这件工作需要几十年，要花费极大的气力。^①

三 为了恢复工业，必须从改善农民生活和发展农业开始

为了改善工人状况，恢复工业，必须从改善农民生活和发展农业开始。

为何开始？粮食税与自由贸易。^②

贫困产生消极心理，阻碍群众的热情。^③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的基本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小资(产)阶级的问题！

①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1年12月23日—28日)一文中总结一年来贯彻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往后想，迷恋过去的经验”，这是“根本错误”，批评一些同志“往往借口过去作过大事，不愿意作辛勤的、艰苦的、长年的经济工作”(《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32—145页)。张闻天在读这些总结时写了上面这一组批注。

② 列宁在《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一文中分析当年春天苏维埃面临的形势时指出，“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并着重论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接着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缴完粮税之后的自由贸易，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自由贸易相联系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332页)。张闻天在读这些论述时写了这两条批注。

③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日—16日)演说中指出当前“主要的障碍是贫困”，“我们不要怕如实地说出这种正常的灾祸”(《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241页)。张闻天在这段论述下面写了这条批注。

英国也无例外。^①

必须采取满足农民要求的办法,善于寻求同小农共处的形式。^②

为了巩固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不仅要斗争,而且要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上联盟。^③

用一切办法实际改善工农生活。^④

关心个人利益,为了使之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⑤

①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一文中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规定与具体实施种种必要办法,以保证对农民的领导,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认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将来都会碰到这样的任务,也许只有英国例外”(《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43—444页)。张闻天在读这段话时作了这样的批注。

②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日—16日)演说中指出:“过去我们在战争的重压下,不能集中精力考虑怎样处理国家政权……同小农之间的经济关系,怎样寻求同小农共处的形式”,而现在提出让他们“有一定的周转体系”,就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177页)。张闻天在读这一分析时写了这条批注。

③ 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1年3月27日)中谈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时说“假如我们战胜不了这个势力,我们便会像法国革命一样倒退回去。”他强调“应当尽力改善这些群众的生活,并且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269页)。张闻天读这些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④ 列宁在《劳动国防委员给各地与苏维埃机关的指令》一文中提出“更大胆更广泛地采取种种办法”,使工农业得到发展,同时“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最可靠地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370页)。张闻天在这段话旁写了这条批注。

⑤ 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一文中说“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我们无论如何首先要增加生产”,这样就能引起千百万小农的经营兴趣,“把他们引导到更高的阶段,在生产中用各种形式联系和联合起来”(《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39—40页)。张闻天读这几句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四 谁能更好地利用市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好处

谁得到好处多,是大工业?还是小资产阶级?人们怕小资产阶级得到的好处多。

害怕小资本的上升,没有根据。

谁能够更好地利用物资,利用市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好处。

什么是应当怕的?什么是不应当怕的?^①

必须懂得经商,同自由贸易进行竞赛,利用自由贸易的武器,击败自由贸易!^②

列宁把“商品交换”等同于“产品交换”。

商品交换没有成功。

商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

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整商业和货币流通!

还有人对于这一政策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以为搞买卖就不是共产主义!

现在还不能停止退却。对自己,对群众,对工人阶级隐瞒这一

①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2月8日—16日)演说中针对有人反对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的错误观点:新政策会使小生产得到的好处多,指出,这“是一个怎样把利用我国物资和发展市场连结和结合起来的问题”,“我们中间谁更好地利用这种方法,那他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应当怕的是“极严重的饥荒”,而不是在粮食增加情况下的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224—226页)。张闻天是在读这番论述时写下上面这一组批注的。

② 列宁在1921年6月16日所作的《在全俄粮食工作第三次全体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为了实现商品交换,为了不被自由市场击败,即不被自由贸易击败,我们就需要很好地懂得经商,同自由贸易进行竞赛,并用自由贸易这一法宝和武器来击败自由贸易。”(《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38页)张闻天在读列宁这段话时写了上面批注。

点,就等于没有觉悟,没有勇气正视现状。

新政策必然要扩大一些矛盾。它特别危险,所以要特别指出它,并学会克服它。

有人以为承认错误就会泄气,有人不愿做生意,认为同共产主义“不相容”。这些观点都妨碍新政策的实施。

现在必须学会做买卖,搞独立会计。

成见和往事的回忆,阻碍事情的发展。

什么时候准备好进攻,就什么时候停止退却。这决定(于)工作与学习。^①

从列宁的许多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反对新政策和不了解新政策的本质的人,是非常多的。其中有很多的从“左”的方面来的。^②

对小农的刺激、鼓励,离开周转自由是不可能的。

这种自由,是农民的需要,也是客观的需要。过去在这方面做得太过分了。

周转会生长富农。

周转的好处,可以满足中农,巩固工农联盟。

① 这是张闻天读列宁1921年10月29日至30日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所作《论新经济政策》报告并结束语时写下的一组批注。从张闻天所注阅读日期(1962年4月12日、6月16日、1968年1月20日)看,他很重视这篇文章。他首先在文章的标题旁注明此文要议:“说明从何种意义上说来,过去的政策是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必要,并指出退却还没有停止。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列宁在报告的结尾指出:“不管我们觉得商业距离共产主义多远,但正是在这方面我们面临有一项特殊任务。只有解决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满足经济方面极其迫切的需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通过一条比较长远的、但是比较可靠的、也是我们目前唯一能走的道路来恢复大工业。”列宁认为:“这就是我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应看清的主要之点。”(《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77—78页)张闻天在列宁上述两段话下面批了横杠,“主要之点”四字下面特别打了双杠。

② 这是张闻天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61页列宁《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1921年10月29日—31日)一文标题上端书眉线上写的一条批注。

只要小农是小农,就必须保证有一定的周转体系。
一定程度的周转自由的必要。问题在如何掌握分寸!
农业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必要。使农民能在地方上实行周转。
双方有利。^①

五 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

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②

有自由贸易就会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复活。危险吗?
在自由贸易中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③

① 以上是张闻天读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日—16日)上所作俄共中央总结报告以及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报告时写的一组批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是讨论并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大会,列宁在上述两个报告中都着重论述了为何要保证农民有一定的“周转自由”,即在市场上买卖自由的问题,并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做得过分了: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了。”(《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208页)

② 这是张闻天在读列宁《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一文时写的一条批注。列宁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和方式。”(《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342页)张闻天读这段话时既打了竖杠,又打了横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③ 列宁在《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一文中讲到粮食税实行的结果必然“会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自由贸易基础上,使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活”。但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如果“是没法把这种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情况下必然发生的非国营的私人交换的一切发展,即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一概加以禁止,加以封闭”,“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而“唯一合理的政策”,就是“努力把这一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334—336页)。张闻天在读列宁这些论述时写了上面两条批注。

从分析俄国经济证明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小私有经济。小资产阶级抗拒国家的统计和监督。

政治革命越彻底,越不应该惧怕“国家资本主义”!

目前形势的特点,从没收到社会化。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了解这种区别。^①

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在扩大周转方面,许多地方还应向资本家学习。

为何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助手?

何谓投机活动?

何种投机活动应该受到制裁?何者应该支持?^②

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中非洲居民的心理!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济为基础的。鲁迅的“拿来主义”!^③

① 以上是张闻天在读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5日)一文时写的三条批注。列宁说:“‘左’派的厄运,就在于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没有看到由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接着列宁从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具体国情出发论证了为何“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个进步,又从“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已经得到保障的国家”这一立足点上论证了为何不应惧怕“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08—第317页)。

② 列宁在《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一文中强调“要用一切办法来发展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发展工农业的流转”时,说到“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在俄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存在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隘”的。列宁还批评了苏维埃政府在扩大周转方面存在的官僚主义,认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在列宁进一步强调“无论如何都要活跃工农业间的周转”时,甚至提出“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说这“丝毫也不是奇谈”。列宁在全面论述贸易流通时还提出应该对“投机活动”进行区分:“正当”的与违法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344—349页)。张闻天在读列宁这些论述时写了上面这一组批注。

③ 列宁早在1918年4月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谈及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精通业务的第一流专家时就指出:“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85页)张闻天就在读这段论述时写下了上面这条批注。

公开的敌人没有了。敌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商品交换。如果这个敌人占了上风，一切就会复辟，关于这一点人民不会了解；先锋队的任务，就在于向他（们）说明事实的真象。

要对这个敌人取得胜利，就只有依靠工农的自觉性和组织性。^①

六 学会做经济工作，向经济科学进军

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向经济科学进军。^②

粮食工作人员不仅要从粮食工作着眼，而且应从整个政策着眼。

分配粮食不能平均主义，要为生产服务，要成为提高生产的一种工具！

① 列宁在1921年10月总结新经济政策，回顾在实行这项政策之初时确实存在一般工农不了解存在于人们当中的敌人的危险。列宁说：“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大家都认识到，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8页）张闻天读列宁这段话时特别在“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下面打了双杠，并写了上面第一条批注，接着又在列宁所说战胜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同上，第49页）下面同样打了双杠，并写了第二条批注。

② 列宁在1921年10月总结新经济政策时强调干部要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他说：“让他们（指资本家）去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作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关于经济工作，列宁指出：“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因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8—49页）张闻天在读这段论述时写了上面的这条批注。

粮食工作人员应该是一个经济学家。^①

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从全局观点,政治观点出发解决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解决不正确,就不可能正确解决经济问题。

不犯政治错误才能搞好经济。^②

物质条件具备之后,没有政治觉悟还是不行的。自觉性的作用。^③

① 列宁 1921 年 5 月 30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地方经济机关的演说》中强调了粮食工作的意义。指出如果不能收集大批粮食,保存大量的国家储备,“要想恢复大工业和货币流通都是不可能的,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懂得,不恢复作为唯一实际基础的大工业,就谈不到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 435 页)。张闻天在读列宁这段论述时写了上面第一条批注。接着张闻天除了表示赞成列宁所说不能按平均原则分配粮食外,还明确认定分配粮食要为生产服务,赞同列宁所说,粮食工作人员“应该做一个经济学家”(《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 439 页)

②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列宁同托洛茨基、布哈林争论时提出的论断,张闻天在读列宁《再论学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时,不但批注重复了这句名言,而且在列宁所论述的“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这句话的后面写了批注。(列宁的论述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 71—74 页)

③ 这是张闻天读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 年 3 月 28 日)时所写的一条批注。列宁的论述是:“我们几乎还要重新来解决一个任务,解决这个任务的一切物质前提都已具备,只是缺少对这个任务的必要性的认识和解决这个任务的决心。这项任务就是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186 页)

八 先锋队不要怕自我教育

先锋队不要怕自我教育、自我改造。^①

敢于承认失败、错误，并从中学习。非常重要！^②

公开指出我们的缺点错误，以教育群众，同群众一块从实际中
学习建设。^③

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自己来改正。^④

看到缺点错误，坚持去克服它们，反对张皇失措。^⑤

① 列宁在1922年4月2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说：“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公开承认自己的修养不够，本领不大”，并强调要“对自己的每一步骤进行千百次的实际检查”（《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89页）。张闻天在读到列宁这段论述时写了这条批注。

② 列宁在莫斯科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所作报告（1921年10月29日）中谈到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过程中引起一些人的怨言和不满时说：“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取得一切教训”。列宁还说：“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末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解决自己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71页）张闻天读列宁这些论述时划了横杠和竖杠，并写了这条批注。

③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月—4月）一文中谈及用高薪来吸收资产阶级专家是不得已，离开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个问题时说：“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要懂得：“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28页）。张闻天读列宁这段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④ 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所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中对与会代表说：“你们自己要把事业担当起来，在各方面都担当起来，天天都要揭露营私舞弊的现象，用自己亲身的经验来改正所犯的每一个错误”（《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6页）。张闻天在这段话旁写了这条批注。

⑤ 列宁在1921年8月5日《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一封信》中在谈到当前困难和缺点时说：“……我们从不粉饰太平。我们知道各种困难，看到一切毛病。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医治这些毛病，我们并没有张皇失措。”（《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94页）张闻天在读到列宁这番话时写了这一条批注。

退却时,不要灰心失望,要冷静估计形势,不怕承认错误,不断改正错误,继续攀登高山。^①

九 反对冒进和吹嘘

应当对任何冒进和吹嘘等采取怀疑态度!^②

光看好的一面,是主要的错误。也要看坏的一面。光看好的一面,常常会使计划落空,使人们陷入官僚主义幻想!^③

对一个真正革命家的最大的危险何在?(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顺利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

① 列宁在1922年2月底写的《政治家的短评》一文的开头用攀登高山做比方说明应该怎样对待征途中的艰险(《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74—175页)。张闻天的这条批注就是在读列宁这段论述时写的。

② 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一文在谈及急躁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害时说道:“我们应当及时放理智些,应当对任何冒进和吹嘘等采取有益的怀疑态度,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进行,而后来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巩固、不稳定和不了解的前进步骤。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42页)。张闻天在读列宁这段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③ 列宁1921年7月4日写的《对国家经济“计划”的几点看法》一文首先强调了计划要务实,他说:“过去我们的主要错误就是先看到好的一面,因此陷入了官僚主义的幻想。我们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实际生活和一切人都嘲笑了这个计划。应该彻底修改。要看到坏的一面。已有的经验虽然少,但是很实际。”(《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84页)张闻天在读到列宁的这番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件。)说得太好了!!!^①

光蛮干和突击是不行的。为此,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然后检查!^②

瞎指挥一定要破坏生产力。^③

① 这是张闻天在读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一文时写的一条批注。列宁在指明革命家的“最大危险”是夸大革命性时,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列宁说:“真正的革命家如果一开始就大书特书‘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一种神通广大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37—38页)。张闻天在写这条批注的同时在列宁这些话下面划了横杠,又在旁边划了双杠。

② 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一文中说到苏维埃要建立起“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新机关时说:“……作这个工作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光靠蛮干和突击,光有机智和毅力,或者光有人的任何优良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又说:“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词藻(老实说,这种现象在我国是特别常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42—443页)张闻天在读到列宁这些论述时写了这条批注。

③ 列宁1922年4月1日在《给奥新斯基的信》中特别提醒俄共中央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具体化,即变成更详细的法律时,“不要因进行无能的干涉而妨碍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92页)。张闻天在读这句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应做到：不是我们夸自己，而是工农群众夸我们。^①

不要用谎言欺骗自己，欺骗别人！^②

十 贯彻民主集中制，发展各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

民主集中制，即反对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又反对无政府主义！

集中统一下的民主——容许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③

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密切国家和人民的联系。发展各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④

报刊的任务——对人民进行经济教育的工具。报导好的典型，

① 列宁1922年11月21日发表的《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中讲到贯彻新经济政策已经使党“踏上了实际的道路”时，强调：“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国人民都来检查我们的方针”。列宁说，要使大多数劳动群众——农民和工人都说“不是你们自己夸自己，而是我们夸你们。你们已经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有了这个成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决不会想回到旧制度去了。”接着列宁说，“但是这一点还没有作到”（《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399—400页）。张闻天在读这些话时都打了横杠，并写了这条批注。

② 列宁1922年3月16日在《评普列奥布拉基斯基同志的提纲》中对该提纲表现的空泛、夸大的言辞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其中一例是批评《提纲》把“国营农场工人”说成都是“农业无产阶级干部”；列宁说：“这是‘共产党员的吹嘘’”，“国营农场工作往往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贫民’，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要用诺言来迷惑自己”（《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10—211页）。张闻天在读列宁的这番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③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提出“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并指出：“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同官僚主义集中制，另一方面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是多么大”。还说：“民主集中制决不能排斥自治制和联邦制，同时丝毫不排斥各个地区以至全国各个公社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有采取各种形式的完全自由”。张闻天读列宁这些论断时写了这两条批注。

④ 列宁1918年3月—4月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有一节“苏维埃组织的发展”专门谈苏维埃民主问题，列宁提出，“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并认为，“苏维埃与‘人民’，即被剥削劳动者保持着稳固的联系，保持着灵活的和能伸缩的联系，就可以防止苏维埃组织受官僚主义的毒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50—253页）。张闻天读这一节论述时写了这条批注。

也揭露工作中的缺点错误。^①

可以用某种开玩笑的手法揭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东西。可以用讽刺！

要善于用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行动——中国大官下去有用化装的办法——私访。^②

十一、文化任务是同建设经济的任务同时被提出来的

要教育群众懂得这一点：“文化任务”是同建设经济的任务同时被提出来的。

要为政治成果奠定经济基础。为此，提高文化的重要。识字、读和写的重要。只有这样，农民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情况和国家情况。才能同拖拉作风和贪污行为做斗争。^③

① 列宁1918年3月2日口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曾提出要把苏维埃报刊“由主要报导政治新闻的工具”，变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列宁还认为报刊不但要宣传模范，而且“通过报刊来揭露各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86—187页）。张闻天在读这段讲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② 这是张闻天在读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关于工农检察院工作的论述时写的两条批注。列宁说：“为什么不把快意的东西跟有益的东西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运用某种玩笑式和或半玩笑式的手法揭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半有害等等的东西呢？”列宁还说到“中央监察委员除了审查文件，检查公文程序以及研究理论”，“这点学院式的工作以外，他们还要训练自己做别的工作，这种工作，不客气地说，虽然不是捉拿骗子，但也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时还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行动、手段等等。”（《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47—449页）

③ 这是张闻天在读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报告《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时写的两条批注。列宁在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之后，即提出被一些人看作“小事情”的文化任务。他说：“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所取得一切政治成果都断送掉，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而在做奠定基础这件工作时，“提高文化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列宁还说：“为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种思想，要进行政治教育就无论如何要提高文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53—56页）

加强提高文化的工作,为此就要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应考虑)城市如何在文化上帮助乡村。^①

十二、把改善国家机关同党的战略任务结合起来

改善国家机关同整个战略任务结合起来!^②

保持住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每一分钱用来工业化!这样才能得救!^③

机关就服从政策。政策是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机关愈坚强,就愈能随机应变。坚强不等于僵硬性。^④

容许党政结合。(列宁在)这里强调了它们的结合,而未谈其区

① 这是张闻天在读列宁《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时写于标题旁边的一条旁注。列宁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没有注意到或很少注意到提高人民教师地位的问题,而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就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18页)

② 这是张闻天在读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的结尾时写的一条批注。列宁在这里说:“只有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在这种多方面都很有有限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55页)

③ 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一文中说:“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了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54页)张闻天在读列宁这个论断时写了上面的批注。

④ 列宁1921年3月15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指出机关应该完全服从于政策,因为政策是“阶级之间的朴素关系”,而这是“决定着共和国命运的”。机关则是一种“辅助手段”,“它愈坚强,就愈好,愈能随机应变。如果它不能做到这点,那它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217页)。张闻天在读这段论述时写了这条批注。

别。不能因此否定区别。^①

要发展民事周转,加强革命法制。^②

十三、干部必须懂得业务

光是忠实可靠是不够的。必须懂得业务!^③

需要何种人才?光有优良品质不够,还要有知识有才干!^④

老干部的责任在教育新干部去研究实际经验!^⑤

① 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一文中有一节是来谈“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49—450页)。张闻天在读这一节论述时写了这条批注。

②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报告中谈到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时,一方面指出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情况下,应该“重视和利用全俄肃反委员会这样的机关”,另一方面又“必须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规定它的职能和权限,使它的工作只限于政治任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流转,新经济政策要求这样做,而这样做又要求更多的革命法制。”(《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48页)张闻天在读这段论述时写了这条批注。

③ 列宁1922年3月6日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演说《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中,严厉地批评了官僚主义者,他说:“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不担任要职的),由于为人诚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96页)张闻天在读列宁这两句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④ 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一文讲到真正苏维埃机关的建立需要靠文化时指出:“在这里光靠蛮干和突击,光有机智和毅力,或者光有人的任何优良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42页)张闻天在读这句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⑤ 列宁在1921年1月发表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谈到干部的“生产教育”时,指出:“对我们自己这些老的秘密工作者和职业政论家的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遵照‘七次量衣一次裁’的规则,自己动手并且教会别人动手去仔细地研究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79页)张闻天在读这段论述时写了这条批注。

十四、要特别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

对黑格尔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要)特别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做了示范。^①

压迫阶级压力愈大,剥削者反抗愈烈。(斯大林过分发挥这一正确原理)^②

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分析,是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也是决定一切政策的基础。^③

冷静估计力量的重要!失去了冷静估计力量的能力,就会犯错误。^④

① 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1922年3月12日)一文中倡导自然科学家“应该作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作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也就是说应当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时,提议当时在莫斯科出版社哲学和社会经济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月刊)撰稿人应该从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同时要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04页)。张闻天在读这些论述时写了上面的批注。

② 列宁指出:“剥削者,残暴的地主,资本家阶级是说不服的。社会主义革命证实了大家的预见——剥削者全力进行反抗。被压迫阶级的压力愈大,他们愈要消灭一切压迫和剥削现象,被剥削的农民和工人愈坚决地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则剥削者的反抗就愈疯狂。”这段话见列宁1918年6月27日《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435页)。列宁是在苏维埃俄国遭受严重饥荒情况下分析国内形势时讲这段话的。张闻天在读列宁这番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③ 列宁在1921年3月27日《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只有善于正确地、完全清醒地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感情和愿望”来估计“各种对立的”阶级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我们的一般政策以及我们最近的任务做出正确的结论”(《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259页)。张闻天在读这段论述时写了这条批注。

④ 列宁在《给格·来雅斯尼柯夫的一封信》(1921年8月5日)中批评他脱离“阶级的相互关系”提出“出版自由”口号,列宁说:“您让一些可悲的、痛心的事实把自己压倒了,失去了冷静地估计力量的能力。”(《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93页)张闻天在读列宁这段话时写了这条批注。

包产到户问题值得研究*

(一九六二年七月九日、十八日)

一

包产到户问题值得研究。

这是不是集体经济？从产品和土地所有权看，还是。

是不是单干？是单干，但不是个体经济。

这是一个经营管理问题，劳动组织问题，不是两条道路问题。这是“个人责任制和产品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是“从个人计件、小段包工演变出来的，是经营管理中必然出现的形式。”^①

二

包产到户的发展趋势——扩大的趋势。（地区扩大，拥护的人增多，干部参加的多，议论也多，有中农、贫雇农等等。）

* 1962年在农村许多地区自发地不断出现包产到户，成为当时农村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党内引起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否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文是张闻天当时阅读有关包产到户资料时写下的笔记，第一部分是7月9日所写，第二、三部分是7月18日所写。标题是编者拟的。

① 引自一内部刊物。

为何如此？

(一)这是对过去“左”的错误的反动。“左”的错误，使集体所有制生产受到损失。（“左”是右的好朋友）群众生活贫困。

(二)下面对《六十条》不了解，不贯彻。事实上在执行《六十条》中，对如何组织劳动，如何按劳联酬等许多具体问题，也未很好解决。群众不相信现在的办法能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表现出群众对现在办法也信心不足。

(三)群众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群众对现有的饥饿生活不能忍耐。既然对集体缺乏信心，就只有靠自己流汗，害怕继续受饿。将其看做是生死问题。（为了生命）

(四)群众对党，对干部能否真正搞好生产信心不足。对党的政策不落底。

对趋势的估计？

(一)是一种后退，从集体生产退到包产到户，削弱了集体阵地。

(二)但仍然不失为调动积极性的一种办法。为了保命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有一时的推动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不能肯定一定减产，一定完不成国家征购计划。可能比勉强的集体生产要好。有的地方证明是好的。）

(三)还不能说农民现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农民并不喜欢走老路，但对走新路缺乏信心。

包产到户还不等于单干，不等于个体经济。

(四)还不能说，这样就一定两极化。因为有国家、党、人民公社的领导。

总之，没有惊慌失措的理由，问题在于党如何去领导。

如何办？

(一)不去强扭,而是加强领导,切实帮助,使他们增产,改善生活,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同他们对立,而同他们一起;不去空洞指责,而是实际帮助。要根据群众多数意见办事。

(二)切实加强对于生产队的领导,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使生产队增产,生活改善得比包产到户更好。只有这一条,能够扭转包产到户的趋势。农民不相信空话,相信实际。必须进行示范的教育。没有这一条,任何教育,也教育不了。

(三)切实教育干部,整顿干部作风,要求干部同群众同甘共苦,千方百计联系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

(四)不要惊慌失措,要积极工作,同时要善于等待,根据群众切身经验,提高其觉悟。斗一斗,辩一辩,解决不了问题。

三

安徽省纠正“责任田”,是在今年三月上旬,通过了决议。纠了一个时期,农民不满的很多。福建,扭的结果反而扩大了。“部分地区包产到户,续有发展。”^①

是否不只是思想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否则为何光打通思想解决不了?

因此要在经济问题上拿出办法来。

^① 引自一内部刊物。

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

—

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发展过程中,在市场和物价方面,有以下趋势表现得比较明显。

一、由于工业品不足、农副产品特别是粮棉油不足和国家发行货币过多,农副产品在集市(即所谓“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即“自由价格”)提高很多,虽然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起落。国家在计划市场上按计划价格供应的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的产品)在集市上都有黑市价格(即“自由价格”)。在那里甚至国家的各种票证和购货证也都有黑市价格。这些黑市价格都比国家的计划价格高得很多。农民对国家开放集市贸易是满意的,因为他们可以高价卖出他们的农副产品,同时也可以买进(虽然也是高价)一部分国家所不能供应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他们对市

* 1962年4月至6月,张闻天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四省市的城镇、农村进行了一次以农业情况为重点的社会调查,本文是在这次调查结束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本是从1960年冬起中央为克服困难、纠正错误的措施之一,而这篇报告所提出的有计划地扩大集市贸易,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向农民宣布完成交售任务后在集市自由出卖粮棉农副产品,以及允许个体商贩加入突破本地区范围的商品流通等项意见,已是实际上超出当时中央规定的属于重大政策性改革的建议。然而这份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生产、适当允许非公有成分进入商业渠道的重要意见书,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反遭批判。

场上物资数量太少、品种太少,国家对集市贸易管理太严、限制太死,使他们不能自由卖出他们的农副产品并买入他们所需要的物资,是不满意的。看来,许多人为的限制并不能取消黑市,却反而助长了黑市物价的上涨,给投机商人以更多机会。而在限制较少的集市,上市物资就比较多样些,物价就比较低些,投机倒把也比较少些。

二、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包括征购和派购),也多少随着自由市场价格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了。一九六一年,国家公开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一九六二年,各地所实行的单项奖售^①和综合换购^②等办法,是各种变相的提价。各地实行这些办法时,标准不一,造成收购价格上的一些混乱现象。农民对这些办法虽然有比较好的反应,但他们还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比较普遍的要求是,国家把征购、派购的任务一次定死,他们保证完成这些任务;同时,他们要求有权把一切剩余农副产品(包括一类物资),在集市上按自由价格出卖,并自由选购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虽然国家现在禁止一类物资及完成派购任务前的二类物资^③的公开出售,但这些物资仍然经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进入自由市场。这种趋势,也就影响到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计划的完成。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国家完全禁止一类物资的出售,目前使重点产粮区的粮农损失比较大。粮农按国家收购价格出售农产品,不但不能保证其扩大再生产,甚至简

① 单项奖售,即国家在收购某些重要经济作物时,向出售者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或棉布、化肥等工业品的奖励办法。其目的是保证国家收购任务的完成,促进农副业生产的发展。

② 综合换购,即国家对完成交售计划以后的农副产品实行以工业品换购的办法。例如,1962年外贸部门曾对137种三类小商品的计划外收购部分,以价值相当于收购金额30%的各种工业品交给地方进行综合换购。

③ 为了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做好物资供需的平衡,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稳定,国家按各种物资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分三类管理,即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中央各主管部门分配的物资和地方管理的物资。根据商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国家对商品也分一、二、三类管理。这里所说的一类物资和二类物资,都是就农产品而言的。一类物资,当时指粮食、棉花、食油。国家对这类物资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二类物资,当时指烤烟、麻类、甘蔗、茶叶、猪、牛、羊、鸡蛋、蔬菜、桐油、毛竹以及重要中药材、重要木材等。国家对这类物资采取通过合同进行派购的政策。

单再生产也难于维持。国家今天急需粮食增产，而粮农今天却处在最不利的地位，这对各方面说来都是不利的。

三、工业品(包括手工业品)的价格，除一部分国家计划供应的必要品种以外，也多少正在跟着自由市场物价的提高而提高，其中有的是公开的提价，有的是变相的提价。国家为了平抑物价，或维持原定物价，使不少轻工企业和手工业企业亏本。它们难于维持生产，或使国家财政受到损失。不少国营工业企业，甚至供销合作社，为了勉强维持国家原定价格，也做着赔本的买卖。在各种原料、材料和生活资料涨价更多的条件下，国家要维持许多产品的原定价格已日益困难。各地方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和职工生活，自动提价的比较多。同时，国家用高价出卖的产品品种也正在增加。这对回笼货币，起了一定的良好作用，但对提高物价也是一种刺激。以上这种趋势，已经引起城市职工生活水平的某种程度的下降，从而也引起了他们的某些不满。

四、为了谋利谋生，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城市中失业的和一部分下放职工及其家属和学生等，现在参加集市贸易、甚至干脆成为小商小贩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一方面解决了许多人的生活问题，对活跃集市贸易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投机倒把违法乱纪的行为也大为增加，对社会秩序也有不好影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所发展。合作商店、夫妻商店和专业的小商小贩重新活跃起来了。资本主义成分有从中生长起来的趋势。

五、集市贸易的发展，自由市场的影响的扩大，使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也逐渐参加进集市贸易中来了。它们的活动开始在集市贸易中发生了一定的领导和调节的作用。集市上出现了两种倾向，即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倾向，它们之间的矛盾开始发展起来了。集市贸易市场有扩大成为地区性市场并成为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的趋势，它要求突破妨碍物资交流和商品周转的一个地区内或各个地区之间的各种人为的限制和障碍。

二

我认为,这种趋势是当前经济生活中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因而认为,像中央现在所采取的利用这种趋势中的积极因素,给这种趋势以调节和领导(所谓“因势利导”),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克服当前财经情况的困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我现在还想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和当前市场、物价方面的上述趋势,提出一点意见。

一、坚持中央发展集市贸易,使之成为经常的和固定的集镇贸易的方针。那里,不但可以容许直接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的买卖活动,不但应该有国营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贸易活动,而且也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这些活动,除了本集镇以外,还可以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超出本地区范围,而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的关系。国家应多想方法使一个地区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资交流的各种渠道畅通无阻。这样,使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调剂本地区的有无,而且也有利于调剂各地区之间的有无,有利于挖掘全国许多没有动用的物质资源和潜力,有利于发展农工业生产和满足群众生活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显然,在国家物资供应困难的条件下,经过物资交流的发展,是可以解决许多实际困难问题的。

二、我认为,国家应明确宣布:完成一类物资的征购任务和二类物资的派购任务,是农民对国家的义务。这是一种义务交售制,是农民对国家的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国家把现在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固定下来,不再继续提价,也不再采取单项奖售和综合换购等许多复杂麻烦的办法。同时,国家把这种义务交售的数量和品种加以可能的压缩。一类物资的交售数量,应该根据城镇人口的减

少及农村返销的减少而相应减少(这方面似乎还大有文章可做)。二类物资的派购的数量和品种,更可缩小,办法也还可改进。此外,国家还可以有计划地从征购派购任务中减去国家估计可以从市场上购进的农副产品的数量和品种。这样,农民的负担可以有部分的减轻,农民手中就可以有更多的农副产品了。国家再明确宣布,农民在完成其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这样,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就可以划分得更加清楚。农民是很拥护这种办法的。这种办法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生产和增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更能动员农民手里的剩余农副产品到市场上来出卖,有利于商品周转和调剂有无。对农民手里的这一部分剩余农副产品,国家可以从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购进必要的数量和品种,以补足国家的需要。事情办得好,国家不但从收购中可以补足在征购派购中所减少的数量和品种,而且还可以超过。这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当然,事情办得不好,也可能完不成收购计划,风险也是有的。

三、为了基本稳定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国家对城市居民已经实行了必要商品的定量供应及对一定品种的商品实行购货券的办法。国家在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上所做的努力,城市职工一般是满意的。实际上这是一种配给制。凡配给的东西,国家都按现在低价的配给价格出售。除此以外,我认为:国家的所有商品,不论是那一种工业品(包括食品工业产品),都可以一律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特别缺乏的工业品和食品,像现在中央已经采取的高价办法那样,可以用特高价格出售。同时,国家就利用这样售得的货币,在集镇市场上依市场价格来购买农民自由出售的剩余农副产品。国家就是这样,将工业产品和农民手里所剩余的农副产品进行交换。这是从农民那里取得其多余的农副产品的有效方法,是最易为农民所接受和欢迎的方法,也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正确方法。

如果采取以上办法,城市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虽然仍然可以

保证,但可能还会有某种程度的下降。为此,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考虑从商品提价所得来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补贴城市职工的工资。这种办法对职工有好处,对国家也不会有额外的损失。

四、像中央所指示的,集镇上合作商店、夫妻店以及个体的小商小贩的活动,在今天发展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中,还有其积极的一面,应该加以利用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必须加以管理。凡是从事专门商业活动的小商小贩,应该进行登记,使之合法化,以便于必要的管理和监督,从而减少他们从事违法乱纪的破坏活动的可能。但“投机倒把”的观念,应该限制在违法乱纪的范围内,不要扩大化。关于何谓“违法乱纪”,国家也应该公布若干条,使大家有所遵循。商人是没有不搞一点投机倒把的。禁止一切投机倒把,就等于取缔小商小贩。这在目前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妥当的。同小商小贩和一部分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应该在集市上积极活动,发展业务,在“谁把生意做得更好”这一标志下同私商进行竞赛。我们要靠做生意的本领,即“文明经商”的本领,而不靠简单的行政措施去赢得竞赛的胜利。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不够的正是这种文明经商的本领。我们在这方面还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学会了文明经商的本领,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是并不可怕的,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产生也是不可怕的。我们拥有一切条件去战胜它,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它。而只靠单纯的行政措施,就达不到这样的目的。

附带提一下:我认为,对登记了的专业商人征税是必要的。对为数众多的农民、职工、学生、贫民等从事无定型的和流动性的零星贩卖活动的,国家应该给他们以教育和管理,使他们遵守国家法律和秩序。凡是能够参加生产的,尽可能动员他们参加生产,但以不收税,不对他们采取粗暴的敌对态度为有利,否则只会造成税务人员和公安人员同他们之间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而有利于少数坏分子的从中挑拨和破坏。

五、我认为，只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起来，再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集市就不可能再是“自由市场”，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也不可能再是“自由价格”了。它们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当然，这种过渡的快慢，还要看我们的经济力量和经营业务的本领。这里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是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和调节，集市上工农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比较“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必然会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这里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如果工业品价格提得太高，农副产品价格压得太低，农民就不愿在集市上公开出售其产品，那样又会产生新的黑市和新的黑市价格，国家从农民手里就会买不到所需要的农副产品。这对国家显然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把农副产品的价格提得过高，工业品的价格压得太低，国家就买不足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当然，这对国家也是不利的。所以，今后如何规定集镇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价，使之有利于国家、集体和个人，有利于工农联盟，这是一种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但是实践的经验终会告诉我们，这种比例的分寸应该是什么。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在集市贸易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一个地区的一种比价，如果发现不利于商品周转，不利于买卖双方，就要及时调整，变不利为有利，不要迟迟不决，坐失时机。由于我国地区辽阔，各地条件悬殊，国家在制定全国各地的物价指标时，应该富有伸缩性。同一种商品，不但有地区差价、城乡差价、季节差价、质量差价、批零差价和供销差价，而且这些差价本身，各地也还有差别，难于一致。所以，国家在集市贸易上应该给各地方商业领导机关和商业领导人员以较大的机动权，使他们能够根据当时当地集镇市场上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一种商品的价格，只要能销出买进，只要有利于产、供、销三方面，就大体上可以认为适当的。这里，应该自觉地运用价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买卖愈做愈活，愈做愈大。

六、国家在货币政策上,除了中央已经采取的回笼货币的许多办法必须坚持以外,我认为凡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发展贸易的资金,应该投放的就应该及时投放,不然,就会使生产和贸易停滞,这对克服当前困难反而不利。应该发挥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一般等价物和流通工具的作用,充分利用它为发展生产和贸易服务。(注:对重点产粮区许多生产队生产资金不足的情况,特别希望加以重视。)

三

如果采取以上提出的一些办法,则今后我国市场和物价的发展趋势,大体可以预测如下:随着国家财经情况的好转,工农业产品的增多,通货膨胀的消除,市场物价会逐渐下降。那时,国家就会主动采取逐渐降低物价的措施。同时,随着城市职工工资的逐渐调整和提高,配给制度也就成为不必要了。两种价格的局面,会逐渐消失,而为一种价格所代替了。

当然,采取以上一些办法的具体步骤,要尽量谨慎,做到稳步前进,减少突然性,不使在人民中间造成震动。采取以上一些办法,风险还是有的,但可能会更主动些。是否如此,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根据我的体会,中央现在所已经实行的办法同这里所提出的一些办法之间的差距,是不大的。

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我国经济学界已经有了很多有价值的探讨。我现在想提出一个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的问题,来同同志们商榷。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什么的问题,一般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对自然界的联系,而生产关系则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生产力是人们用什么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问题,而生产关系则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认为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

以上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的理解,有其正确的方面,因为它指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差别,也指出了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对象的差别。但是,我认为,也还有问题。主要的是,这里只强调了两者的差别性而没有指出它们的同一性,没有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那样的理解,必然会导致忽视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从而不

* 张闻天写这篇读书笔记的本意在于澄清 1958 年以来的思想混乱,也为后来人们打破“左”的传统观点,在保持公有制的原则下,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供了哲学的根据。这是他在长期调查和攻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写的一篇具有很高水平的科学论著。

能深入了解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律,也不能完全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生产力固然是人们对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人们是结合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内的,所以人们对自然的关系,一定要通过人们的生产关系,才能表现出来。一切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一切生产力都是社会生产力。脱离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没有的。马克思说过:“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才会有生产。”^① 马克思的话,在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生产力只有通过生产关系才能表现出来的客观真理。这一真理,从生产关系方面说来,同样是正确的,即不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是不存在的,没有的。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人们只要进行生产,它就表现出人们改造自然使之适合于自己需要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生产力。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是表现一定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而不可能是表现别的东西的生产关系。

由此可见,有生产力就有生产关系,有生产关系就有生产力,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关系,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割裂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外部,而存在于生产关系的内部。两者的矛盾,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内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如果把两者形而上学地加以割裂,既不可能正确了解两者的同一性,也不可能正确了解它们的差别性,因为差别是在同一中表现出来的,是同一中的差别,而不是绝对的差别。

所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不是脱离生产力而单纯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在研究生产关系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2页。

内在矛盾,即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我认为,马克思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时,就是指这样理解的生产关系,而不是脱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明显的,毋庸置疑的,但是后来由于有人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并且认为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生产力,也有人则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力而不研究生产关系,于是关于这个问题就引起了许多争论。

如何解决争论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在于正确认识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对立的统一的关系。

二

既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中表现出来,所以生产关系有它的两重性,它包含有两个对立的方面。生产关系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表现。这两个方面就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和所有关系方面。

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们“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互相交换其活动的关系”的一个方面。这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讲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①的一个方面。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都有一定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的关系。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愈发展,则它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的关系愈是复杂化。这种分工协作的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有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了空前的发展。在一个企业内有一个企业的分工和协作,在全社会内有全社会的分工和协作。整个社会的生产,是以无数小的生产单位组成的一个全社会的生产体系,好像人的身体是由无数细胞组成的有机体一样。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产的机体。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根据生产和再生产的总过程,把它们分解为四个方面,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任何社会的生产,都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关系,虽然它们的社会化程度是极不一样的。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所说的“生产一般”。马克思当时研究的虽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并且他批判了只看到生产一般而看不到生产特殊和把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等同起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但是他并不否认“生产一般”是存在的。他在那里说:“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①他在那里,对生产一般的四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做了精辟地辩证地分析,并且指出了在四个方面中,生产是决定的方面,因为没有生产,根本就谈不上分配、交换和消费。但是他也指出,没有分配、交换和消费,也不可能进行生产。马克思的这种科学的分析,把一切社会中表现生产力的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弄得如此简单明了和合乎客观实际,以致人们认为生产关系的包含这四个方面,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是后世学者分析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一个指南针。

关于人们在生产中的这种分工协作关系,在我们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认为,它们应该属于生产力方面,有的人则认为它们应该属于生产关系方面。但是关于它们的存在,是没有人能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7—88页。

怀疑的。我认为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是一种生产关系,但这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或者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物质生产方面)。一个社会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直接反映出该社会生产社会化的程度,直接反映出该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它是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这种生产关系,就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是它的永久性(或“继承性”,或“连续性”)。人们为了生存,就要生产;人们为了生产,就必须结成这样的生产关系。因此,这类生产关系,同人类的生存一样的永久。第二,是它的易变性(或“灵活性”,或“进步性”)。它总是促进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总是跟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而改变着它的关系。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也必然会引起人们在分工和协作方面的重大的变革。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有时就把这种生产关系叫做生产力,或劳动生产力,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什么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有时也叫它做生产关系,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不表现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有时,他也叫它做生产方式。后人,为了指明这种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同于所有关系,曾经称这种生产关系为“直接生产关系”。我想,为了把它同特殊的所有关系加以区别,为了说明问题的便利,借用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的思想,暂时就叫它做生产关系一般(或一般的生产关系)吧。

三

以上我们谈了生产关系一般。但是事实上,生产关系一般还只是一个抽象,它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的。生产关系一般只有在生产关系特殊中才能存在。像一般的人是没有的,人总是具体的人一样。任何社会的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只有在生产关系特殊中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一般,才是生产关系的客观实体。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任何生产关系一般,都必须在所有关系的形式中表现出

来。生产关系一般是内容,而所有关系是形式。

既然生产关系一般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个方面,所以这四个方面也就在所有关系中表现出来。所有关系,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是表现出有复杂内容的形式。没有内容的所有关系,也是一种抽象,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只有以一般生产关系为内容的特殊的生产关系,才能是客观的实体。马克思平常所说的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就是包括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个方面的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关系。马克思把这种所有关系叫做“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这就是说,所有关系是包括所有这些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总的形式。如果所有关系指的仅仅是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那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就非常简单了。问题的复杂性,就是要在生产关系的一切方面,研究所有关系,或者说从所有关系方面研究生产关系的一切方面,这就是说要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中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没有单独一章讲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在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研究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即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一般和资本主义所有关系之间的矛盾。

关于所有关系的特点,是众所周知的。首先,是它的暂时性(历史性)。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一种所有关系被消灭而为另一种所有关系所代替。其次,是它的相对稳定性(保守性)。一种所有关系确立以后,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可能轻易加以改变。要改变这种所有关系,必须经过政治革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命的变革。所有关系的这两个特点,正好同生产关系一般的两个特点相对立。所有关系的暂时性和相对稳定性,正好和生产关系一般的永久性和易变性相对立。既然生产关系一般在生产关系特殊中表现出来,所以前者的永久性也在后者的暂时性中表现出来;前者的易变性,也在后者的相对稳定性中表现出来。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这种矛盾,表现出了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它们的关系,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有关系对生产关系一般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但是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种所有关系又阻碍这种发展。

生产关系的这种内在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具体表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具体表现在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同生产关系的另一个方面的矛盾,也只能在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中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时,指出了生产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生产如何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相矛盾,个别企业内生产的有组织性如何同整个社会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矛盾,这些矛盾又如何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生产关系的这种内在矛盾中,指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生产关系内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关于生产关系的这种两重性及其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论证和说明。

四

我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律,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主题。

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开始就分析了一般商品生产的商品的两

重性。商品是一种生产关系,其内部矛盾,即生产关系两重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一方面,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是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这是生产关系的所有关系方面。从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劳动的两重性。劳动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其内在矛盾也是生产关系两重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即具体劳动,这是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另一方面,是生产交换价值,即生产价值的劳动,即抽象劳动,这是表现生产关系的所有关系方面。从此,马克思进而分析了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的两重性,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过程。接着,马克思就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指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劳动过程的两重性,即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和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他接着又论证了这些矛盾,如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包括机器的普遍使用)而不断激化。这种矛盾,表现在劳动分工和协作的日益发展,劳动(包括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的物化劳动)愈益社会化,而所有关系却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原先曾经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从简单的协作到工场手工业,然后又从工场手工业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工厂;以后,这种所有关系又如何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以至最后旧的所有关系又如何必然要为新的所有关系所代替。显然,这里被消灭的是生产关系的特殊,即所有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一般;那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般不但不能消灭,而且还要继续保存和发展下去,不过要在另一种所有关系,即社会主义的所有关系的特殊形式中表现出来而已。这是社会生产的继承性、连续性的表现,这就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历史。

总之,我们从《资本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所有经济范畴和规律中,都包含有这样的内在矛盾。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所以反映客观现实的经济范畴和规律也必然是对立统一的。比如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任何社会生产

的必要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这种结合采取了资本主义形式。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有,而工人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任何社会生产的必要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则采取工资和剩余价值的形式(更具体地说,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利润内又分为企业利润和利息)。生产和再生产,生产中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任何社会生产的必要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则采取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和劳资双方尖锐对立等的形式。此外,关于生产两大部类的按比例规律,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规律等等,都带有两重性。还有产品的交换,即不同种类劳动的互相置换,也是任何社会生产所必要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采取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形式。如此等等。为了简略,我们不拟引用原文,也不拟再多举例了。这类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对立统一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生产各个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

必须指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具体出发的,不是从任何生产一般或生产关系一般出发的。马克思说:“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① 马克思从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入手,他从具体中看到一般同特殊的矛盾,并且论证了这种特殊形态的暂时性。因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中揭示出生产一般,所以他不但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也指出了社会化生产中复杂的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及一些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本人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时,也常常附带提到这样的一般规律。如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1页。

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①又如“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②“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末,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③又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④如此等等。这都可以看出,马克思如何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发现了一些一切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具有的一般规律。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⑤我想,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所提到的有关这类一般规律的指示加以研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会有帮助的。至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许多经济概念和范畴,在改变其资本主义性质之后,也仍然可以运用,而且实际上也已经是运用了。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人企图用全新的概念和范畴去代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一切概念和范畴,这种尝试,看来没有十分必要而且也难以成功,因为这些概念和范畴除了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以外,还表现社会生产的一般性。只要预先说明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下同),第925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90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63页。

⑤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6—187页。

这些概念和范畴的性质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使用它们,是利多害少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社会解剖,是了解资本主义前各种社会形态的钥匙^①。那末我们可以说,这种解剖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了解,更是重要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给了我们如何解剖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典范。它告诉我们,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一个比较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如何从该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规律,如何从特殊中看到一般,从形式中看到内容,特殊如何表现出一般,形式如何表现出内容,以及一般和特殊,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此等等。所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但为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或是为了研究唯物辩证法所必需,而且也是为了研究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所必需,因为在生产的社会化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最为接近的缘故。

五

如前所述,政治经济学是要在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生产关系内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在阶级社会内就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这里,为便于说明,暂时不谈在无阶级社会内,这种关系表现为社会生产中先进部分人群和落后部分人群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在阶级社会内,直接生产的被剥削阶级,在生产关系内,总是代表生产力方面;而剥削阶级,在生产关系内总是代表所有关系方面。因为生产力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而生产关系总是迟早

^①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8页。

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所以被剥削阶级最后总是要求(不管是意识到与否)改变所有关系,使生产力得到顺利发展;而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其所有关系,最后总是要阻碍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为什么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总是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为什么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基本原因就在这里。马克思就是根据于生产关系的这种内在矛盾的分析,得出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的结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以是科学的,它不同于其它任何空想的社会主义,其根据就在这里。所以,研究生产关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在矛盾,最后说来,就是研究阶级的矛盾。不研究这种矛盾,就不可能正确理解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也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们如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机械的分开来,并且如果认为政治经济学只研究所有关系而不研究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那在思想认识上,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类的观点:(1)把生产力等同于生产技术;(2)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看作是人和生产技术的矛盾,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不是阶级的矛盾;(3)把生产力最后决定生产关系,看做是生产技术最后决定生产关系;(4)把生产关系的丰富内容简单化和片面化。显然,在国内外经济学界,抱有这类观点的人,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是有的。

我认为,关于生产技术在生产和生产关系中的作用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因为它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有直接的影响。

每一个马列主义者,决不能有任何轻视生产技术的思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同生产技术的发展史密切结合着的。没有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任何重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像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也是“劳动借以

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 在生产力中,生产技术对人们如何分工协作以进行生产,还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生产技术的这种重要性,必须给以充分估计,但是生产技术本身,还不等于生产力。生产技术只有同人的劳动结合起来,为人们所掌握、所推动,它才能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的物的因素,才能发挥它在生产中的作用。所以,生产技术的作用,也只有在人的生产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脱离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技术,不过是一堆无用的死东西。马克思有时也说生产工具或机器,是“一种生产力”,实际上他只是说,它们是生产力的一个物质因素。马克思所理解的名实相符的生产力,是指运用生产技术的劳动的生产力。所以他常常把生产力叫做劳动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事实上,任何生产力,一定要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才是名符其实的生产力。它是指在一定劳动时间内,生产使用价值的大小或物质财富的多少的能力。在一定劳动时间内,生产的物质财富多,则生产力高;反之,则生产力低。或是在每一件产品内,每件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少,则生产力高;反之,则低。这种劳动生产力,自然只能在生产关系中表现出来。同时,生产技术的进步,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生产的实践。人们根据长期生产实践的经验,改进或创造新的生产技术;随着生产技术的改造,人们改变着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之适合于新的生产技术;人们在新的生产方式中的实践,又改进或创造更新的生产技术。在这个人们的劳动和生产技术的互相影响的不断发展的辩证过程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的生产实践,是生产者,是劳动人民,正像现代核武器技术,虽然在现代战争中有不可轻视的重要作用,但最后决定战争结局的还是人民群众一样。生产技术发展的历史,是生产者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历史,是生产者自己的历史。所以,生产技术的发展过程,完全要受到它所在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制约,是很自然的了。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04页。

所以,把生产技术等同于生产力,和把生产力中人与生产技术的辩证关系,认为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人的观点,显然不合乎实际情况,也不合乎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生产技术不论如何重要,它只能作为生产力的一个物的要素而存在,它在生产关系中也只能作为表现生产力的物的因素而表现出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终究是人与人的矛盾,虽然这种矛盾总是和物结合着。

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曾经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①。”

事情也正是这样。人们利用生产资料(物)进行生产,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物);这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们对生产资料(物)和产品(物)的这样或那样的所有制,这又是人与物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说来,有一种人与物的关系;在所有关系方面说来,又有一种人与物的关系。有人认为,只有生产力才有人与物的关系,生产关系只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里,人是同一个人,物是同一种物,不过是在不同的关系中出现而已。人与物之间的这种不同关系的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就在生产关系的两重性中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了的,离开了物而研究人与人的关系,那可以是别的关系,而不是物质生产的关系。但只看见物的关系,而不看见在物的关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那就是一种拜物教,在商品资本主义社会内就是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揭露这种拜物教的社会内容,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目的。

总之,不是人与物的矛盾,而是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阶级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没有这种内在的矛盾关系,就不可能有社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3页。

会的运动和发展。同时,在这两方面的矛盾中,生产力方面,不是片面起决定作用,而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为什么说生产力不起片面决定作用呢?这是因为在生产力 and 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也决定生产力。为什么说,生产力最后起决定作用呢?这是因为生产力是永远向前发展着的,而所有关系只是它的历史的、暂时的表现形式,所以在两者的矛盾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在阶级社会中,这表现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剥削阶级决定着被剥削阶级的命运,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被剥削阶级的劳动人民。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上,不论剥削阶级起过如何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劳动人民打倒和消灭了。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的国家,劳动人民已经在没有剥削者的条件下开始建设着自己的新生活。所以,最后决定人类命运的是劳动人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永生的,是任何核武器也消灭不了的,相反的,核武器必然要为劳动人民所消灭。马克思说的,“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① 我体会马克思这句话所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认为生产技术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发展的观点固然不对,就是认为生产力片面决定生产关系,片面决定社会的发展的观点,也是不完全的。只有正确认识它们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如何在生产关系内部表现出来;正确认识在阶级社会内又如何如何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来;和正确认识不是片面起决定作用的而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和代表生产力的劳动者阶级;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试想:如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如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是内在于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0页。

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如果认为生产技术或生产力片面决定生产关系;那么,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就没有了,或者即使有什么矛盾,也是不重要的了;那还谈得上什么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呢?

六

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以后,认为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生产力的人,常常认为生产关系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即(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三)由一、二两项决定的产品分配形式。为什么关于生产关系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由于它排除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方面,而只研究所有关系,它就使所有关系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同时也就使生产关系失去了内在矛盾的动力。这样,生产关系就被人人为地简单化和片面化了。

(2)它把所有关系看做是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因素,而不承认所有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包摄所有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所有关系。这样,它就缩小了所有关系,即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

(3)它把阶级关系(或社会集团的关系)看做是生产关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而不知所有关系即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即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样,它也就缩小了阶级关系的意义。

(4)它把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分配关系同所有关系和阶级关系并列起来。殊不知所有关系、阶级关系,不但在生产资料的所有中而且也在产品的分配中表现出来,不但在产品的分配中,而且也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生产关系如果没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个方面,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不可能存

在的。

(5)它把阶级关系和人们在生产中“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混淆在一起,并且把生产中人们“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同产品的交换、即全社会内劳动置换关系混淆在一起了。

上述观点的主要缺点就在于不了解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对立统一关系。关于这种观点必然会在理论上发生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加以指明了,显然,这种观点,同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

现在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了这个关于生产关系的公式同马克思的公式之间的不一致,但他们还没有看出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却反而认为“三个方面”(即前面指的三个组成部分)和“四个领域”(即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个方面)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的则说是“互相补充的”。这表明他们还没有能批判地对待“三个方面”的公式,同时也表明他们对“四个领域”的公式的理解,多少也还有问题。

七

如前所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也就非常明白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规律,即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关系的对立统一的规律。

关于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技术问题,它不是工艺学的说法,自然是正确的。但是这里也要有点说明。同一架机器,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可以是工艺学的对象,也可以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如果只研究机器本身的构造和性能及其制造、改进和使用的方法,那机器是工艺学的对象。机器本身,并不是经济范畴。但当机器和劳动结合,机器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的因素时,即当机器成为物化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成为资本,成为不变资本、固定资本,成为生产成

本的一部分时,机器就成为经济范畴,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了。这从一个工厂内工程师和经济师的不同任务中,就可以分清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研究对象是什么了。把生产力等同于生产技术的人,自然以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研究生产力。但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生产力并不等于生产技术。生产力是经济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这是一。第二,生产技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的因素,是经济范畴,是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当然不是从工艺方面,而是从经济方面。

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研究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我认为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社会主义生产的全民性和两种所有制的矛盾关系,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关系,不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吗?我觉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脱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脱离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会使它简单化和片面化,就会使它失去内在运动的源泉,使它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但这是另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谈了。

应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的作用*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评论之一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劳动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商品的二重性的分析,都放在基本经济规律、按比例规律,甚至还在按劳分配规律之后。其实,只有分析清楚了社会主义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的特点之后,才能分析其他的经济范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从生产开始,而不是从一般规律开始。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有了价值才谈得上价格、成本、工资、经济核算、盈利等等。

这些教科书对价值规律的估计,一般是不足的。总是怕它的自发作用,总是要“限制它”,“排除它”,“不能起调节作用”,放它在“次要地位”,“不能过分地重视”等等,而不知道在社会主义下的价值规律,是要认识它的作用,要用它来调节生产。任何好的规律,如果不加以自觉的利用,让它自发,都会出乱子。为何对价值规律就特别歧视。不重视价值规律,就是不重视生产,不重视劳动。应该区别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和自觉的利用。

教科书对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矛盾实际上没有分析。强调了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二者非对抗性矛盾,就万事大吉。而不谈二重性同所有制的关系,不谈工农之间、个人、集体和全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一概不谈。可以说是无矛盾论的典型!价

* 本文选自张闻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8)”,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值在社会主义下还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还要经过价格(虽然是计划价格,但仍然是价格)、经过货币来表现。抽象劳动并不只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在共产主义社会,它还会有。但抽象劳动必须经过的价值(采取价值形态)、价格,则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范畴。

我觉得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未解放。

要用正确路线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许多矛盾(如工农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趋向只是作为可能性存在着。矛盾本身,并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矛盾),但如果方法不正确,就有发生资本主义倾向的可能性。如个人私有制是小生产者的残余,但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部分,并不等于小生产阶级。我们要反对的,不是这种残余,而是反对把这种残余片面加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如按劳分配,并非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但如果过分扩大分配上的差别,就会发展资本主义的腐蚀作用。

社会主义的矛盾需要不断解决,但最后解决要到社会主义建成之后。这种矛盾,对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必然的。

由于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所以社会主义内部矛盾解决不适当时,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但用正确的路线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则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就不会成为现实性。

思想错误,有的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的则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虽然二者有联系,但还是不能混为一谈。(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内,不反映阶级矛盾的思想矛盾,还是存在的。像毛主席所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那时还会有。进步和落后之间的斗争,也会有。)要正确解决,就既要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

* 本文选自张闻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8)”,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观点,也要反对错误的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二者有共同性,但不是同一的。所以既有斗争的、教育的任务,也有学习和实践的任务。辨别香花和毒草,需要有一定的思想认识水平。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已经不是原来的阶级。阶级开始消灭,但仍然有阶级差别。因此阶级还不能完全消灭。

同附着在工农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因为这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影响,但又不是阶级斗争,因为对象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

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

(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七日)

一

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两种不同世界观产生的,可能是由于同一世界观产生的,可能是由于基本上属同一世界观、但也有差别而产生的。即使两个马列主义者,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一样,而常常是不一样,从而发生争论。这种争论当然不能说是阶级斗争。

二

工、农、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阶级斗争。把它一律叫做阶级斗争,是扩大化。

*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接着1963年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过火斗争。张闻天的这几则笔记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写的,节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9)”。标题和段落序号是本书编者加的。第一则写于1964年2月3日,第二、三则写于2月7日。

三

消灭资本主义的残余(不论是思想的、政治的)同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分不开的。

社会主义的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

消灭与建设相比,建设是主要的,消灭为了建设。

“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

(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的规律。这种说法有缺点。因为“一”本来是对立统一的一,而不是无矛盾的一;“二”本来是统一的发展,而不是无矛盾的“一”的分裂为“二”。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是工人运动内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而不是先是无矛盾,然后才有矛盾。

人的“异化”,是社会分工的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矛盾的解决,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发展为分裂。矛盾发展到分裂,要有一定的条件。在另一种条件下,矛盾可以不发展到分裂。

* 这则笔记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9)”。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有阶级差别,就要有领导阶级,即一个阶级是领导的阶级。

工农之间有差别,工农联盟中的领导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要达到最后胜利必须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以它的先锋队为代表,即共产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可以有多党领导,社会主义只能由一党领导,即必须是马列主义的党的领导,必须是一个党的领导。

(二)党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是在一切方面(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文艺),并对一切组织(工会、国家、青年团、合作社等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党就开始对国家实行领导。

国家是一定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单一的领导。党没有国家,或国家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修正主义者反对党对国家的领导,阶级的领导。他们所说的“全民国家”。“全民”与“国家”,实际自相矛盾。

* 本文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9)”,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具有普遍意义,当然人们在运用时要反对硬套。应当指出,体现于《资本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抽象,是从感性世界的复杂现象中的抽象,是认识感性世界逻辑的起点。它从最普遍的大量的“原素”开始。

这里所说的具体,是对感性世界的理性的认识,是人们在观念上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它近似于复制),是由许多原素合成的统一的整体。主观逻辑是客观逻辑的近似的反映。

苏联学者反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他们要从一般到具体、到个别。国内也有人在反对硬套《资本论》方法的借口下,反对马克思的方法论。

* 本文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9)”,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应重视对社会主义剩余劳动价值的研究*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评论之二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但对劳动和产品的分析非常简略、马虎和零碎,对剩余劳动的分析,也是如此。它只是在需要谈到剩余劳动时,才提一下,没有科学性、逻辑性。《资本论》关于剩余劳动的分析,对它似乎并不存在! 剩余劳动问题如不讲清楚,许多问题也是讲不清的。逻辑上应该是:

(一)劳动和产品是首要的;然后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

(二)然后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然后是工资和剩余劳动率(有的称为工资利润率,不妥!)、剩余劳动量。——讲清楚了这一节,然后才能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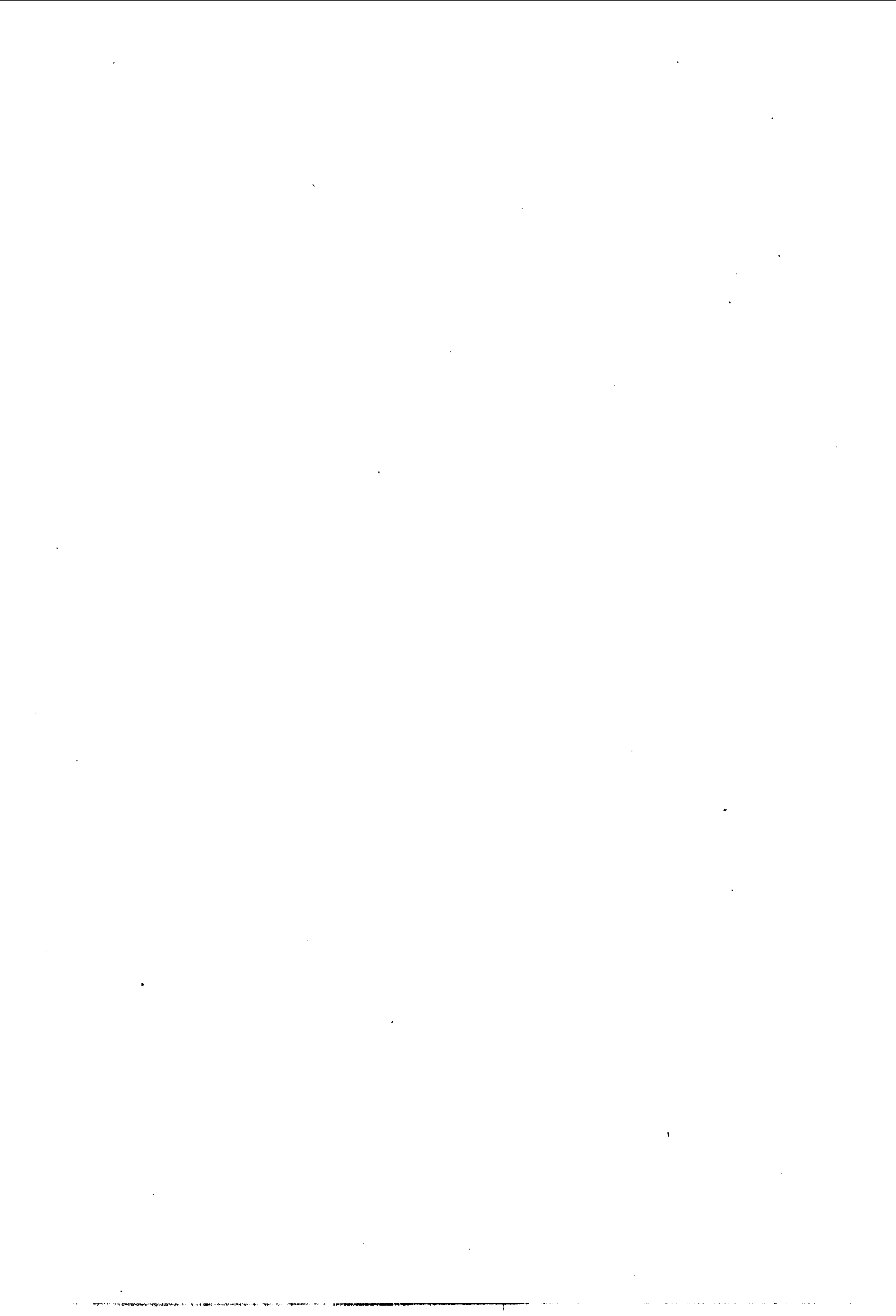
《资本论》在讲完了剩余价值之后,即从生产过程中来研究资本积累规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被否定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积累规律,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这个规

* 本文选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9)”,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律必然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解决,从而使社会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成为必然的运动。

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不研究剩余劳动价值,因而也不重视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规律。



第三辑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四年)



人民群众是主人*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

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依靠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的共产党,这是一条规律。但共产党只有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接受和实行共产党的正确的路线,才能实现其领导。这又是一条规律。

领导必须有所领导。脱离群众的领导,不成其为领导,等于人的头脑脱离人的身体和四肢一样。没有人民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单有共产党,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人民群众的解放,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过程。共产党不能靠命令、靠恩赐来做到这一点,而只有靠正确的领导和教育。共产党必须在革命的每一阶段规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此来教育群众,使他们懂得为何斗争和如何斗争。这种教育不但要在口头上或书面上进行,尤其要在实际斗争中进行。这里,要使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并根据群众的切身经验,逐步提高他们的自觉性,达到为无产阶级

* 这是《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的节录。标题是编者另拟的。张闻天1969年10月被送往广东肇庆看管,在此后的6年中,写了许多文稿,本文及以下诸篇均是选中选出的。

取得政权而斗争的水平,直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水平。

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和教育过程,但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政策,在任何革命阶段内,只要是正确的,都符合于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都有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代表群众利益的,所以它以此来教育群众,到群众中去时,最后能为群众所接受和实现。这表示出党和群众之间的一致性。

但这种一致性,总是在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展现的。这种矛盾表现在党开始不了解或不甚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提出的方针政策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群众的利益,因而群众不赞成或反对;或是群众还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是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因而也不赞成或反对。这种矛盾,只有经过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加强对群众的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及帮助群众根据切身经验提高认识,才能逐步解决。这种矛盾是始终存在的。这种矛盾的不断解决,是党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自己革命的自觉性的过程,也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自觉性的过程,这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性的发展的过程。这也表示出,党不能没有群众,群众不能没有党。群众是基础,党是领导。

二

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

人民群众之所以需要共产党,就因为它能为人民群众服务,它是人民群众手中进行解放斗争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人民群众的斗争的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当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彻底解放了,共产主义实现了,党同国家机关一样,也就不再需要而自行消亡了。只有我们时刻记住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我们才能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我们一切

工作的重心自始至终放在人民群众身上。

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必须来自人民群众,并由人民群众来检验。赞成与否,拥护与否,执行与否,只能由人民群众自己下决心。党不能对人民群众实行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办法,而只能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把真理告诉群众;但群众是否照此行动,只能由群众自己决定。如果群众不拥护和执行我们的方针政策,即使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没有,也不能把事情办好。世界决不只是因为我们有了很好的方针政策而有丝毫的改观。世界是客观的存在,是物质的东西。这种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的力量,即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加以改造。单有思想,即使是最好的思想,它对物质世界也不起一点作用。只有这种思想掌握了群众,为群众所拥护和执行,思想的精神力量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而要使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所拥护和执行,根本的条件是这种方针政策必须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否则群众是不会拥护和执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是有效的,也可以是无效的,其最终的界限就在这里。不反映群众真正利益和要求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再多,也不能动员群众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我们的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就在于使人民群众懂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他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他们的解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共产主义的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这一伟大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从而使他们对共产主义具有充分的信心和高度的革命热情,并决心为它牺牲奋斗。

三

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固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是国家机关的唯一的和最高领导者，党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机关的首长，他们做决议，下命令，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们处在领导者和首长的一种特殊地位，工作特殊，生活也特殊。这种特殊的情况，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常常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官吏，他们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所欲为，发号施令。这样就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像旧社会历史上总是颠倒过的一样：他们是主人，而群众则是为他们服务的。由于某些领导者工作和生活的特殊性，加上旧社会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的旧思想、旧作风的影响，有些人在思想上、作风上和生活上逐渐脱离群众，最后蜕化变质为同人民群众对立的官老爷。

同时，在人民群众方面，由于过去长期以来受尽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的欺压，有些人也容易以旧思想、旧习惯来对待现在的党政领导者，把他们看做官老爷，认为他们有权有势，往往对他们唯命是从，把一切革命胜利的果实，都说成是他们的恩赐，说他们是群众的救命恩人、救世主，对他们歌功颂德，唯恐得罪他们而遭受惩处或迫害。人们还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主人。革命胜利和幸福生活的获得固然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对共产党人表示信赖和尊敬是正确的，也是自然的，但使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人民群众方面的旧思想、旧习惯，也是促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脱离群众的另一个原因。

这样，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

四

为了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脱离群众,首要的问题,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深入,发动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参加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使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

为此,就需要党真正领会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领导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即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这个领导方法中,必须自始至终贯彻着人民群众是主人,而党不过是勤务员的根本观点。党不但要在“从群众中来”时,虚心向群众学习,而且在“到群众中去”时,也需要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鉴定和批判。这是自始至终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当然这也是党不断提高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过程。在“从群众中来”时,党必须使群众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同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然后“到群众中去”,在宣传、教育中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并见之于行动。这是党为群众服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既当群众的学生,也当群众的教师。但这里只有能真正当群众的学生的人,才能当群众的教师,而教师的作用不过是人民勤务员的作用,决不能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这是关于党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能不能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马列主义党还是机会主义党的根本区别。

五

但是,仅仅懂得群众路线的原则,还是不够的,这个原则必须在组织上巩固起来。组织上巩固这个原则的,是党和国家机关的民主集中制。

“从群众中来”,只有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即充分发动群众参

加党和国家机关的任务的讨论，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各种意见，才有可能做到。没有民主，“从群众中来”就会变成空谈。但我们所讲的民主，是为了经过民主的讨论之后，把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党的意见，化为党的方针政策，然后把方针政策再“到群众中去”。这时又需要充分发动群众来鉴定和批判这些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补充不足的，修改错误的，取得群众的支持，使政策成为群众自觉自愿的统一行动。然后又总结经验等等。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是在正确指导下的继续发扬民主。这种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组织保证。能不能实行这样的民主集中制，也是马列主义的党和机会主义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也是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之一。

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是形式，但这是正确表现群众路线的内容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但内容一定要在一定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形式保证内容。表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章党法，和表现国家的民主集中制的法制法纪，所以必须严格执行的原因，就在这里。

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为例。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无产阶级国家的表现形式。一切国家机关的重要决定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就是尊重群众的表现。把代表大会当作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组织形式，就是不尊重群众的表现。关于党的代表大会，也应该这么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应该定期在党的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形势和工作报告，接受群众的批评，听取意见，经过讨论然后通过决议等等。所有这些，决不能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它们是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领导人的任命和撤换，经过一定的会议讨论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经过这些组织形式，使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工作情况。不但使他们知道有利的方面，也使他们知道不利的方面，和如何发展有利的方面，克服不利的方面。不但使他们知道工作中的优点，也使他

们知道工作中的缺点,和如何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使他们把自己的那部分工作同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工作情况结合起来,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对党对国家做出自己应该做出的贡献。这是教育群众和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这种民主形式的发展,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大事,决不能等闲视之。这种民主形式,也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经常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当然,在这方面必须反对没有群众路线内容的形式主义,但问题在于充实内容,而不是废除形式。

这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者的态度,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像毛泽东同志所经常教导的那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热情欢迎群众提出的意见,即使是不同意见。如果上层领导者没有这种态度,而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态度,即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如果表现出这种骄傲自满的态度,那是不能真正发扬民主的。这种把群众当作阿斗的人,他们的思想作风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害怕群众,害怕批评,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点。

因此,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经常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民主原则、民主作风的教育,同时要他们经常联系群众,面向基层,到群众中去蹲点,参加定期劳动,轮换工作和学习,生活水平向群众看齐,防止各种特殊化,使他们既当官又当民。这些措施,在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者不脱离群众上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真正信任群众,相信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从而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去完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任务。

当然,在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仍然不能放弃党的领导。相反,群众运动愈广泛愈深入,党愈要加强领导,把准

方向盘,使群众的行动向着一个方向。充分发扬党的国家的民主,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集中,使群众分散的力量成为集中的力量。没有集中统一,各行其是,就会使力量分散,互相抵消(如派系斗争),达不到革命的目的。党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的作用,就是在于使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向着一定目的行动起来。这样的力量,就能创造奇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凶恶的敌人。

六

无产阶级民主,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完全实现的,它是要在长时期内经过不断斗争,才能逐步实现的。除了资产阶级和反动分子的破坏捣乱使我们不可能实现充分的民主的客观原因外,还有主观原因,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本身对实行民主还缺少经验,还有思想上的障碍,同时人民群众也还不知道如何实行民主,对运用民主还有戒心。其中最重要的,还在于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实行民主还缺乏经验。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是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的唯一科学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是,这个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同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决定经济的折衷主义的或二元论的谬说,毫无共同之点。

无产阶级的政治,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地位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的根本观点,还是不能改变或动摇。

如果有人以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政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说政治最后不为经济所决定,而政治却可以最后决定经济,甚至认为政治可以超脱于经济或独立于经济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政治决定论,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

* 本文初稿 1973 年 9 月 20 日完成于广东肇庆,修改稿 1975 年 9 月 16 日完成于江苏无锡。最初刊载于 1979 年 8 月 25 日《人民日报》。

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它们的不同的经济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在对立的地位，因此，它们的经济利益也是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则反映和维护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由于它们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不同，所以就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论其表现形式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思想理论的，其根本内容，都是各阶级之间的不同利害关系的斗争。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是为了谋求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没有什么阶级斗争，是同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的。谁不能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下，看到或揭示出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并且自觉地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谁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唯物史观的简单、浅显、而又合乎实际的根本观点。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时候说过：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①

恩格斯说过：

“……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

^① 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①

列宁说过:

“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②

毛泽东同志说过: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③

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既包括眼前的和局部的利益,也包括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些利益,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化为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向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迈进。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分配上,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任何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所谓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一切好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态度。

^①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页)。

^② 见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6页)。

^③ 见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可是,现在有人却怕谈或有意回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似乎这样说了,就是离经叛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改良主义之类的大帽子!同志们,再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害的了。为什么要把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说成是修正主义呢?这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吗?不!这正是在给修正主义涂脂抹粉。一切修正主义者,口头上谈的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则是出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他们不是为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而是攫取劳动人民的物质成果,使少数人发财致富,大搞特殊化。

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还是为少数人的物质利益而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分水岭。我们反对修正主义那种牺牲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只为少数特权者谋取利益的行为,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拒绝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如果谁这样看待问题,甚至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就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

有人会说,人们不能光为物质利益而生活呀!人们要为崇高的理想而斗争呀!不错,任何人都要有理想,要为理想的实现而斗争。

但是,理想是各种各样的。任何阶级的理想,都不能脱离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存在,都不能不最终归结为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度,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使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共产主义不是要我们像现在这样生活得差,而是要生活得更好。理想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不可实现的虚无缥缈的幻想、神话或乌托邦,而是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有人还会说,人们应该吃苦耐劳、牺牲奋斗呀!不错,没有这种精神,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不能实现。今天吃苦耐劳、牺牲奋斗,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生活,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但是,吃苦耐劳、牺

牲奋斗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们并不是为吃苦而吃苦,为牺牲而牺牲,这也是很明显的道理。

必须指出,人们只能经过生产活动,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人们之间的一定的相互关系,见物不见人的观点是错误的。见人不见物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脱离了物质,人就不能生存,也就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

说经济决定政治,并不否定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否定前者,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否定后者,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无产阶级有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政治。这不等于说,在无产阶级开始形成之日起,它就有了真正代表自己经济利益的政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虽然经受了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苦难生活,但是,它并不了解,什么是造成它的苦难生活的根源,如何才能铲除它。那时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处于“自在的”阶段,并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无产阶级才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并为实现这个利益而进行自觉的斗争。

无产阶级要实现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就要在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只有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及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历史使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进而消灭一切阶级,建成共产主义,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和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必须懂得如何正确进行阶级斗争,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

可能。因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无产阶级才有了真正代表其经济利益的政治。无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不是偶然的、自发的、轻而易举的。它的必然性，深藏在经济最后决定政治和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之中。

代表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指南针。这样的政治，必然会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所接受，受到他们的拥护，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作用于经济。因此，经济虽然决定政治，但是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并为改造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为建立、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旦离开了这样的政治领导，就会迷失方向，也就会违反它自己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政治，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为经济服务的辩证法。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出发，从它的阶级关系出发，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就要求对那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作严格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正确认识各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来，无产阶级的政治，必须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这就是“从实际出发”的主要含义。

在正确认识社会阶级关系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制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路线和策略。这种路线和策略，丝毫不能脱离经济，而只能为经济服务。代表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政治，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的政治。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牺牲流血，进行长期的英勇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是为了在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不是如列宁所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①，不是为了最终实现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又是为了什么呢？可见，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

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尽管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但是归根到底，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不能违反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正像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能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一样。资本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不是违反这些规律，而是认识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办事。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才会得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促进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行程。这样的政治路线，就是正确的，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如果违反这些经济规律，它就不仅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而只能起促退或破坏的作用。这样的政治路线，就是不正确的，是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这样的政治路线，引起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并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否定，也是很自然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经济可以起促进或促退的作用，但是，就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的命运，也要最后由经济规律来判决。正确的和错误的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总是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反映着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正确的政治路线由于同经济相适应，最后必然要胜利。列宁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②，就是这个意思。

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和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正

^① 见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1页）。

^② 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

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依靠群众自己的行动才能实现。所以,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自始至终都只能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即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①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脱离了群众,不从群众出发,不为群众服务,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就一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

也许有人以为,共产党或党的领导人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因而可以高踞于群众之上,对群众任意发号施令。这种官僚主义、恩赐主义、家长制的想法和做法,实在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这种脱离群众的政治领导,决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种领导就会导致无产阶级失去政权。总之,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当然不可能正确地提出任务,指导运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取得胜利。反映和维护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他们的利益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党的领导。主人公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党及其领导机构,不过是他们的服务部,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不过是他们的公仆,再没有别的了。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党有了正确路线,只是事情的开始。正确的政治路线,只有为群众自愿地接受并成为他们的自觉的行动时,新社会的创造才会付诸实现。党的正确路线来自群众,但是路线的制定并不等于路线的实现。它再回到群众中,变为群众的行动,还要经历一个过程。这里不仅需要对群众进行政治教

^① 见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②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育,而且首先需要党向群众学习,需要群众的实践和切身经验。只有当群众看到党的路线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实可见的利益,也就是说,能够不断地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和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时候,群众才会为其实现而英勇奋斗。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最后证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最后决定问题的是人民。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常常通过党内不同的政治思想观点之间的矛盾,通过不同作风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正确的政治思想观点和作风,适合于群众的要求,最后必然会胜利。

总之,并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而只有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的经济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这又一次说明,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或使政治超越于经济甚至脱离经济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那些高谈政治,而怕谈经济的“政治家”,请仔细研究一下,什么才叫“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正内容吧!

三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的政治,为经济决定并为经济服务,其斗争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的一切斗争,直接服从于政治需要,在我国特别表现为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着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首先取得政权,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当时的任务,主要是破坏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政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了。

现在,无产阶级国家面前有三大任务:(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中的死硬分子的一切反革命活动,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二)教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可以教育好的人，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卫生体育水平，使他们成为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和身体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劳动者；(三)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丰富的产品，为进入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国家的国防、外交、公安、司法等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一个任务服务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二个任务服务的；各经济建设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贸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三个任务服务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这三个任务，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缺一不可的。这些部门，不论它们的任务如何千差万别，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统一的政治领导，都必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不容置疑，任何一个部门，如果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就会错了方向，走上邪路。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把国家的所有部门以及各种群众团体的活动，从不同方向，直接间接地集中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个目标上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在全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工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工业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不能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两种所有制的接近，不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总之，不能迅速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那它就不会有可靠的和强大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是巩固的。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居然也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只会使人民的事业受到挫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领导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也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当然，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真正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也会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每一个胜利，都真正更广泛、更深入地动员着人民群众，

使他们团结在党和国家的周围,真正能够发展社会主义势力,扩大社会主义阵地,孤立资本主义势力,缩小资本主义阵地,从而使阶级力量的对比,日益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动员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强大推动力,对群众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最有说服力。如果政治上说得轰轰烈烈动听,而经济却搞得一塌糊涂,那样的政治,还硬要叫群众举手称颂,群众怎么能不产生厌恶情绪呢?

可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下,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产阶级的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能促进、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不管表面上装璜得如何好看,听起来如何悦耳,终究是空洞的、甚至只能给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灾难的东西。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必然是正比例的关系。没有久经考验的、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强调指出,政治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就是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为经济服务的具体表现。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重要的;它的重要作用,只是表现为为人民服务。

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比社会主义建设更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比发展经济更重要呀!当然,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请问,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吗?决不是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我们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但是,共产主义是在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的。如果不去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

能被糟蹋成画饼充饥的魔术。这当然是对于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莫大污辱！

有人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正是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抓革命保险吗？如果你抓的革命，不从发展生产出发，并归结为推动生产力的提高，那么，这样的“抓革命”，就不保险。抓生产危险吗？人们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当政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努力发展生产，自己的政治统治就一天也不能存在，这样的“抓生产”，谈何危险！

我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一些唯物史观的常识。所以要不厌其烦地重温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在有些人已经把它遗忘得所剩无几了。有人不是天天自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如果连这样一些常识都丢掉，那还算什么“高举”呢？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

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有什么别的尺度。党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就没有其他利益。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检查和发现我们党的路线和策略在群众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确和错误,优点和缺点,从而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有些人以为,只要党决定了的东西,就一定是正确的。他们关心的总是党的决定是否执行了,至于执行中对党的决定的正确与否,优点与缺点,则漠不关心。他们对党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实际上不仅是对群众不负责,而且也是对党不负责,因为党员的责任正是要检查和发现党的决定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从而改进党的领导,使党能更好地为群众的利益服务。

* 本文是《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有关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第六部分《关于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节录。标题是本书编者拟的。

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如果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问题,也不可能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的矛盾问题。

无产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这种矛盾反映到党内,就产生党内的矛盾。党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党员的成分也不可能是清一色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党,过去一直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尤其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党内容易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是不足为奇的。当然,党内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的传染者,主要地仍然是小资产阶级分子。

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首先必须懂得,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党内矛盾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因此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和党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只有靠思想批判去纠正。党内的思想分歧,步调不齐,只有靠思想批判去统一。一个正确的观点,一条正确的路线,只有在批判错误观点和错误路线的过程

* 本文是《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的第七部分《关于正确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问题》。《人民日报》于1979年8月27日以现题刊出。

中,才能巩固和发展。所以,党内同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好像人的呼吸对于人的生命一样,是党生存、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是党内民主的主要标志,是党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具体表现。不敢或害怕在党内进行思想批评的和平主义、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倾向,是错误的;压制民主和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专制主义、军阀主义、家长主义倾向,也是错误的。这些倾向,都只能使党死气沉沉,思想僵化,丧失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力量,对党非常不利,必须坚决反对。

党内思想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团结。思想上的一致,是党的团结的基础。因此,党的团结,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即遵循“团结——批评——团结”^①的公式,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党内斗争的一条根本原则。抱有这样的动机和目的的思想斗争,必然是光明正大的,因为这里除了党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私利。反之,那种从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或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出发,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来达到其陷害、打击或打倒革命同志的目的的所谓思想斗争,是同党的这一基本原则相背离的,其中必然包含有程度不同的阴谋诡计。这种所谓批判,只能在党内引起纠纷,制造派别,造成对立和分裂。

党内思想斗争,涉及到两个方面,即批评者方面和被批评者方面。为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处于尤其重要的地位。

批评者方面必须重视的问题,是思想批判必须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只有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才最有说服力,最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那种夸张的、武断的、主观主义的、吹毛求

^① 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2页)。

疵的或人身攻击的思想批判,是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即使对于有错误的同志,也只能说服教育,决不应该动手动脚,进行体罚或变相体罚。既然被批评者所犯错误大小不同,那末就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批评也应该有轻重之分。在不影响大局的个别问题上犯错误,叫做个别错误,是小错误。在许多问题上犯错误,如果这些错误没有内在联系,仍然不过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也属于小错误。如果这些错误有内在联系,则这种错误叫做有倾向性的错误,是较大的错误。如果这种有倾向性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这种错误如不纠正,最后会发展成为路线错误,这就是大错误了。一般说来,大错误不是突然发生,而是由小错误发展起来的。如果小错误能及时批评、及时改正,就不会发展成为大错误。如果小错误没有受到批评、批评的内容和方法不正确或被批评者坚持不改,那就可能发展成为大错误。把小错误说成大错误,或把大错误说成小错误,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批评。

是不是可以把党内犯有机会主义思想倾向的错误的同志,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呢?虽然这种倾向的结果,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但是不能说有这种倾向的同志,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正像党内有封建主义思想倾向的人,并不就是党内地主阶级代理人一样。只有对犯有这种思想错误,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并且坚持错误和在行动上违反党的决定和纪律的人,才能说他实际上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成为机会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了。这种人是不能允许其继续留在党内的。但是,一个人实际上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同一个人本来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有可能从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后一种情况则本来是潜伏在党内的敌我矛盾。那些人是资产阶级派进来或拉出去的内奸、特务,不管他们怎样貌似革命,对他们和对党内犯有思想倾向错误的同志,不能等同看待。当然,在这种犯有倾向错误

的人中间,也可能藏有内奸、特务,对此应该警惕,但是没有经过严格认真的审查,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轻易地怀疑或断定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即使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为阶级敌人,为内奸、特务,是不能允许的。这必然会导致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把同志当做敌人,给党造成极大的危害。至于把本来不是机会主义当作机会主义,把并无错误或犯有某些错误的好同志,诬陷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那更是颠倒是非,混淆敌我,是对党的严重破坏。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即使对党内犯有倾向错误或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评,也还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①,而不是为了一棍子打死。对这种错误,既要批判,弄清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使同志们在思想上彻底了解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产生错误的原因和环境,以及改正错误的办法,避免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这是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当然,对犯有大错误的同志给以恰如其分的纪律处分,有时也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前,必须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做得越充分越好。这不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而且对教育全党,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不实事求是,不用以理服人的方法进行党内斗争,对错误的批评,就会成为批评的错误。认为批评者可以不犯错误,或者批评别人就表示自己总是正确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事实上,批评者批评错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批评者是有党性的,就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并且给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甄别。如果批判是不正确的或不合事实的,受到批判的同志完全有申诉和要求“翻案”的权利。怕因此使领导丧失威信的想法,是多余的。其实,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正是实事求是、以理

^①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服人的正确态度。这种态度，只会提高领导的威信。

被批评者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批评者方面是不一样的。当然，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批评，对别人需要，对自己也需要；批评者同时应该接受批评。被批评者应该虚心倾听批评，但是必须唯理是从。特别是在一般同志和下级组织对领导方面提出批评时，即使不完全合乎情况，不完全正确，甚至完全不正确，也应该虚心倾听，决不能自以为是或借口别人批评得不合情况而听不进去。压制和打击报复更是错误的。应该仔细研究对方的批评，分析其合理的与不合理的部分，勇于承担责任，接受合理部分，对不合理的部分则耐心地加以解释。即使对完全不正确的批评，也要研究其发生原因，采取措施消除这种原因。在听取批评的时候，尤其是领导者对下级同志和下级机关，不应该提出过高的要求，否则，就谈不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每个党员都必须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但是，同时又一定要切实保证他们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党内有不同意见，有争论的对立面，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正确思想得到发展，错误思想得到纠正。这是促进党内思想活跃，提高思想水平的唯一有效办法。每个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在党内都有发表不同意见和相互批评的平等权利。为了坚持真理，每个党员都要有不怕撤职、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气概。必须同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错误作法，特别是同诬陷同志、妄图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错误作法，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弄清楚“左”倾和右倾的同异及其联系，是很重要的。关于右倾的危险和必须同右倾作斗争，现在大家懂得比较清楚，但是关于“左”倾的危险和必须同“左”倾作斗争，则似乎还有许多人不大明白。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左”倾比右倾好，右倾是立场问题，“左”倾是方法问题，右倾危险，“左”倾保险，干脆来

一个宁“左”勿右。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右倾表现为害怕阶级斗争，害怕群众革命运动，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搞阶级调和、阶级妥协、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和尾巴主义。“左”倾表现为玩弄响亮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词句，只讲斗争不讲联合，搞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应该看到，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背离，都是立场问题，也都是方法问题。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必然要表现为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当然，在不同情况下，何种倾向是主要的，并不一样。当右倾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时候，应该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右倾，同时注意防止“左”倾。“左”倾也可能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那就应该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左”倾，同时注意防止右倾。如果不顾社会条件的变化，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是归结为反对右倾的斗争，因此只反右不反“左”，“左”的倾向就势必会受到鼓励而发展起来，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成为主要的危险。在“左”倾成为主要危险以后，还要继续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就可能把正确的东西也当作右倾，极大地伤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后果。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党内还有一种两面派分子，他们表面上好像拥护党的正确路线，实际上则尽量利用党内右倾、特别是“左”倾的错误，来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那些混进党内的真正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就是这样干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

党内的“左”倾或右倾都是比较严重的错误。但是，只要进行及时的、正确的批判和斗争，还是可以克服的。犯这类错误的绝大多数人不是坏人，而是能够改正错误的同志。经过批判和斗争，坚决不肯改正错误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也是有的；那不过是已经在政治上被孤立了的极少数人，是容易对付和处理的。党内发生“左”的或右的倾向，既不奇怪，也不可怕。共产党人正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能力。

力,并提高理论思想水平的。党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发展、壮大和巩固起来的。

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党内的思想斗争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来进行。党是根据这一原则组织起来的,它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由它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违反或破坏这一组织路线,是组织上的错误,也是政治上的错误。当然,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比起来,不能不占首位。没有政治上的一致,就谈不上组织上的一致。但没有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党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也就无法实现,无法保证,无法变为革命的行动。所以,那种认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可以不照组织原则办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保证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组织原则。我们党历来主张,必须在广泛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作出决定,在相当的党员群众或其代表的会议上讨论通过,然后付诸实行。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必须勇于负责;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必须执行党的决定,同时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党的领导组织,首先是党的中央机构,有广泛的权力处理各种问题。但是,这种权力不應該是在党员群众之上,而應該是在党员群众之下。一則,这些领导组织的成员,应该是由党员群众或由其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是受党员群众的委托来工作的,是党员群众的勤务员。二則,这些组织的所有重要决议,都必须得到党员群众或其代表的批准,领导机构在其工作过程中,必须按期向党员群众及其代表做工作报告,听取党员群众或其代表的批评和建议,接受他们的监督,及时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三則,领导组织要定期改选,排除不称职的人,选进德才兼备的人,并对犯有错误的人提出批评或作出组织处分。这些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规定,使党内矛盾能在党的组织范围内顺利地解决。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解决党内矛盾的

唯一正确的形式。任何把民主和集中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只有认真实行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在党内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片面夸大民主，反对集中，就会犯极端民主化、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片面强调集中，无视民主，就会犯专制主义、军阀主义、家长主义的错误。为了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在组织问题上，必须反对这两种错误的倾向。

对犯错误的同志的处理，同样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一般党员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首先必须在党的支委会上，必要时则在支部大会上讨论解决。地方党委委员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要在地方党委会上，必要时则在地方党委扩大会或地方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解决。中央委员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应该先提到中央政治局，必要时则提到中央全会或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解决。对初犯错误和重犯错误的同志，对愿意承认并改正错误和不愿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同志，处分应有所区别。在批评某个同志的错误并给予组织处分时，一般应该允许他参加会议，听取批评，接受教育，他也可以对错误做自我批评或为自己辩护，不同意时还可以上诉，要求翻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党对自己的党员，决不能采取镇压的措施。党员违反国家法纪，应由国家司法、公安机关处理。

此外，党内斗争同党外斗争，在组织上也是应该有区别的。党内斗争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向党外公开，使群众知道，什么是党的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借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许多党内的争论，是不必向党外公开的。有时，党内斗争可以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作为党的参考，最后决定权仍应属于党。党内的事情不能由群众任意决定，由群众说了算。如果那样，党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而成为群众的尾巴了。这只能对党起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因为群众一旦失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统一的、有组织的领导，反动分子就可能利用某

种自发性和盲目性，制造、煽动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来达到他们反对党的目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党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战斗历史，有了进行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真正能够弄清是非、团结同志、纯洁党的组织和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优良传统。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忘记和抛弃这些传统，都必须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践踏党的原则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

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党必须正确解决党和非党组织的关系,首先就是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党领导着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的一切决定、命令和法律,都必须得到党的相应的指示,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党的专政,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专政混为一谈或者竟把两者等同起来。因为:

第一,党必须通过国家组织,即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机构实行专政。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的讨论、审议、补充、修改和接受,并作出适合于群众自己的意见和需要的,并具有法定的约束力的相应的决定、命令和法律,然后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国人民中公布施行。这里就有使党的决议和决定成为无产阶级及其他人民群众的代表自己的决议和决定的过程,这里就有党说服无产阶级并经过它去说服教育其他人民群众代表接受党的决议和决定的过程,这也就是党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当家做主,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这是党实现其对国家的领导作用时所不能逾越的和必不可少的过程。党不能超过国家、高居于国家之上,不顾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代表的意志和决心而自己实行专政。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它不能代替阶级实行专政。

* 本文是《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第六部分《关于正确解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节录。标题是编者拟的。

其次,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它有防止外来侵略,镇压国内外反动派,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历史任务。为此,它有全国的和地方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组织体系,它有千百万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干部和群众参加的繁重而又多方面的行政的和组织的工作,它的一切工作同全国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有最密切的联系。党的领导的任务,只能集中于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动员群众完成国家的决定和法令,并检查这些决定和法令在群众中执行的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从而加强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作用。党决不能靠少数党员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相反,它特别应该注意的,正好是大量招收、培养和提拔非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机关的各方面工作,特别紧紧依靠工人群众,使他们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真正做到人民群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学会了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使少数官僚主义者和野心家不能利用国家机关为他们谋私利,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最后解放才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任何企图以少数人的活动,即使是最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来包办代表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成为党的附属机构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一定会徒劳无功的。

其三,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暴力来维持的。它依靠暴力,依靠军队、公安部队、人民警察、民兵以及公安和司法等机关,镇压国内外敌人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以及惩处一切违法乱纪的分子的犯罪行为。党则依靠说服教育的方法,来领导国家机关的活动。它不能代替国家机关采取镇压或强迫命令的方法。任何共产党员,违反了国家的法纪,同普通群众一样,应该受到国法的制裁,决不能因为他是党员就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国家的一切命令和法律,对全国每一个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是有效的,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应该成为尊重、服从和执行国家法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模

范。

总之，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是党正确解决党与非党群众组织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对于国家机关的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由党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的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文章，那一切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

公和私(也包含集体和个人、国家和个人)是一对矛盾而又统一的范畴。没有私,就无所谓公,反之亦然。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互为条件而存在的。这种矛盾统一的关系,在不同社会制度内的具体表现和阶级内容,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想研究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因为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实际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一小部分敌对分子的私,同社会主义的公是根本对立的。两者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不能促使其转化时,就只能用不同程度的镇压的办法来解决。但对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私的、个人的利益和公的、集体的(包括国家的)利益则是基本上一致的。因此公私之间虽然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用自觉的调节的办法来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中,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集体的和国家的所有制),公的、集体的利益不能不居于首位(即主导的方面)。因为这个公的集体,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集体,没有这个集体,人民群众的私的利益也就没有保证,他们的最后解放也无法实现。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集体的利益。所以,我们党一贯提倡把“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作为对个人,首先是对共产党员和一切国家机关、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而反对

* 本文是张闻天在广东肇庆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稿。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是那种“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言论和行动。那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为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这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的英雄人物，没有他们带头的模范作用，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公和私也不是完全隔绝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种私的个人的利益，而且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的利益，即是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这是公私利益基本一致的具体表现。任何个人，为集体利益劳动，就会得到一定的劳动报酬。职工得到工资，农民得到工分。在这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私和公是结合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的基本一致性，在它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你为公劳动，你就可以从公的劳动果实中分得一部分。你为公劳动得多些，你个人所得也就多些。这种分配原则既适合于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也适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这种分配原则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所决定，但反过来也最有利于促进生产。这种分配原则最能调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他们从这里可以切身体验到：为公、为集体的利益而努力劳动和工作，同时也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生活的改善；集体的、公的事业发展了，他们的私的个人的生活也就改善了，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这种一致性，对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说来，是很容易理解的。人们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自觉自愿地劳动与工作并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根据，也就在这里。即使今天有人还不了解集体利益的首要意义，而不懂得应该自觉自愿地为集体事业劳动与工作，并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他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也懂得首先必须为集体利益而劳动和工作，因为他看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内，

离开了集体,个人的利益也无法实现。甚至那些对社会主义这种集体没有好感或怀有敌意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这种分配原则也对他们有着强制的作用,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不劳动者是不得食的。

要建成社会主义,没有那些为了集体利益,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先进人物起模范和带头作用,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终究还是少数。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以至全体公民的积极参加,是不可能建成的。为此,必须坚决贯彻实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公和私相结合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普遍的无报酬的、不计报酬的自觉自愿的劳动,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的时候,才能实现。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内,正确的政治工作就应该处处利用生动的事实向人民群众宣传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并使他们真正懂得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的道理。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平时所说的“大公无私”的“私”,是损害集体利益的私,“假公济私”的私,而绝不是个人在集体收入中所应分得的份额的私。这种应得的私,是每个人应有的正当权利。反对这种私,或否认有这种私,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左”的空谈。就是对那些大公无私的先进工作者,我们不但要同样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使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工资或劳动报酬,而且正因为他们能为集体作出比一般人更多的贡献,所以国家和集体还要给他们以一定的照顾,并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以奖励。

还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不但公中有私,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允许公外有私。对人民公社的社员就是这样。社员们除从集体得到应得的劳动工分外,还允许他们在不耽误集体生产的条件下,利用业余时间经营个人的自留地或搞一点副业,并在集市上按照合理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以此来补助他们个人生活用品和用款的不足。这种政策,当然对农民个人有利,但对集体也还是有利的,因为这些产品在市场上可以补助国家产品供应的不足,满足消

费者的某种需要。这是公私结合的一种辅助形式,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废弃。

以上我们说了私应该为公,公中也有私。现在我们要说公还要为私。既然个人应该为集体,自然集体也应该为个人。不用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最后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但是在职工得到工资、农民得到工分之后,国家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任务还没有解决。为了使工资和工分真正落实到有利于个人,国家和公社还应该做很多的事情,例如,如何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及时供应,如何切实解决交通运输、居民住房、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如何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妇产院、养老院、学校、医院、食堂、洗衣房、旅馆、修补服务站等问题,如何实行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总之,一切有关人民实际生活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集体必须具体加以解决,并在解决的过程中使人民的私人生活社会化,个人的问题也变成集体的问题。公为了私,自然私也就向公转化。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使每个人从个人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不能使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化,它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那种以为只要职工有了工资,农民有了工分,人民的生活问题就都解决了,国家和集体就可以不管了的想法和做法,是资产阶级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但是,只重视集体利益而不重视个人利益;只有个人为集体而集体不为个人,这样的集体必然会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因而这样的做法也不利于集体。要使人人为集体,必须集体为人人。列宁说的“众人为一,一人为众人”^①的名言,就是这个意思。个人集中力量为了

^① “众人为一,一人为众人”,通译作“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见列宁《从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集体,使集体的力量不断壮大,集体也切实关心个人,使个人生活不断改进,——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所以我们既反对片面为了个人利益而违反或破坏集体的利益的右的偏向,也反对片面为了集体利益而不顾个人利益的“左”的偏向,这种偏向实际上也不利于集体利益。

后 记

本书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编辑。选集传记组组长张培森主持了全书的编辑工作。编辑工作得到何方、曾彦修、萧扬等的指导，上海市党史研究室主任邵有民、副主任黄祥瑞、张文清均一直重视和关心此书的出版，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参加文稿整理、校订和此书编辑工作的有程中原、施松塞、张兆宪、程慎元、刘银雪、张青叶、萧宏。编辑组在搜集文稿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图书馆、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等单位以及张闻天亲属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